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ZHONGGUO MAKESI ZHUYI YANJIU CONGSHU

理解中国的改革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 键 著

LIJIE ZHONGGUO DE GAIGE
DANGDAI ZHONGGUO SHEHUIZHUYI
XIANDAIHUA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上架建议：政治理论

ISBN 978-7-5486-079



定价：3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中国马

ZHONGGUO MAKESI ZHUYI YANJIU CONGSHU

理解中国的改革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 键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中国的改革：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胡键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486-0793-9

Ⅰ.①理… Ⅱ.①胡… Ⅲ.①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Ⅳ.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5026 号

理解中国的改革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　　者—— 胡　键
责任编辑—— 许钧伟
特约编辑—— 焦　健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www.ewen.co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8 万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793-9/D·28
定　　价—— 38.00 元

总　序

方松华

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以来，本所的同仁一直怀着一颗壮志雄心，希望从“学术系统的建构”、“话语体系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建设”、“国际比较的视野”与“学术档案的确立”五个方面来建构一个原创的、完整的、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此，酝酿、撰写并出版多卷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乃是这种心愿和如下使命所在：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理论和学术的主流，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道统”。它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之理论基础的意义上已经成为潜在地支配或影响当今中国历史走向的新的思想或精神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方面作为学术史、思想史或精神史，它所反映的是现当代中国在由民族走向世界史的过程中，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互交流、碰撞、矛盾、冲突和融合中，参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以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导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作为与政治和社会运动高度相关的理论史或意识形态史，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这一恢弘的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法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的现实理论主题，它的发展水平、理论境界和历史视野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状况、历史远景和未来前途，关系到当代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对于古今中外问题、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等时代主题的历史解答。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筚路蓝缕，共启中国学术之山林。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一直到五四时代，传统儒学受到致命打击，遂有多元学术思潮之兴起。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十余种学术思潮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并在新中国建立后荣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

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成功应对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成功应对了来自中国传统和保守势力的挑战，承担起近现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二是成功应对了来自苏联道路或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的挑战，在艰辛探索中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三是成功应对了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信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之一，就是在与当代各种学术思潮和和思想流派的充分对话中，实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理论建构，让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中国的理论元素、理论经验和理论内容，从而构建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需要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自我辩护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

从学理方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现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需要深入的历史与逻辑的建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学术史在中国传统中有着"道（原理）与术（运用）"的意蕴，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有着自身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脉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论争、创建的各个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传播与确立；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与逻辑发展，厘清、阐释乃至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要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引领 20 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从学术论战的角度而言，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思潮的比较与论战的结果。绵延近一个多世纪的学术论战，无论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还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抑或是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伟大思想、西方优秀的现代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智慧相融合，创造性地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

二

当代中国，各派学说纷纭、各种思潮激荡。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从"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哲学式阐发，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话语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潮。因此，发掘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这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式的表达，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内涵的彰显。

考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虽然近百年来各种学术思潮兴盛，但是大多匆匆而过，深度明显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不足，在学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方面，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中国的话语系统，更不用说"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征"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在学术话语的思想内涵的建树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大多是模仿或引进西方模式，诸多现代中国哲学家曾经非常努力地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可惜大多没有成功，其原因也是在于没有确立中国本土的话语系统。因此，如何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和实践话语以学术话语的形态，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更深刻的学理支撑，并转化为日常话语提供中介，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此，我们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演进的基本经验、教训和路径进行探索：(1) 根据实践主题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进程中坚持其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提炼总结和对斯大林模式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消极影响的反思。(2)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理论思辨：特别要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其他学科学术话语、实践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3)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路径探索：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解释力和影响力；以求得话语批判和吸收借鉴的结合；内在理路和外在形式的统一。由此，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

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索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中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正如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人思想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史，它还应该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学术史。这无疑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之一。

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大机遇，其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艾思奇、冯友兰、冯契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何其芳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孙冶方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成绩。这些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一道，共同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个时代的巨大主题。

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回顾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有着不同的特征。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学科体系或知识建制（苏联模式），各门学科都形成马克思主义原理性质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原理性的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的）解体，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引进，马克思主义被设定为基础性的学科门类，引领并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但是，学科建设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探索：(1)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性地位，需要重点考察这种指导性地位产生的历史缘由和内在的合理性；(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科之间的具体关联研究，需要重点梳理职业学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宗教、文艺、历史以及其它具体学科的发展要求相结合时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之间的具体关联研究，需要重点梳理职业学者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的发展相结合

时，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以及所遭遇的重大学术困难；(4) 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学科化努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需要重点考察延安时期、建国初、改革开放后，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自身体系化和学科化的种种努力、成就和经验教训。

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歧出，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与中国传统智慧的结合所结下的丰硕果实。由国际视野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在当下的实践中正努力践行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在 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热议、争论、评判和反思，已经成为当前各主要思潮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重心之一。对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要左翼思潮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想，信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人类文明样式。为此，我们应当拓宽理论视野，将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关于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史和改革史的研究，关于中国道路、中国体制和中国模式的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从外部世界来对照、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过程。

五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亟需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史资料长编，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学术论战、重要学术文本汇编成经典史料，用纸质和数据库的形式面世，尽快抢救许多散落和轶失在解放前出版的书籍与报刊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资料。以求为今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学术史奠定比较丰富可靠的史料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主义研究在当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第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学术基础。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发掘学术资源的层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马

克思主义构建的根本主旨就是要在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学术积累和学术发掘的意义上，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可以为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能力奠定学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与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创造力的根本体现——有着本质性的关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可以为提升党的理论境界和理论水平，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思想和学术基础。

第二，研究和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史的地位，原创的、完整的、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掘与建构，填补这一近乎空白的领域，更是为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盛事，这就像中国先哲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工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这一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或新"道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是以 20 世纪中国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为现实依托的，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的历史和思想传统，成为当代中国的新"道统"，当代中国所折射的诸如古今问题、中西问题、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都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和思想传统中得以展现和解答，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就是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继承马克思主义这一新传统或新"道统"。

第三，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比以往经验的阐释更进一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旨在从学术系统、话语体系和学科建设、国际视野等方面来对这一论断进行阐述和论证。

第四、可以在思想和学术的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积累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创一种新型的文明和社会类型的可能性（如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可以揭示出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破解"历史终结论"，为中国和未来世界开辟新的发展愿景。

告读者

尊敬的读者：

欢迎您阅读本书。学林自出版平台（www. xuelinpress. com）为本书读者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1. 对本书内容进行全文检索。

2. 了解互联网上各主要网站对本书的评论。您也可以发表对本书或本书作者的评论，与其他读者沟通。

3. 查看本书作者的详细情况。您可通过站内信等工具与作者直接沟通。

4. 查看本书责任编辑的详细情况并与编辑直接沟通。

此外，如本书市面上已无法买到，www. xuelinpress. com 为您提供付费定制服务，一本起印，价格不高于本书定价。

我们将陆续推出更多服务，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学林出版社

目录 | Contents

绪论

中国改革发展已经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多年来，这一伟大进程不仅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以及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极大的影响。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从一个经济贫穷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封闭型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开放型经济，并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在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断地融入国际体系，并且成为国际体系中重要的成员之一，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对国际社会、国际体系的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都非常有必要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对过去30多年改革发展的基本评价

关于对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发展的评价问题，国际学术界较早就已经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造就了“中国奇迹”；而且，“中国奇迹”也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减贫贡献”。特别是“减贫贡献”，全世界90%以上减少的贫困人口都来自中国。二是认为我国改革发展在未来5至10年内必然走向崩溃。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政府的投资，而政府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庞大的预算赤字。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难以维系，中国体制内的矛盾将难以克服并将导致内乱，出口和经济增长率将逐年下

降,等等,这些将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全面崩溃。[1] 实际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持这种看法。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杰克·A·戈尔德斯坦(Jack A. Goldstone)在章家敦之前就认为中国面临的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严重匮乏的自然资源、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低下,此外还有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和其他社会问题等,中国自身都难以克服,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将最终导致中国崩溃。[2] 三是中国改革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是以巨大的环境成本、两极分化为代价的,因而中国很有可能"拉美化"。[3]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受到制度性、行业性和安全问题等的约束,这就是中国在成长中的烦恼,或者说就是所谓的"中国综合症"。[4] 所以他们认为,与其把中国看作一个"亚洲崛起的巨人",不如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在崛起的"正常的"经济强国。

国内学者对我国改革发展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一是"成功论",这种观点与"中国奇迹论"是一致的,都是从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角度来看待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方面,认为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科技大国和综合实力大国。[5] 特别是经济实力方面,从汇率法的角度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 年美元价格)计算,1980 年中国 GDP 仅占世界总量的 1 %,到 2005 年上升为世界总量的 5 %,从世界第 10 位上升为世界经济第四大国,居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2009 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法的角度来看,根据 Maddison 的数据(1990 年美元价格)计算,中国的 GDP 占世界总量到 2003 年时约为 15.1%。[6] 到 2011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大致稳定在这比例上下。

二是"问题论"。这包括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因改革不够彻底而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过分集中的权力没有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导致经济没有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并进而导致权力寻租、市场经济缺乏伦理规范、国有资

①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Random House, 2001.
② Jack A. Goldstein,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1995, pp. 35 - 52.
③ Minxin Pei, "China is Stagnating in Its 'Trapped Transitio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4, 2006; Murry S. Turner,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2004, pp. 137 - 156.
④ Albert Keidel, "China's Growing Pains Shouldn't Hurt U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4, 200;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 Syndrome," *New Republic*, November 16, 2006.
⑤ 胡鞍钢:《现有理论为何难以解释中国奇迹》,载《人民论坛》2008 年 2 月 B。
⑥ 胡鞍钢:《中国经济实力的定量评估与前瞻》,载《文史哲》2008 年第 1 期。

产严重流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地方恶势力兴起等问题。[1] 另一种看法基本上是对改革的全面否定,是极"左"的观点,认为改革"一团糟",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过去30多年来虽不是主流,但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发展历程相伴相随,时而是一种潜流、暗流,时而又从暗处冒出来给改革设置种种障碍。

三是比较折中的看法,既承认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认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的确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比较客观的。

那么,究竟对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如何评价呢?概括地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基本评价有以下几点:

(一)从改革发展的动力来看,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前导,但改革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新的思想解放,这是我国改革发展能够持续长久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动力。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能够走上改革发展之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也就是通过思想的解放根本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更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同时反过来,改革发展又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特别是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最后到全面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次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而每一次又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正是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中国的改革发展成为了一个持续前进的伟大进程。

(二)从改革发展的路径来看,改革虽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发展之路,但30多年的改革发展在每一阶段都有着清晰的路线图,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改革发展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发生逆转。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确说过,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发展是没有路线图的,也不会给人"半夜里吃黄瓜,摸头不知尾"的感觉。相反,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在明确的战略路线图指导下进行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围绕着这一目标确定了"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从中国的实际国情来推进改革发展的措施,等等。改革最大的危机是失败,

---

① 参见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而最大的风险则是发生逆转。无论是防止改革失败还是防止改革发生逆转，最关键的是改革本身要有清晰的路线图。中国过去30多年代改革发展进程之所以不会走向失败，也没有发生逆转，就是因为在清晰的路线图指导下，改革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增量，从而使改革自身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和社会认同性。

（三）从改革发展的内容来看，改革打破了国家和社会合一、"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促进了组织形态多样性、利益多元化、观念多样性的发展，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国家和社会合一、"党政经"合一的总体性社会走向了国家和社会分离、政府和经济分离的分化性社会。在总体性社会，社会的稳定是低水平的低度和谐，而30多年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就是用市场的手段彻底打破这种低水平的和谐，建立高水平的和谐。"和谐"（harmony）是以多元性为前提的，没有多元就谈不上和谐，社会的一元化（centralization）不是和谐而是一致（unanimity），是同质化的社会（homogenous society）。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承认多元分化的社会，是社会的同质性（homogeneity）与社会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良性互动且相互作用的状态。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不仅组织形态日益多样化，而且价值取向、利益主体等都加速分化和走向多元化。这为未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筑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基础。

（四）从改革发展的意义来看，30多年前的改革发展开启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而30多年来的探索终于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建国以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先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但苏联模式早就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弊端，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不过，在探索过程中，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从而给中国的发展制造了人为的障碍。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有了新的突破。一方面，中国更强调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要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30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就是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和平发展之路。

二、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改革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同时进行的，而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作

为一种过渡性的状态是有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都有其阶段性的目标,当该阶段的目标实现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就进入下一个阶段。同样,中国的改革发展也是分阶段、分步骤逐步推进的,也就是所谓的渐进主义模式。不同的阶段,改革发展的具体目标也不一样。因此,我们在这里非常有必要对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回顾,以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一)如何划分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

划分我国改革发展历史阶段的目的在于清楚认识改革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严格来说,对改革发展历史阶段的分化并没有统一标准。不过,从阶段性目标来看,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解放思想、回归法制。在经历了长达20年"左"的思想束缚以后,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摆脱"左"的思想牢笼,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回归法制轨道。与此同时,体制的僵化已经非常严重,思想解放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改革严重僵化的各种体制和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展现出来。因此,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究竟走向何处,究竟用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取代原有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当时改革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我国改革发展是自下而上的选择,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从包产到户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全面推行;从农村的改革到城市其他各项体制的改革;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发展私人经济,最后到全面走向市场化等各项经济改革,都是在利益的诱致之下从民间开始探讨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政策的。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国改革发展"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双轨制带来的贪污、官倒、寻租等腐败虽已有增长,人们也有不满情绪,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地区差距不大,各阶层的收入相应提高且差距不明显。公正地说,从社会生活的质量、安全性、和睦程度以及政治开明看,这一阶段都是建国以来"政通人和"的最好时期之一,或者说是"帕累托改进"时期。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真正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从内部来看,就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与之相适应的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前一个转变非常成功,从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以后,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政府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党政分离、管

理科学”的原则，基本上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经济基本上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是，后一个转变问题不少，甚至还没有真正实现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增长还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基础上，因而，经济增长之后带来的是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增大等。与此同时，在市场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政治权力资本化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贪污腐化严重泛滥。根据“透明国际”对有关时期中国腐败状况的评估，在改革发展初期的 1980 - 1985 年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 5.13，表明中国属于轻微腐败国家，但到了 1993 - 1996 年期间，中国的清廉指数降到了 2.43，这期间中国已进入极端腐败国家的行列。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情况表明，市场经济建立之后，相应的配套改革和法制建设也必须跟上，否则会导致市场经济的扭曲，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严重、社会利益向两极分化、社会阶层结构走向断裂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建成是两回事，从建立到建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个阶段：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指学界所称的“胡温新政”。这一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针对前一阶段产生的种种问题，对改革发展的航向进行合理化、科学化矫正。其中包括针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现象如何实现科学发展；针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针对权力寻租导致政府失灵、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针对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法律滞后、信誉不足的问题如何构建法治体系和信用体系，等等。这一阶段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为什么说当前中国处于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所谓新阶段是指我国改革发展在该阶段的目标和任务都与以前不同，特别是经历了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之后，过去的改革主要是存量未动、增量先行，所以很多问题都往后推了，也就是说，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面临的问题都是“硬骨头”，需要在新阶段进行攻关，因而改革发展已真正进入了攻坚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是由当前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社会的主要风险决定的。

从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来看，一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粗放型增长付出了过大的

资源和环境代价；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该体制还不完善，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三是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反贫困取得全世界最突出的进展，但我国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和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四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较快，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仍很明显，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但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不少亟待完善和发展的环节，这些是和扩大人民民主的要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六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文化建设总体水平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均还不适应，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但社会发展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民生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八是我国已经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同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风险也随之增加。由此可见，尽管我国改革发展成就巨大，但仍然还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不易克服的新问题，面临许多新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和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

1. 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虽然过去也一直在提，但行动却远远弱于口号，即使有行动，也因难以给政府进行角色定位而最终难以推动。在经济活动中，政府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政府完全退出经济活动，把经济理解为纯粹的市场行为，那么就意味着经济中的政治因素对经济本身完全起消极作用，但实际上经济的持续增长恰恰需要一个明智政府的干预。[①] 这里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目标究竟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还是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即使是后者，政府包括政治家的利益实际上是与改革本身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政府和政治家的利益才能最大化。不过，政府的“明智干预”或者说政府扮演“扶持之手”的角色，使政府常难以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甚至往往把自己在经济活动中所作的一切

① ［波］格泽尔兹・W・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2 页。

都视为政府为经济"应该做的"行为。结果,政府的"扶持之手"就会变成"溺爱之手"而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甚至可能会变成阻碍经济增长的一只"黑手"。由此可见,通过政府转型来完善社会再分配,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建立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已成为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2. 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过去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主要内容是进行产权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效益。但问题是,产权改革究竟走向何方?虽然从理论上来说,私有产权是运作成本最低的产权形式,但不同集团的利益博弈对产权的需求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存在着利益集团的情况下,产权改革很难实现最优的选择。因而,单纯的寻利性的产权改革必然面临合法性危机,从而导致整个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国企改革的合法性意味着改革的始点必须公平,一旦满足了这个条件,产权交易的寻利过程会内生出各种所有制企业,即混合产权。当前,国有企业管理腐败呈现出以侵吞国有资产为主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个人腐败逐渐减弱、以行政垄断腐败为主的国有企业群体腐败日益严重的新特征。

3. 如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状况已经焕然一新,但迄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 WTO 过渡期结束以后,我国金融业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其中包括:没有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面对信仰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多种风险,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我国银行在业务创新方面与外资银行存在着明显差距;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且各个监管机构之间不能有效协调,要么是监管责任不明确而造成监管重复、监管成本上升,要么是对业务相互交叉的领域出现监管真空。

4. 如何深化社会事业领域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社会事业的确有相当大的进步,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文发展指数"(HDI)便可见一斑。2004 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为 0.745,在全世界的位次由上年的第 104 位上升到第 94 位;2005 为 0.755,比 2004 年提高了 1.34%,居世界的位次上升到第 85 位;2006 年比 2005 年又有所上升,达到了 0.768,居世界第 81 位。但是,我国的这一指标仍然没有进入高人文发展水平的行列。[1]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国教育仍然相对落后,甚至

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人文发展指数分为三类:高人文发展水平(值为 0.800 及以上);中等人文发展水平(HDI 值为 0.500—0.799)和低人文发展水平(HDI 值为 0.500 及以下)。

出现了倒退的迹象，只重在校学生数量，忽视了培养学生的质量；城乡医疗卫生制度仍然处于割裂状态，而且公共医疗卫生设施非常短缺；社会救助体系单一，弱势群体被处于社会的边缘化等。这些情况表明，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步入经济大国的行列，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仍然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社会事业的发展。①

5. 如何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对外开放也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引进外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多变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也不断提高等。但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仍然不高。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仅占28%，而发达国家这一数据一般达到40%。我国的贸易方式也主要是低附加值加工贸易。我国出口商品中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对外贸易品中，"Made in China"的多，"Made by China"的少，而"Created by China"（中国创造）的就更少。另外，我国主要的文化产品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逆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有关各年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报告显示，我国在主要的文化产品贸易方面，没有任何优势，特别是在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中，我国仍然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产品。②

6. 如何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能耗也在飙升，我国能源消费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6年的24.6亿吨标准煤。由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我国能源利用率甚至低于印度。从行业来看，我国在电力、钢铁、石化、轻纺、化工和有色金属6个行业的主要产品平均能耗要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铁、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出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从总体来看，我国能源利用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能源利用效率甚至低于印度，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③ 高能耗、低能效带来的经济增长付出的却

①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Vol. 48, No. 2, 2006, pp. 17-35.
② 赵有广："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及其原因分析"，载《国际贸易》2006年第10期，第30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7年12月26日。

是巨大的环境代价。

从单位 GDP 能耗来看，2001 年世界主要国家单位 GDP 能耗比较结果显示：我国 1 亿美元 GDP 消耗能源约 11－12 万吨标准煤，能耗强度约为日本的 6.58 倍，德国的 4.49 倍，美国的 3.65 倍，巴西的 2.35 倍，印度的 1.24 倍。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 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 10 个百分点，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即通过改革改革，社会各种要素和资源在市场与政府两种配置手段下得以充分动员起来，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幅，从而使中国经济规模大幅增长，经济总量达到了 5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但是，过去 30 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解决中国国民生产值的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国民生产值的质量不高。自主创新不足，表现在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源消耗量偏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耗强度有所降低，从 1978 年的 15.68 万吨标准煤/亿元下降到 2008 年的 0.95 万吨标准煤/亿元。2010 年进一步下降到 0.82 万吨标准煤/亿元。① 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这些数据仍然是偏高的。中国国民生产值单位能耗远远高于巴西，略高于印度，与南非相近，只比俄罗斯略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比发达国家低近 10 个百分点，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②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增大，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因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说，当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经济发展明显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时，就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我国经济发展也如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规律从自然遵循到自觉遵循的长期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路线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展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与此同时，还存在着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特点具有明显的先天脆弱性：人口数量压力巨大，活动频繁，规模庞大；资源和生存空间相对紧张；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资源和重要的矿产资源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一半。此外，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以城市为中心

① 以上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各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7 年 12 月 26 日。

的环境污染仍在继续，并逐渐向农村蔓延。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些企业或单位片面追求 GDP 数量的增长，只注重经济效益，推行的是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样的快速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就越大，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本质上蕴含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理念，实践上这种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未来改革发展还面临着三大瓶颈性问题：一是政府转型问题，也就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三是社会公平的问题。过去的改革由于没有触动上层建筑架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触动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国有垄断性企业和大型企业，因此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使我国的改革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没有造成社会的激荡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中断。这既是我国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我国改革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困惑。政府没有实现真正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也就难以实现根本的转变，因为在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上一级政府往往是以经济绩效来衡量下一级政府的政绩的，所以即使在今天已经明确强调不再崇拜 GDP，但 GDP 仍然是政府自我考评不可缺少的指标，甚至在既有的定势之下，该指标的份量仍然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只能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同样的道理，政府在追求 GDP 的情形下，效率仍然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公平仍然被忽视。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政府转型。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问题却成为改革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需要努力克服并取得新突破。由此可见，我国的改革发展新阶段也就是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

三、当前改革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透视

21 世纪，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也就是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阶段。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特征，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从内部改革来看，这些特征表现为：

（一）中国社会转型从加速分化期进入到在新制度安排下的有序整合期。

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改革以后，我国社会很快进入加速分化期。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我国社会结构一度呈碎片化趋势：利益分化、阶层分化、政治分化、社会组织分化等等；另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或者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尚未健全、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却难以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双轨制"），因而社会风险和社会冲突均不断上升。当前我国的社会冲突既有制度内冲突，也有制度外冲突。一方面，社会冲突的总量在迅速上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社会冲突都呈现上升态势；另一方面，制度内的社会冲突占社会冲突总量的比例在下降，相应的制度外的社会冲突的比例却在上升。① 在社会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性的前提下，不仅既有的社会资源被消耗，而且也导致了改革发展总体收益的共享程度下降，从而使社会的认同感下降、凝聚力减弱。但随着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既有改革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社会新的整合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正发挥相应的功能。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政治、政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制度安排，它们在协调社会利益集团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城乡关系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正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使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有序的整合期。

（二）中国改革发展从脱贫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发展型矛盾更为突出。

改革前，我国社会普遍贫困，甚至改革启动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按世界银行人均一天消费 1 美元以下的绝对贫困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数 1985 年还有 1.25 亿。但是，到 2005 年，中国通过改革发展已经把赤贫人口减少到 2 300 余万人。也就是说，改革发展带来的普遍性收益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发展型社会，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新的转移。新的社会矛盾突出表现为：一是制度创新与制度惯性的矛盾。过去的改革主要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双轨制"保持了社会经济稳定，但也把原有的制度惯性保留下来了，从而导致了制度创新乏力，当前在制度建设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增量改革产生了制度惰性，进而使制度创新力不足。二是工业化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50，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也就是重化工业化阶段中的高加工度化时期。据

① 胡鞍钢：《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和谐也是硬道理》，载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0 页。

预测，按照现有的水平和发展速度，我国要到 2021 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才能达到 100，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①]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每一个成果将消耗更多的资源和能源，而我国是一个资源和能源都短缺的国家，当前两者之间已经关系紧张。三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经过了 30 多年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以后，中国虽然已经摆脱了贫困，根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发展仍然是我国的第一大要务。然而，尽管党和政府提出了要用科学发展统领一切，但一个显著的问题是，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在经济至上主义引领下片面追求 GDP 的发展，环境压力不仅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已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横加指责的一个重要依据。

（三）中国改革发展从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下、失信行为盛行阶段进入到全面建立健全国民经济信用体系和市场道德体系的阶段。

计划体制下，无所谓国民经济信用体系；市场经济启动之后，信用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但市场利益的驱动和信用体系发育水平低下导致了信用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这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近年来，国内商品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包括“苏丹红”、“孔雀绿”、“甲醛”、“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国外又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楼市危机、金融危机。这些都冲击着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建立健全国民经济信用体系和市场道德体系。

（四）中国改革发展从政府职能定位不明进入到政府退出市场、以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宏观调控为主要职能的阶段。

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政府转型已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当前我国不仅面临着经济不发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矛盾，更面临着全社会公共需求深刻变化和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按照公正、透明、廉洁的原则，以经济、效率、效能为目标，实行政府再造，完善社会的再分配，协调重大利益之间的关系。

从内部改革与外部环境关系来看，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表现为：

（一）中国改革发展进入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以内部改革来促进对外开放，但随着中国加入 WTO

① 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王延中等著：《中国工业化进程报：1995—2005 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43 页。

以后，改革发展进入了“开放倒逼改革”，加强内部制度建设与参与国际机制相融合的进程。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试验到区域性开放、政策性开放，目前已发展到体制性开放的阶段。中国加入 WTO 和对 WTO 的承诺并非简单的政策性加入和政策性承诺，而是逐渐全面接受 WTO 规则约束，因而也就必须在体制上作出承诺，即“遵守规则、开放市场”。而这归根到底是中国的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按着 WTO 的一般原则向国际社会实行逐步的、普遍的全面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法规逐步符合 WTO 的一般原则。这就意味着，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改革发展实践，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国内的压力主要是过去改革发展中的遗留问题，而国际的压力则是全新的，特别是我国如何应对全面接受国际通行规则的问题。

（二）中国改革发展历程已经从逐渐融入国际体系阶段进入到在国际体系内利用和改造国际机制以拓展中国国际利益的阶段。

融入国际体系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观选择，但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后，如何做国际体系内的“利益攸关方”，则不是完全由我国自己决定的，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美国等主导性大国。因此，一方面在这一阶段如何协调好与美国等主导性大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战略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后，既要学会利用国际机制来实现自身利益，同时作为一个大国又要能够在改造国际机制、设置国际议程方面开始发挥相应的作用。否则，中国如果完全遵循国际体系中的既有规则与既有议程，那么国际规则中原有的不公平、不平等问题将不能根本改变。改造国际机制的能力、议程设置的能力等反映的恰恰是一个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地位。

（三）中国改革发展从利益相对孤立进入到与国际体系和各大国利益日益捆绑在一起的时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进入国际体系，利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有利益逐渐增多。特别是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进程程度越高，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融合程度也就越高，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多。不过，由于西方大国长期以来乃至到今天并没有把我国视为国际体系中平等的成员，因此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初主要是在经济利益上捆绑在一起，而共同的政治利益却很少。因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大国并不承认它们与我国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甚至因这样的偏见而导致了“中国威胁论”，甚至还散布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即便如此，由于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政治上的歧见也无法克服其经济上对我国的

依存性。在这种情形下，西方要求我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四）改革发展使中国国内稀缺要素国内市场流动进入国内稀缺要素全球流动、利益全球分配的时期。

要素全球流动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但是，要素的全球流动并不意味着要素会在世界各国之间均衡配置，而是导致要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集聚，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同时也加大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造成为世界要素高地，成为资本、技术、品牌、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集聚地，也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中国仅仅作为要素的集聚地是不够的，关键是我国要在新的合作与竞争的态势下，着力培育新的稀缺要素，提高要素质量，充分利用这些要素打造自身的国家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地位。

（五）改革发展是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历史时期。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要素优势。正是这一优势造就了我国"世界工厂"之名，这也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更多的是以劳动力要素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即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经济上的迅速腾飞，也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中国因素"从数量的角度对世界施加着影响。可是，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仅占28%，而发达国家这一数据一般达到40%；中国的贸易方式也主要是低附加值加工贸易；中国出口商品中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我国经济竞争力不强，中国自1995年正式进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最具国际竞争力的49个国家和地区之列，但中国历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大多数年份处于中等偏下的位次。此外，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快，但仍然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是：高消耗、高污染。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特别是"中国威胁论"等国际舆论压力。摆脱国际各种压力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根本性转变，其路径则在于，把加工获得收入变为实现创新的投资，将通过过去30多年廉价劳动力所获得的财富转变为自主创新的资源，也就是通过教育、科技和广泛社会组织创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四、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已使中国的各项体制、机制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成效远超出当初设计者的预想。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新的问题仍然在不断涌现出来,挑战也越来越多,改革发展的任务也更为艰巨。不过,从上述中国改革发展的新问题、新风险和新特征来看,政府转型是关键。如果说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先后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历史性的课题;那么,在未来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着力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这将是我们未来改革发展的最重要目标。因为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统治的职能基本上已经被政府治理的职能所取代,所以,政府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实行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经济、管理公共事务、发展社会福利、应对社会危机和风险,以及发展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等的职能显得更为突出。而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政府的角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一)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要建设法治政府,积极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公信度和执行力。

当前,中国不少地方和不少政府官员仍然存在着较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和纠正;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权力与利益挂钩、与责任脱钩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实践中、在观念上仍然认为政府就代表法律,甚至是政府超越于法律之上。因此,建立法治政府,必须以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为重点,着力解决当前行政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使之依照法律并在法律的监督下运行。

1. 依法行政,重在治官束权。

政府官员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治官束权就是要使政府官员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特别是要使政府官员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决杜绝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治官尤其是要管好"一把手"的官。过去,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人们习惯于"一把手"说了算,即使是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一把手"决定一切的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导致"一把手"的权力处于无人监督之下,滥用权力成为常态,正确使用权力反而不正常。官没有治好其结果则是权力异化。因此,束权就是管束好人民赋予的权力,使权力真正成为服务民生的工具。对于权力腐败问题,在治官束权方面,一是教育官员要慎初,人只要向腐败的深渊跨出了第一步,那么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乃至越陷越深;二是要慎微,要教育官员不要以为是蝇头小利就可以随便据为己有,敢于拿人民一根针,也就敢于贪国家一吨金。因此,要教育官员牢记古训:勿以恶小而为之。

2. 法治政府就是要从政府管理社会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协商。

政府管理社会是人治社会的关系,但在民主的法治社会,"官"只是社会众多服务性职业角色中的一种,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人民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同被赋予者就如何使用权力进行协商。民主与法治是一对孪生兄弟,法治政府必须是民主的政府,而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民众对政府决策的积极参与。改革 30 多年来,我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政治的开放度还不够,以至于民众还只是停留在某些问题领域的听证会上。在涉及到社会重大利益的领域和问题上,民众并没有机会参与协商和决策,民众重大利益的政治表达渠道仍然受阻。因此,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从政民关系来看就是要把政府管理社会的关系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协商的关系。

3. 依法行政必须对行政审批进行"瘦身",使政府真正服务民生。

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管理的一种手段,多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改革逐步深化,社会全面进步,以及在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我国原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方式的弊端日渐突出:审批事项过多过滥,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审批程序繁琐,审批环节过多,时限长,效率低,不能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力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甚至以审批代替管理;责权脱节,审批权力与责任脱离、与权力主体利益挂钩的现象比较严重;审批引发的乱收费问题突出,许多审批项目本身,或者与之有关的审批前的鉴定、检验和年检以及办理手续都设立了收费环节;审批行为不规范,自由裁量权大,办事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导致了许多腐败问题,等等。因此,在未来深化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瘦身",使政府能够真正服务民生。

（二）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建立透明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是依法行政、高效行政的必然要求，是透明政府的本质体现。我国宪法已赋予了人民广泛的知情权，知情权的实施则需要各方面的条件。目前，在我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已形成了共识，但究竟如何建立和推进这一制度，却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认为，建立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档案法、隐私权法。因此，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必须要协调好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既要尽快修改和完善现有的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要尽快建立与之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以及清除建立这一制度在现有法律制度上的障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制定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法》，使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使民众的知情权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2.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实际上是一个信息流动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即政府信息自上而下的流动和社会对政府信息产生的信息反馈。因此，政府信息公开的机制就包括两种关键的机制：一是政府信息自上而下的流动机制；二是社会对政府信息产生的反馈信息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单有政府信息自上而下的流动机制，只是表明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并没有反映政府信息公开所要达到的目的。政府信息公开最终的目的还在于提高政府为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必须要时刻洞察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因此，社会对政府信息产生的信息反馈，对政府决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机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信息流动机制同样重要。

3. 在实践中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并建立合理有效的控制机制。

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应该向公众公开，政府拥有和掌握的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机关内部的备忘录等信息，是不宜向社会公开的。因此，在实践中，必须要确立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信息公开、透明以后，政治权力的神秘面纱就被完全揭开，政治谣言也被公开的信息所终止。但是，信息的过度公开、信息流动渠道的过度开放，会使公众在强大的信息流下难以消化，从而对过多的政府信息产生冷漠感；同时，信息流动渠道的过度开放还会使政府的健康信息在开放的渠道中被更改、被污染，从而降低了政府信息的权威性、科学性。因此，在新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必

须建立合理有效的信息控制机制。

（三）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要以经济、效率、效能为目标进行政府再造。

政府自身的建设虽然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就一直在进行，但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完全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不分的情况仍然存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更是日益严重。今天我们来谈政府自身建设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要在中国社会新一轮的转型期，以经济、效率、效能（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为目标进行政府再造，建立一个成本低、清廉、高效和风险低的政府。

1. 以经济为政府再造的目标，建立一个运作成本低廉的政府。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包揽了原本由企业、社会、中介机构甚至个人所做的事，从而导致政府的运作成本过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上升到498元，增长了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了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了12.3和12.7倍。也就是说，我国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10%上升到2005年的19.2%，超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6%的标准。而同期中国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提高了0.5%，国防、科技和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8、1.2和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挤占了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行政成本过高一直就是一个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在政府再造的过程中，必须要确保政府运作要有成本的约束，严禁铺张浪费。

2. 以效率为政府再造的目标，建立一个决策风险低的政府。

决策失误不仅会导致浪费，而且由于政府的决策影响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外部接受决策的民众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所谓的决策风险实际上是指决策的外部风险。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降低决策的外部风险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在运作成本有所约束的情况下，一个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应该是民主选举、科学决策的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把手”垄断权力、破坏民主程序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其根源也都在于此。特别是上海社保案发生以后，我们在反思的时候，矛头几乎都指向了“一把手”的权力垄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民主决策不足、科学决策不够。总之，有效率的政府必须以民主选举、

科学决策为前提。

3. 以效能为目标进行政府再造，建立一个在法律监督之下、行政能力强大的政府。

所谓效能就是指确定正确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效能政府就是指政府的目标及其行政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只有一个根本目标，那就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确定目标仅仅是行政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行政能力。因此，以效能为目标进行政府再造，就是要不断增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的行政能力。增强效能政府的行政能力，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群众的满意程度是评价政府行政绩效的根本标尺。当今，各种非传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各种突发性危机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主要因素，政府如何应对突发性危机成为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也就是说，当今以效能为目标进行政府再造，就要不断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

第一章
争论中的中国改革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在争议中启动的改革也意味着改革本身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即便是在争议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启动的改革，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面对30多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一些极"左"人士仍然不愿正视这种现实，相反却认为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制度"不伦不类"，"中国若不改革，就不会出现腐败，不会两极分化"；还有一些人士则认为，中国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不能再谈改革，而应该强调公平，"效率优先事实证明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兼顾公平往往被严重忽视"；更有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的改革还不够彻底，由于没有真正按照"普世价值"的目标改革，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诸如此类的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在歧见纷呈的争论中，中国改革也处于迷茫之中。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停滞不前，倒转乾坤，还是继续深化改革？中华民族又处于抉择时期。自改革正式启动以来，有关中国改革的争论大致发生了四次，但每一次争论之后，中国社会在改革问题上就会达成新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深化。

一、关于改革的第一次争论：要不要改革？

关于改革的第一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争论主要涉及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当时中国各阶层对改革的认识并没有完全统一。不过，实际上暗地里一部分地区在民间早就开始行动了，只是因

为没有国家的允许而偷偷地进行着"冒险性"的"试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甚至为了保护这种小范围内的"试验"而不得不采取喝血酒、签血字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党内一些领导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了不少关于改革的思想，特别是农村改革的思想。例如，张闻天针对毛泽东过于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情形指出："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改变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①]对此，张闻天进而提出，"包产到户"是个人责任制和产品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形式，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一种有效方法。随后，张闻天与彭德怀等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对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经济建设进行了直接批评，并提出了一些促进经济建设的建议。[②] 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张闻天、彭德怀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因此，小岗村的血书绝非儿戏，而是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尤其是在改革尚未进入执政党视野的前提下。

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改革正式启动以后，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并没有停止过，反而日益激烈。当时，以林涧青、薛暮桥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也就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些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人则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争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改革最初是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试点并取得成功的前提下而得以在全国逐步推广。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为了贯彻这个会议纪要的精神，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由 1980 年占全国生产队的 50%迅速上升到 1982 年 6 月的 86.7%，规模大大扩大。[③] 在联产承包制推行以后，农业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1983 年与 1978 年相比，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910 亿元，增幅达 46.3%，年平均增长了 7.8%，粮食增产了 825 亿公斤，年平均增长了 6.2%。[④] 在这种情形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发生转移，一部分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和其他农业服务业，农业中的商

①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7－148 页。
② 参见谢春涛著《庐山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1 页。
③ 参见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6 页。
④ 参见关海庭著《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 页。

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提上日程。从 1979 年开始陆续设立外向型经济特区。1980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更完整地概括了特区的性质和作用。同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规定：(1) 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以下简称客商)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客商可以独立经营自己的企业，雇佣外籍人员担任技术和管理工作。特区产品主要供国际市场销售；若向国内销售，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海关补税手续。(2) 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征税或减免进口税。企业所得税率为 15%。在对本条例发布后 2 年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或者投资额达 5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客商将所得利润用于在特区内进行再投资为期 5 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3) 各特区设立劳动服务公司。企业雇佣中国职员和工人，或由当地劳动服务公司介绍，或经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同意由客商自行招聘，考核录用，必要时可以解雇，其手续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办理。(4) 设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对特区实行统一管理；设立广东省经济特区发展公司，承办资金筹集和信托投资业务，经营或者与客商合资经营特区有关企业，代理特区客商和内地贸易往来的购销事宜。(5) 客商用地按实际需要提供，其使用年限、使用费数额和缴纳办法，根据不同行业和用途，给予优惠，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然而，针对改革所催生的包产到户、商品经济、对外开放等措施，许多人思想上出现了怀疑，甚至公然提出反对改革开放的主张，因而催生了诸如“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等舆论逆流。[①] 1983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有人甚至把商品经济的思想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把私营经济、商品经济、物质刺激和对外开放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复辟。198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了执政党的文

① 参见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3 页。

件，对改革的认识分歧最终才取得了统一。

客观地说，在改革初期，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都是正常的。尽管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已传入中国，但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只有苏联存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解释，在实践上也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是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化＋集体化＋工业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确实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一些描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换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一种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他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计划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处在人们直接的控制之下，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地阐述了消灭商品生产的历史意义，他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否定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可能性，把商品货币关系的消失和生产的有计划发展当作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后的社会生产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页。

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即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核算，将成为首要的经济规律。另外，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而社会主义实践远比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测要复杂得多。“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著作中所阐述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等同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用经典社会主义的观念来裁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规划现实社会主义”，显然要犯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①

尽管中国社会对改革存在着一些分歧，但都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几乎是一个赤贫性国家。1956 年到 1976 年 20 年间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每年平均都是 2%，也就是说，20 年间中国的人均粮食没有增加。② 在这种情形下，饥饿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一种常态性经历。农民的收入就更加少的可怜：直到 1978 年，中国农村约有 1.12 亿人每天只能挣到 0.11 元，有 1.9 亿人每天挣到 0.13 元，有 2.7 亿人每天挣到 0.14 元。③ 从社会总产值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中国社会总产值虽然有所上升，但总量是非常小的，1976 年只有 5 433 亿元，1977 年是 6 003 亿元，1978 年为 6 848 亿元。④ 中国共产党建政 30 年，但长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这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都难以向人民交代。正是在这种现实面前，首先是一些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批评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要更多地发挥、注重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观点。1978 年 7 至 9 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这表明，中共中央已从政策的层面酝酿经济改革的大政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民间自发的改革试点纳入到政府改革“试错”的框架中，并在政府的主导下，把改革试点区域不断扩大，并由政府来承担改革“试错”的政治风险。

然而，实践中“试错”的探索并不能掩盖理论上的认识分歧。1980 年 9 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了由经济学家薛暮桥等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

①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著：《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0 页。
② 陈大斌著：《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 页。
③ 参见关海庭著《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8 页。
④ 《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 页。

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试错”的实践已出现了某些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出现了某些副作用，经济过热导致了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有的人把这一切完全归咎于市场调节，并以此为依据发动了对商品经济理论的批判，认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结果，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也无法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有新的突破。随后，全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而主张重视价值规律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都不得不做违心的检讨。[①] 甚至 1983 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收录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都被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 1994 年新出版时才改回邓小平的原话。[②] 对商品经济理论的批判一直延续到 1984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

198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如《决定》所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自那以后，中国的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单单是农村的经济改革不足以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城市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对于我国经济的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① 以上的争论情况请参见吴敬琏著《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7 页。

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究竟如何来增强企业的活力呢？《决定》指出：“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①毫无疑问，该《决定》并不完善，甚至可以说也是妥协折中的产物，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正是这种有智慧的妥协，才使中国社会在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二、关于改革的第二次争论：要不要市场经济？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 1989 至 1992 年间，并在 1991 年达到高峰。这一次争论主要围绕着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展开。1988 年 9 月，由于经济上出现了过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但是，一些人又以此为由重新挑起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把国民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次年，政治风波发生以后，一些人更是把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引发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结果，一些人简单地把市场取向的改革等同于资本主义，并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②

1989 年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波，这更加把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推向高潮。一些人把那几年的通货膨胀和政治风波都归咎于“市场取向改革”。在他们看来，那场政治风波最初所指的腐败问题，也是因为“市场取向改革”。由于市场改革导致人们对利益的过度追逐，使得社会物欲横流，国家控制力下降，腐败急剧

① 这里所引内容均出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② 参见吴敬琏著《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 页。

上升，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此，改革应当采取“计划取向”，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发挥辅助作用。虽然关于改革的争论发生在中国国内，但这一争论又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这给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认为是改革导致了苏东剧变，是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地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向危机的深渊。在这种背景下，相当一部分保守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改革产生了怀疑，通过发表一系列评论，系统表明了对改革的态度：改革必须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发展生产力必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生产力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对改革的后果必须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不要过分夸大改革的作用；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市场化把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等等。①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次争论还是上次争论的延续。不过，这一次争论更加尖锐，矛头直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改革路线。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历经了 30 年的左倾路线，左的思想和认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本本上，教条主义，在实践上则表现为机械主义。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挂在嘴上，往往容易唬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再不对这些争论进行引导，中国的改革就很有可能发生逆转。所以，1990 年 12 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②1991 年 1 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又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了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

① 参见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6－19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

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从讲话的情况来看，前一段话反映了党内对改革认识的分歧，以及由此对改革造成了不小的阻力；后一段话则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并非区别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

客观地说，邓小平的讲话打开了人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迈出了一大步，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随后，关于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评论发表在一些重要媒体上，最具代表性的是皇甫平的文章。在邓小平讲话之后，皇甫平在《解放日报》上连发了四篇文章，专门讨论改革问题。第一篇发表于 1991 年 2 月 15 日，这是农历羊年的大年初一，文章的题目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应前文所提及的改革导致了苏东剧变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人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针对这种情况，皇甫平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1991 年"是改革年"，并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原话，即"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此来表明改革的紧迫性。3 月 2 日，皇甫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第二篇评论，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指出："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7 页。

要条件。”[①]由此可见，这篇文章主要是传达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时隔20天后，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开放是否会损害民族工业等的忧虑，皇甫平又发表了《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的文章。文章表示要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就将坐失良机。1991年4月12日，皇甫平的第四篇评论又见之于《解放日报》。这篇名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文章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更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

这四篇评论发表以后，犹如重磅炸弹落到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领域，持左倾观点的人们视之为“时疫”，并想方设法加以阻击和防范。

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北京一些媒介合力围剿。例如有一篇名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的文章就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另一篇名为《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还有一篇题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则指出，“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符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等等。[②] 显然，上述文章是借邓小平来反对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也是借中国共产党党章来反对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

---

① 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载《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

② 以上内容以及关于当时论战的细节问题，可参见周瑞金《上海皇甫平文章发表前后》，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这些争论一直延续到1992年初，就在中国内部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过程中，苏联已经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亡党亡国。有人竟然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保住社会主义阵地。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进行了正面回击。他的回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方面，前一个阶段主要是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承认：“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①]同时，邓小平更强调，不要因为政治风波的出现就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没有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没有错，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②] 后一阶段主要是针对1991年出现的争论表明自己对改革的主张。邓小平借1992年初到南方考察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③]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也促使了中国社会在改革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新的共识。这一共识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十四次代表大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5页。

的报告中："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

三、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怎样改革？

第三次争论始于 2004 年 6 月，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点名批评国内某著名上市公司，抨击它们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瓜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损害中小股民利益；进而质疑产权改革是瓜分国有资产的盛筵，是以跟俄罗斯私有化一样的方式在进行国有资产转移。一石激起千层浪。郎咸平"揭开了国企改革的盖子"以后，迅速在全国理论界发酵，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挺郎派"和"倒郎派"；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的观点歧见纷呈，争论中唇枪舌剑，交锋激烈，各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① 这场争论首先发生在国企改革领域，然后蔓延到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领域，到 2006 年才基本上平息，争论的实质是究竟怎样改革的问题。

实际上，这场争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就已现端倪。1996 年 11 月 20 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篇《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思考》的文章。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针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不妥，还是我们目前尚未达到他们预言的条件？作者认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叫作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

---

①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争论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李开发主编的《较量：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年版。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财产占有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就类似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

二是什么所有制最先进？以往的传统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认为公有与私有水火不能相容。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更有共存和融合的一面。什么所有制最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是从生产资料占有上怎样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我国现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实现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对我们目前的历史阶段来说，是理论上的、理想化的，不是实际的占有形式。对全民企业的职工来说，如果他们对国有资产体现了占有的话，那么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没有体现占有，他们和国有资产的利益关联度极低。他们的所有权是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所有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实实在在的占有——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的实际占有。

四是除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从有国家开始，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有制经济是各种国家都有的一种所有制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公有制所占比例多少，而在于多数人实际上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多数人实际享受到所创造的多数剩余价值。第三种所有制存在形式可能是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既有私有制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它的特征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是若干私人资产的集合，组成不可能分割的集体资产，但并没剥夺私人资产的所有权，只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因而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和社会属性。我们可以称这种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

五是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20 世纪 90 年代初批判私有化的空气甚浓。有的写文章批判道：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潜行。但是，他们根本没说清楚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的问题。作者的理解是，把国有企业无偿地或者以有价证券形式分配给职工或居民个人的行为，可以称之为私有化。在我国国情下，私有化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同时，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不是私有化。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

六是在中国私有经济是谁的经济基础？有人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作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理由如下：第一，私有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律制约的；第二，私有经济是补充公有制的不足；第三，私有经济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私有经济解决了一大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第五，私有经济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守法经营先富起来，起到了示范作用；第六，私有经济能够创造税收，创造更多的外汇。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认识，就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出发，认为所有制关系要反过来适应社会政治制度；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出发，认为私有经济发展了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其结论就是：多一份私有经济，就多一份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极其有害的。

七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讲可以有以下几种占有形态：各级政府所有的公有制；由社区集体形成并集体拥有的资产，为社区集体占有的资产，可称为社区所有制；由劳动者个人投资及合成的集体资产，由劳动者集体采取某种方式行使所有权、经营权、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由社团投资形成的资产，可称之为社团所有制；劳动者个人将其劳动所得的剩余部分转化为资本，在大公司中购入部分产权或部分股权；单位和个人把科学技术作为资本投入并与其他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资本，可称之为技术资本。以后，混合所有制在中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八是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是不是永远是无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无产阶级及其后代成为有产的劳动阶级，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目的就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对那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要在适当时机做出适当的修改。

九是上层建筑怎么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适应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要按价值规律办事，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加速完善市场机制，加速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在法制范围内逐步扩大民主。

这篇文章并未正式发表，而是在中共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所作的一篇报告。随后，这篇报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严厉地批判，被认为是“精心准备后抛出的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进而指出“经过 18 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于屈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

1997 年 1 月 18 日，北京理论界召开了一个理论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 20 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北京某学会刊出了一期《通讯》，内容是：《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通讯》指出，厉有为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文中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事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不要坚持，事关我们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加之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通讯》从四个方面对厉有为进行了批判：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私有化，化“公”为“私”，来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部分人。所以，当时与会的专家建议是：像具有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由于厉有为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无疑要惊动中南海。1997 年 9 月 11 日，国务院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厉有为回应了对他的批判。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共中央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与信心。十五大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观念。200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更进一步肯定了“资本的活力”，要求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并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即便如此，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争论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加上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原来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基本上是由内部人控制的股份构成，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贱卖甚至是无偿赠予，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隐隐地一定程度上在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后尘，如果不及早纠正，

国有企业很有可能就会被一些不法经理人收入自己的囊中。在这种背景下，郎咸平刮起的旋风自然就在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发展成为飓风。2004 年 7 月 31 日，郎咸平首先炮轰海尔"曲线 MBO"（Management Buy-Outs 即"管理者收购"），矛头直指"海尔职工持股会"。郎咸平认为，海尔此举是为了完成借壳和实现国有股权稀释。海尔的回应是，海尔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存在曲线 MBO 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所以，郎咸平教授的观点不能成立。郎咸平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驳斥：其一，集体所有制本来就是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即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着两方面的利益代表：青岛市（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内部员工持股会（本集体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而持股会的整个运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其二，张瑞敏本人是由青岛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副经理调任青岛电冰箱总厂担任厂长的，身份是国家干部，本身并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创始人。因此，仍然存在一个"信托责任"的问题。其三，即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仍然没有解释为什么持股会会持有包括商标权在内的某些优质资产的疑问。反而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持股会是否利用信息不对称，在没有通知青岛市有关部门的情况下，率先占有了企业的优质资产。其四，持股会本身还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内部职工的利益。在没有公布持股会内部管理层和普通员工持股比例的情况下，很难判定是否公平，原有的老员工是否得到了相应的补偿。8 月 3 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台上作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报告，剖析了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以较小成本"撬动"了整体产业的操作过程，并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导致的严重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他质疑整个产权制度的改革，甚至认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针对郎咸平提出的质疑，率先站出来反驳的是李开发。他指出，国有企业改革不等于化"公"为私，中小型困难国企产权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有助于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有助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随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在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时指出："毋庸讳言，国企改革中也存在一些负面现象，大约有四方面：第一，国资贱卖；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进行金融诈骗；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但是，"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他认为，只要政策得当，国有资产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并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纠

正和克服。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交易管理、定价和价款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明确的措施来防止国资流失，同时也对管理层收购提出了规范办法。[①] 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也对郎咸平的报告进行了回应，并呼吁"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②] 此外，还有一大批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周其仁、吕政等在内的著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而以扬帆、左大培、孙立平等为代表的学者则成为坚定的"挺郎派"，或主张制定反侵害国有资产法；或主张在公平、效率、改革之间寻找平衡点；或主张通过制约权力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③] 对于这次争论，参与者不仅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而且社会各界群众也踊跃参与其中。[④]

诚然，郎咸平的观点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这是因为在国企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的确非常严重。国有资产在中国具有神圣性，代表着13亿中国人的财富。但是，道义只能发挥监督的作用，并不能代替国家的发展战略。由于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下，我们对私有制存在着很深的成见，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被剥削者提供的是"无偿劳动"，因而受到批判；但对在公有制条件下会出现的大量"无效劳动"，却常常视而不见。实际上，公有制条件下的"无效劳动"比私有制条件下的"无偿劳动"更为落后，因为"无偿劳动"毕竟还在创造财富和价值，只是被少数人占有了，而"无效劳动"却不创造任何财富和价值，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利益。[⑤] 国有企业无效率问题是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假若如郎咸平所主张的那样停止国有企业改革，就意味着继续纵容国有企业内部的无效率运行。但是，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效的经济必然要代替无效的经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之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有效的经济。不过，如何建立有效的经济，当时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而在走向有效率的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争论

① 张文魁：《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不容否定》，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8月21日。
②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载《经济观察家报》2004年8月30日。
③ 参见李开发主编《较量：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187页。
④ 参见马国川著《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实》，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马国川著：《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版。
⑤ 邹东涛主编：《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也就不可避免。但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明晰产权。这一主张不仅明确了如何走向有效率的经济的问题，而且也消除了当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激烈争论。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但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做到外部制约有法可依、内部有健全的制衡机制。

四、关于改革的第四次争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第四次争论始于2009年，国内各种思潮纷纷反思改革开放的30年，有的认为中国的改革失败了，使社会主义变质了，因而不能再改下去了；有的认为，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不少领域内的改革已经出现停滞，若再不深化改革，中国社会将有累卵之危。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上一次争论的延续，主要还是围绕着所有制问题展开。但是，这次争论所涉及的范围远比上次争论要广泛得多。其中包括关于战略性问题，如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等等[①]。可以说是各种思潮歧见纷呈，但因都是出于对中国发展命运的关注，各种看法也可以说是争奇斗艳、百舸争流。这一轮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前中国改革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

关于"国"与"民"的关系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一问题的起因在于国内几次重要的企业重组。2008年以来，山西煤炭业重组，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公司，淮南矿业重组芜湖港，山钢对日钢重组，晋浙江煤企"被国有化"，等等。此外，2008年以来，大部分民营航空公司陷入亏损，鹰联、奥凯、鲲鹏等民企或被国有航空公司收购，或被政府注资接管，东星航空则破产倒闭。在房地产行业，国有企业不断抢占市场份额，一些主业并非房地产的央企也纷纷涌入。2009年上半年，在一线城市成交的总价排行前十的商品房开发地块中，60%的高价地块由央企获得。国有企业的投资占全行业投资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4.83%增加到2009年的8%左右。在钢铁行业，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的山东日照钢铁公司被亏损的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收购，民营的宁波建龙钢铁公司被宝钢集团所兼并。此外，一些大型国企还通过并购民企等方式

① 这些争论在后面的各章中都有专门论述，这里暂不赘述。

进入新的行业，如中粮集团收购蒙牛，华润收购苏果等案例。针对这些现象，一些学者对国有经济挤占民营经济生存空间表示出忧虑。陈志武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因为在法律、规则和政策面前，国企和民企是不平等的"。[①]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认为，"国进民退"意味着市场改革的倒退，会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倒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葬送改革的成果。[②] 邓伟认为，"国进民退"并非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受国有企业过多的留存利润、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国企的支持等体制性因素扭曲所致。因此，"国进民退"不仅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进，还会在民营企业的发展、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优化、金融风险和增长方式的转型等方面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③]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当前，积极发展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合理的、必要的，攻击"国进民退"是毫无道理的。[④]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认为"'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从企业数量来看，在 1998 至 2010 年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 6.47 万家减少到 2.03 万家，只相当于 1957 年(4.96 万家)的 40%左右，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 39.22%下降到 4.47%；从企业产值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49.6%下降到 2010 年的 26.6%，而同期的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从 1998 年的 3.1%上升到 2010 年的 30.5%，扩大了 10 倍；从就业人数来看，1998 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从 3 748 万人下降到 2010 年的 1 886 万人，总量减少了一半，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 57.2%下降到 2010 年的 19.2%；从企业利润看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

---

① 陈志武：《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载《经济观察报》2009 年 12 月 7 日。

② 张曙光、张弛：《经济增长回升国进民退堪忧——2009 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http://www.unirule.org.cn/index.asp。

③ 邓伟：《"国进民退"的学术争论及其下一步》，载《改革》2010 年第 4 期。

④ 周新成：《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兼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载《当代经济研究》2010 第 4 期。

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在 1998 至 2000 年间有小幅上升外，在 2010 年已下降到 27. 8%，但与此同时，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则从 1998 年的 4.6%上升到 2010 年的 28. 5%；从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上看，在 201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总额中有 71.7%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贡献，私营企业的贡献仅占 14.6%；全部应交增值税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贡献为 37.2%，私营企业的贡献为 27.0%。2007 年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制度和增值税改革试点，已大幅降低了私营企业的总体税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贡献率由 2007 年的 61.8%上升到 2008 年的 68. 9%，并呈进一步上升的态势，而私营企业则从 2007 年的 17. 9%下降到 2008 年的 14.6%。[①]另外，还有学者引述了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2004 至 2008 年国有企业由 17. 9 万户减少到 14. 3 万户，减少了 3. 6 万户，减幅达 20%；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由 198.2 万户增加到 359.6 万户，增加了 161.4 万户，增幅为 81.4%。2008 年与 2004 年相比，中国企业资产中，国有企业资产所占的比重下降了 8.1 个百分点，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则增加了 3.3 个百分点。因此他们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②] 鉴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国进民退’这一提法和论断，无论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上，还是在市场竞争的微观操作层面上，或是在国企私企发展的趋势上，或是在理论与概念的准确性上，都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如此，批评、指责或赞同都是多余的。”[③]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国进民退”，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国退民进”，必须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注资与兼并，其实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非“国进民退”。[④] 当前中国真正的“国进民退”表现为：一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加速增加；二是政府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三是国有企业以及一些超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凭借价格和其他资源占有上的垄断地位，快速地进行资本积累和自我扩张。结果，在当今中国全社会的资产总额中，政府所有以及国有企业所支配的资产份额越来越大，而个人家庭以及民营经济所占的份额则越来越小。[⑤]

在这一轮争论中，虽然是围绕着究竟是否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而展开

① 胡鞍钢：《“国进民退”现象证伪》，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② 项启源：《对“国进民退”争论的深入思考》，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③ 卫兴华、张福军：《当前“国进民退”之说不能成立——兼评“国进民退”之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④ 袁恩桢：《“国退民进”与“民进国退”的争议背后》，载《探索与争鸣》2010 年第 6 期。
⑤ 韦森：《什么是真正的国进民退?》，载财经网，2010 年 2 月 9 日。

的，但实际上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改革是否出现了逆转。一般人们都会认为，“国进民退”就意味着改革的倒退，国有企业事实上的低效率，是与市场化改革背道而驰的。相反，“国退民进”则意味着改革的继续，因为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打破无效率的垄断，引入市场竞争。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注资与兼并，其实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不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改革是否逆转。再说，即便是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出现了“国进”，但国有经济并非都没有效率，国有经济也并非都是反市场化的。另外，有学者概括了“国进民退”的五项危害：第一，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市场机制；第二，它削弱了民营经济，也就削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得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营经济的盛衰荣枯为标志的；第三，从理论层面来说，国有经济的垄断性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第四，“国进民退”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隐患，潜伏着更深刻的社会危机；第五，“国进民退”符合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①] 于是有学者据此认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改革观，并进一步指出，“国进民退，改革倒退”论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与资本主义改革观的又一次交锋。[②] 由此可见，这场争论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来越浓，甚至出现了“扣帽子”的现象，已远远超出学术争论的范畴。笔者反对将对“国进民退”的看法与社会主义改革观与资本主义改革观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仅仅是对当前中国改革的不同看法而已。当然，笔者也不赞同杜光所说的“‘国进民退’符合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看法。即便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果我们能有完善的法治，那么国有经济就不会是“符合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仍然是提高社会公众整体福利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笔者赞同“‘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问题争议的深层次矛盾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看法”[③]的观点。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关于“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论就真的没有意义了。[④]

改革固然要争论，因为改革没有现成的方案，必须在广泛的讨论后再制定相应的方案，以免造成决策失误。但是，从过去 30 多年的四波争论来看，并非是围绕着方案上的争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囿于传统观念、传统思想、传统认识、传统

① 杜光：《“国进民退”的危害和根源》，载《炎黄春秋》2010 年第 3 期。
② 项启源：《对“国进民退”争论的深入思考》，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③ 袁恩桢：《“国退民进”与“民进国退”的争议背后》，载《探索与争鸣》2010 年第 6 期。
④ 郭树清：《争论“国进民退”、“民进国退”没有意义》，载《人民日报》2012 年 6 月 4 日。

思维等束缚，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等缺乏科学性的认识。简而言之，所有的争论就在于思想没有解放。

不过，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是一个极易接受新生事物的社会。尽管对改革有多种看法，最初甚至有不少人反对改革，但在经过争论之后，对改革的看法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也反映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擅于学习的民族。一旦认定一种新生事物，就会接纳它、包容它，并促成其成长。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在争论中获得了新知识，最终也在争论后形成了关于改革的新共识。正是这种共识使改革步步推进、步步深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二章
争论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从一个经济严重短缺的国家成长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得不使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奇迹产生了兴趣，不少西方学者转向了对中国的研究，并试图探究成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开始了中国模式的讨论。虽然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肇始于西方学术界，但国内学术界最早关注这一问题，只不过没有直接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最初，国内学术界主要是探讨经济转轨方式，且更多的是置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比较的视野下来探讨的，并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激进模式是失败的，相比之下，中国“双轨制”的渐进模式却取得了成功。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这里不必枚举。不过，这些成果研究的视野是比较狭小的，基本上局限在经济领域之内。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在社会民生诸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国际学术界开始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战略的大视野来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及其根源。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① 雷默在《北京共识》的报告中提出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要素；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发展；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更为重要的是，雷默

* 本章主要内容发表于《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修改和补充。

①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 2004 年 5 月 7 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的，当年 5 月 11 日他在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北京共识》的中文版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英文版参见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May 2004.

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认为“北京共识”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全新发展模式，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本来讨论的高潮很快就过去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深受金融危机的袭击而陷入困境，但唯独中国经济似乎独善其身，很快就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四川汶川爆发了特大地震，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所展现出的“举国体制”的优势，令世界对中国的整个体制刮目相看。在这种情形下，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又重新升温，国内外学术界更加深入地认识、探讨中国模式。

一、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最早提出“中国模式”的是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他在《北京共识》的报告中认为“北京共识”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全新的发展模式。不过，雷默并没有对“中国模式”进行定义，只是从政策层面概括了中国的一些做法，从而给学术界留下了更大的研究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才歧见纷呈。有极力推崇者，有谨慎赞成者，有赞成但又加以批评者，还有极力反对者，回顾这几年的讨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仍然莫衷一是。

当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时，处处都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进行对比，认为“北京共识”是“华盛顿共识”的“终结者”。结果，一些学者也是基于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而来肯定“北京共识”的，使得“北京共识”一出来就是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而存在的。鉴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认为“北京共识”应取代“华盛顿共识”而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① 但是，冷静的学者却对“北京共识”的提法在肯定的同时也怀有相当大的谨慎，一方面他们承认，在国内外许多人把中国的成功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时候，雷默却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模式，“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北京共识”的核心不在于“共识”，而在于“北京”这个中国的象征，强调中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以照抄照搬的样板，只是把

① 何恒远：《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转型意义》，载《上海经济研究》2004 年第 9 期。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绝不是“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应走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①] 一方面接受“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认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北京共识”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只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已。[②] 甚至有学者直白地说，“要慎用‘共识’一词”，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③] 这种谨慎的肯定一直延续到今天用来对待“中国模式”。

谨慎对待中国模式的观点承认中国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但主张不要直接说出“中国模式”。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长期以来，现代化发展模式不只是一种发展道路，它蕴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相对的东西提出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④] 这显然超出了西方思维中所接受的范围，会被西方视为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进而认为中国模式是对西方的威胁。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在赞成中国模式的同时又把它作为批判对象的原因。例如，英国专栏作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不祥之兆：21 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书中就写道，中国的增长模式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利用国家力量掌控银行资金流向并故意压低人民币币值等，从长远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中国不放弃中国模式而采取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价值观念来化解由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问题，就难逃失败的命运。[⑤]

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趋同化，现代化也不是西方化。全球化强调的是“和”而不是“同”，现代化也不是“西化”，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应该有各自不同的路径和模

① 张幼文、黄仁伟等著：《2005 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② 俞可平、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 年第 5 期。

③ 郑永年：《切莫夸大“北京共识”》，载香港《信报》2005 年 2 月 15 日；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第 5 期。

④ Timothy G. Ash, “China,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The Los Angles Times*, September 11, 2008. 另外还可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关于这一种看法，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⑤ 参见 Will Hutt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Verso 2007.

式。因此，别拿西方标尺衡量中国模式。众所周知，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结果，而是基于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伟大创举。在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因害怕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而不敢用中国的话语来概括自己的经验和发展道路，那么，中国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说明自己呢？中国又靠什么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呢？

极力推崇中国模式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是中国“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更是一种特殊且出色的利益平衡方式，用“中国模式”来总结中国的经验，“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①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他们总是在黑白对立的认知框架下来认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但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替代模式。因此，中国模式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②

然而笔者认为，盲目推崇或否定中国模式都是不科学的。“中国模式”强调的应该是“中国”即中国发展的特殊性，而不是“模式”即所谓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强调特殊性在于表明，西方模式并非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模式，相反现代化道路是可以根据不同国情来选择或开辟的。当今中国的成功则更表明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强调“模式”，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意义，其他国家可以复制利用，那“中国模式”就真的成为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了。③

极力反对中国模式存在的学者认为，所谓模式就是固定成型的，其内部构型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路子，所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甚至连在西方都承认的中国经济模式，国内极少数学者也强调，“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④ 由于中国政府能够

①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另外，坚持用“中国模式”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研究成果还有徐贵相所著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韩保江所著的《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江金权所著的《“中国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②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③ 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④ 陈宪：《自由市场、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载《文汇报》2009年9月19日。

对经济领域实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这种经验也很难为其他国家所复制。在社会福利制度、外交理念等方面都不具有可复制性，因此“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①

对这一看法，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中国的发展确实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另一种理解是所谓固定的模式很有可能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物的，如果不是或不像西方模式，那么就不能成为模式。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没有认同西方的政治理念，因而中国就没有模式，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方式。另一种理解的错误不言自明，发展模式显然不是只有西方一种，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是否是模式，其本身就犯了“模式化”的错误。以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为由来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改革最初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随着路线图的日益明晰，中国的改革转为“看清石头在哪里之后再过河”；再后来，中国的改革蓝图就更加清晰，改革也变为“埋好石头再过河”，即知道河道哪里宽、哪里窄，河水哪里深、哪里浅，从而知道应该在哪里“埋下石头”更有利于“过河”。由此可见，中国模式的确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方法或道路，而是不拘于任何一种成法的思维方式与实践精神，是一种什么好就拿来，有多少好就拿多少的“拿来主义”。这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

究竟是否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笔者认为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模式”？应在这一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来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模式”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义是指“模范”、“典范”、“榜样”，相当于英文中的 Model 一词。在这一层意义上，“模式”是可以效仿的，但效仿并不意味着要原原本本地复制。“模式”的第二层意义是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是理论的抽象，而不是一个固定成形的既定模胚，与英文单词“Pattern”相近，意思就是 a recognizable way in which something is done, organized or happens。在这一层意义上，“模式”不仅是经验的总结，而且还是未来行为的方法，它指明了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走向何处、如何达到未来的目标等。因此，如果只从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来衡量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显然是对“中国模式”的狭义理解。同样，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盲目地加以推崇，会导致把中国模式视为一成不变的模式，这必然会陷入机械主义

① David Shambaugh, “Is there a China Model?” *China Daily*, March 1, 2010；[德]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第 5 期；Leo Horn-Phathanothai, “Challenging the China model ”, *http: // www. chinadialogue. net/article/show/single/ch/2643-Challenging-the-China-model*, 2008 - 12 - 19。

的泥沼，对中国改革是有害的，会导致中国社会全面停滞。我们如果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那么不仅难以理解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还因为我们是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认识中国模式的，从而会把"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① 笔者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更愿意从"Pattern"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模式。在这种情形下来理解中国模式，我们就不能极力推崇它，因为即便是成功的经验，也不能复制到另一种实践当中去；即便是理论的指南，任何理解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是有缺陷的，它需要在中国新的现代化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中国模式虽然指的是中国的内部发展问题，但却有着十分特殊的历史和国际经济背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沿用的是"苏联模式"。苏联解体之后，福山提出了"历史总结"之说，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社会经济的过渡似乎在实践上应验了福山的观点，以为中国也会走向"华盛顿共识"。然而，与福山的预料相反，中国没有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是走向了可调控的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不仅使中国成功地应对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而且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所以，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学者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西方学者第一次公开认为"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新的发展模式"。② 而最近又有西方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审慎考察中国的发展史后，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更深刻地剖析了中国模式的内涵。③ 从国内学术界来看，以下三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不用论"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改革在探索中发展，也没有固定成形的框架，另一种是所谓的"代价论"，认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能成为模式。这种观点显然对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表现出相当大的不自信。"慎用论"的观点，虽然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中国如今还是发展中国家，因而要继续"韬光养晦"，不要冒犯西方，不要公开说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惧外"的表现，是谦虚中透露出谦卑，也透露出思想上犯了"西方恐惧症"。"必用论"的观点，主张全面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认为正是中国模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表明了

①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②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May 2004.

③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ium Books Ltd, 2009.

中国的自信。不过，这种观点在表达中国自信心的同时，也要避免让国际社会因中国的自信而认为中国"傲慢"和"强硬"；同时，也要避免因担心西方国家散布"中国模式威胁论"而放弃自己的自信。

二、为什么要用中国模式？

当前，国内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主张，用"中国道路"而不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过去30余年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① 但是，回顾鸦片战争以来17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历代先进分子所探索的就是一条中国道路，这种探索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②

从1840年到1919年的旧民主主义时期为探索中国道路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先进分子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震撼下开始自觉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开始是"师夷长技"，也就是走西方优先发展技术的现代化之路。当时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亲眼看到了西方技术文明的先进性而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发展构想，这一构想实际上被后来的洋务派所吸收，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形成了"自强"、"求富"的现代化宏图。然而，"中体西用"是在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依靠政府的财力来兴办近代工业，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封闭、随意性、缺乏进取心的中国农耕文

---

①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的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5期；周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韦定广：《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李世坤：《对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思考——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左宪民：《论中国道路的辩证特性》，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3期；左宪民：《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解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等。

② 关于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庆五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道路探索至今至少有120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30年，即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30年中的探索证明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这个30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光明的前景；第三个30年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在东方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长征。在这30年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第四个30年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道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参见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①] 结果,中国现代化之路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就停滞了。

不过,中国先进分子的探索并没有停止。在外族的侵辱之下,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心再次燃烧起来。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使日本社会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危机而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胜利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倡导者,主张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蓝本来规划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但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落后性再次暴露无遗。在这种文化视角下,变法者被视为"异端"受到耻笑、谩骂,甚至惨遭杀戮。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再次受阻。但是不久,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彻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而极力推崇美国和法国,特别是以美国的政治体制为榜样,并试图通过"揖美追欧"来实现"旧邦新造"。然而,旧势力的篡权致使民国"变味"了,中国社会新旧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呈现出山重水复的现象。正如辜鸿铭所说的那样,头上的鞭子剪掉了,但整个民族心中的鞭子却很难剪掉!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后乱象丛生,也使中国现代化在辛亥革命后陷入穷途末路。

从 1919 年到 1949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探索中国道路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扛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落后的农耕文化,主张用"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再造",从根本上掘掉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基因。也正是在这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化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以俄为师"走俄国式的道路。但后来中国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俄国的革命道路走下去,而是开辟了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特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独特的创新精神,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也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从 1949 年到 1979 年是探索中国道路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在东方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长征。但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①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分析,请参见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0－254 页。

设毕竟缺乏必要的经验，在当时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①]，并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照搬过来，甚至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与此同时，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也历经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巨大挫折，最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才全面回归正轨。

1979年以后，探索中国道路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历经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经济特区的设立、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各项体制的改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至今中国已全面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一阶段，是中国道路走得最顺畅、取得成就最大的历史时期。

从上述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过去170年的历史，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是成就巨大的还是陷入困境的，毫无疑问都是中国历代先进分子探索中国道路的一段历史，属于中国道路的一部分。但是，在过去30年中的这一段中国道路显然与历史上任何一段历史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即"社会平等奠定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础；贤能体制选取有能力和德行的人进入政府，并以表现作为衡量政府好坏的标准；制度的有效性使得中国的制度转型比较平稳，并可能创造出新的制度形态；中性政府确保政府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从而放开手脚采取选择性的、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②]中国道路的这些特征需要有新的理论概念来概括，如果我们仍然用"中国道路"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表达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伟大成就，那么就很难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与此前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实践区别开来。而用"中国模式"则是最好的概括，但又不仅仅是一种概括。原因就在于"道路"与"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别。

所谓"道路"是指已经走过之后两地之间的轨迹，在没有走过时就不是道路，它是没有方向的荒野、丛林甚至沙漠，抑或是绿洲，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在何处都是不知道的。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政府能够对经济领域实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这种经验也很难为其他国家所复制。在社会福利制度、外交理念等方面都不

① 关于这一问题更详细的研究，请参见许毅、隆武华著《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孔寒冰：《并非一方选择的结果——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具有可复制性，因此“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① 这实际上是错误地理解了“模式”的含义。前面已经就“模式”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模式”还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这里更多的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使用“模式”这一概念。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实际上是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认识中国模式的，而模式并不只有西方模式一种。如果用西方模式作为衡量的标尺，实际上就是把“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其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担心西方把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而主张慎用中国模式，或不用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惧外”的表现。②

当然，中国模式只能是中国现代化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能适用于中国现代化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实践。那么，中国模式依存的时空条件是什么呢？

从时间维度来看，当前学术界的争论也是很多的。在承认中国模式存在且也承认中国模式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是否就是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是一致的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始于鸦片战争，那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时期呢？如果把中国现代化仅仅放在当代中国的视野中来考察，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就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产物？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看法：

一是把“中国模式”的逻辑起点定在 1978 年，认为是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才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道路，才造就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在时间维度上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指中国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仅仅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不宜将其推演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诞生，甚至近代中国。③ 30 多年来，中国模式在实施运作中是阶段性推进的，即一是从 1978 年到 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解决了“松绑发展”的问题；二是到中共十七大前夕，解决了“借力发展”的问题；三是中共十七大以来，解决了“转轨发展”的问题。④

---

① David Shambaugh, “Is there a China Model?” *China Daily*, March 1, 2010；[德]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第 5 期；Leo Horn-Phathanothai, “Challenging the China model ”, *http: // www. chinadialogue. net/article/show/single/ch/2643-Challenging-the-China-model*。

②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

③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请参见程恩富《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模式》，载“人民网·理论频道”，2009 年 3 月 12 日；王玉凯：《中国政治模式及其完善》，载《学习月刊》2009 年第 1 期；胡项伯、孔祥宁：《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 年第 3 期；蔡拓：《探索中的“中国模式”》，载俞可平、黄平等著《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0 - 321 页，等。

④ 李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三大历史性突破》，载《新湘评论》2010 年第 4 期；与此类似观点的研究成果还可参见谢海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结构变迁的轨迹和模式》，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陈志：《“中国模式”概念刍议》，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 年第 3 期。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多得的样本。①

二是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有学者指出,不能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分开,"中国模式"的时段应该包括共和国的六十多年。潘维认为,中国的成功就在于中国"以 60 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中国模式直接源于 60 年的'试错'……中国模式是 21 世纪的新版中华体制。"②在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这本论文集里,所有作者都围绕本书的主题"解读人民共和国 60 年"展开论述,从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探讨了"中国模式"60 年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创造的世界奇迹。他们的观点都把中国模式置于新中国 60 年的历史中来考察,并没有明确分为前 30 年和后 30 年,并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关于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成功之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在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问题上同样是"六十年"论者,但他把 60 年分为前后 30 年,认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分为两段,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 30 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成就。前 30 年可以理解为"试错"式的发展,为后 30 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 60 年。③

笔者认为需要从时间的内在逻辑看中国模式。从时间条件来看,中国模式是新中国 60 余年的探索最终形成于改革开放 30 余年之中,但中国模式还很不完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实践来完善,所以中国模式将完善于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时期。但是,理解后 30 余年的历史需要理解前 30 年的历史。没有前 30 年的探索就没有后 30 余年的成就。但笔者不赞同把中国模式的范畴覆盖共和国 60 余年的时间,不过,认识中国模式又不能完全不考虑前 30 年的历史。有学者认为,中国在 1979 年以前所有的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或者由于中国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或者中国是效仿日本或欧美,即便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也没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最多只能算是"中国道路"的"前史"。④ 笔者认为这有割裂历史之嫌疑。可以这样来理解:前 30 年只是中国模式的准备期,跟中国模式的内涵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前 30 年是"试错"的探索,错误居多,不

① 秦宣:《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②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 页。

③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韦定广:《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

过这些错误对后30余年的意义重大；后30余年是“试错”的改革，但成功的占压倒多数，这些成功直接造就了中国模式。不要以为中国模式只是后30余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凝固不变了。恰恰相反，中国模式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去完善。同时，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国模式，既是过去改革开放30余年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建国后30年教训的总结，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动态蓝图。

从空间条件来看，中国模式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也就是必须要把中国模式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空间维度来认识，超出这一空间维度，中国模式就不存在。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中国模式只是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① 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静态地认识中国模式，虽然它把中国模式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场景中，但却对中国模式只是进行了“一次性认识”，或者说是“一次性的总结”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模式就没有发展的意义。

二是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经过了百多年的戮力复兴，经过了60年的建设创新，走上了一条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人维护和平、营造和谐、保障发展的特定方式。所以说，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这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②

笔者认为，从空间维度来理解中国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必须要强调：

一是中国模式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离开了中国文化土壤，就不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形成首先得益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包括“黑猫白猫”之说、“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等，都是中国独特思维方式的结果，而思维方式是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是因为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由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模式的智慧

① 杨学功：《全球化与“中国模式”——兼谈雷默的“北京共识”》，载《学术界》2010年第1期。
② 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来源，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模式的精神养料。

二是中国模式只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离开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不是中国模式。一切宏伟蓝图都必须基于社会实践，中国模式也一样，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的政治模式是新中国60多年甚至是近代中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尤其是30多年改革开放政治实践的产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探索过多种政治发展模式，但都先后失败了，最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实现了政治解放，并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即政府"供给型"的政治模式。而这种政治模式也正是中国良好社会秩序的必要保障。[①]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过去30多年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最直接产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苏联模式，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从驱动机制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是以"法律之治"为核心引导的经济改革，也不是以"权威之治"为先导来控制的经济改革，而是走了一条特殊的"政策之治"的路径，即在利益的诱惑下，以政府为主角、以政策为导向的经济驱动方式；[②]从经济发展的路径来看，中国采取的是既保持原有体制中积极的知识存量，并把它作为进行制度创新的基础；同时又在制度的"基础设施"还保留的前提下，直接进入到核心制度安排的创设，在核心制度安排建立后，再回过头来进行制度的"基础设施"的改造，也就是所谓的"存量不动，增量先行，增量带动存量"的方式。中国的社会模式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到今天所形成的一个"需求型"的公民社会模式，即公民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在价值取向上保持相对一致，且不仅共享行政网络的价值，也共享行政网络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参与、经济参与等行为合法化"消费"行政网络所提供的各种资源，从而通过作为行政网络的重要补充而发挥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③]

三是中国模式只能适用于中国社会，离开中国社会来推行中国模式就会犯机械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某种模式，也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使用。因为模式的形成受初始条件制约，同样该模式的使用也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性。中国模式形成的初始条件

①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② 李曙光：《中国的经济转型：成乎？未成乎？》，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③ 与中国的社会模式不同，西方的市民社会是作为行政网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且通过批评行政系统来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详细研究请参见邓正来著《中国发展研究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462页；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就是中国社会状况，中国模式只能在中国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其效应。离开中国的社会条件来谈中国模式，并把中国模式的适用空间扩大到中国社会之外，是错误的，也会被外界视为是一种威胁，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威胁"。[①] 因此，要避免把中国模式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而向外输出。

三、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

用中国改革没有固定的方法、路径和中国模式尚未成形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西方模式也一直在变化中，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模式。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经济上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而布莱尔时代则重新国有化，但谁也不能否认英国模式的存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存在着不同的执政方式，但美国模式也不会因此而消失。由此可见，只是模式的"边界"在变动，其核心和骨架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模式也一样，中国 30 年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其"边界"、"外围"是不断变化的。中国模式正是通过这些变化而不断得到调整，并因此不断走向完善。

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模式的内涵，主要是指中国模式的核心架构，即骨架或内核。要避免把中国模式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不能把凡是积极的成分都放在中国模式的"袋子"中。如果把所有中国积极的成分都放入中国模式中，很可能会对中国模式产生误解和曲解。中国模式的骨架是相对固定的，且中国模式是特定时期、特定空间的一个概念。特定的时间，就是指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最突出的时期；特定的空间，是指中国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任何超出这样的时空条件来讨论中国模式，都会导致对中国模式内涵的不正确理解。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基本上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而刻意回避中国模式的其他方面，甚至否认中国模式还有其他的内涵。[②] 即便是从经济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也没有真正揭示中国经济模式的实质性内容，大多数学者只是看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表象，而没有发现中国经济

---

① 参见 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Portfolio Hardcover，May. 2010。

② 参见 Susan L. Shir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na*，Berkeley，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模式的内在要素。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西方媒体包括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之时，往往只是从表面现象来解释，并提出了所谓的"廉价劳工论"、"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威权政府论"等。但这些都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性原因。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还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相互配合的调节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体制等。① 实际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即：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② 这四大要素的合力作用才促成了当今中国的经济奇迹，这四个方面正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关键要素。

但是，中国模式的内涵远不只是在经济方面，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③，而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中国社会模式的结果，中国的社会模式则是中国模式的内核。④ 因此，除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之外，还必须从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综合分析。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提出了组成中国模式的三个子模式：即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⑤ 潘维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模式，但缺少了对中国文化模式、中国外交模式的分析。潘维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了这种缺陷的存在。即便如此，这仍然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最完善、最全面的概括，也是从理论上对中国模式最详尽的分析。当然，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潘维的观点。

关于中国经济模式，潘维从经济的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的相互关系上，阐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四大支柱：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

---

① 刘宝三：《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点思考》，载《江汉论坛》2009 年第 4 期。

②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③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④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 页。

⑤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页。

地使用权；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任何经济制度，包括经济体制的创新，都应该包括三个核心内容，即说明经济模式或者说经济体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和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①] 显然，潘维的中国经济模式只概括出“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至于支撑经济体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和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没有涉及。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意识形态上不仅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也超越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落地”在中国获得普遍性的认同。这是中国经济模式合理性的关键所在。从资源配置机制来看，中国经济模式不仅解决了资源配置的手段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国”与“民”谁优先的问题。在“国”与“民”之间，“民”具有优先性，即改革首先在“国”的“蛋糕”暂时不动的前提下，对“民”进行改革并产生利益增量，从而为改变“国”的利益格局奠定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中国经济模式的“产出型”特点，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潘维的文章中却没有提及这一关键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要分析中国的政治模式。不过，西方在讨论中国政治模式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并且总是拿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政治“不民主”、“不透明”，是“极权主义模式”。关于中国政治模式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一般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论述的，这方面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多。相比之下，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政治模式的却很少，在这方面，一些境外学者先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政治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是较早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使用中国政治模式的学者。它指出，民主化不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政治发展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对于这些目标而言，秩序和物质基础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保证秩序和物质基础的政治安排。[②] 张维为从中西方政治发展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模式，认为中国政治模式是一种把“选举”与“选拔”结合起来、把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结合起来、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安排。[③]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

① 乔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经济学家》2009 年第 2 期。

② 郑永年：《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开放时代》2007 年第 4 期；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③ 张维为：《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社会观察》2010 年第 3 期。

面揭示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但是，这仅仅是阐述了中国模式的现象或者说是政策上的某一具体做法，并没有真正揭示中国政治模式的内涵。国内对中国政治模式研究比较深入和详细的是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他从四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的“民本”政治模式：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①] 这里的“民本”政治模式包含了政治主体、政治运作的构架、政治文化，但作为政治安排的政治模式还应包括政治决策的方式。但是，潘维所说的中国政治模式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式，他把“应然”作为“实然”。例如，在官员遴选机制中，应该强调功过考评，但实际上缺乏必要的客观标准，在很多情况下，上级领导的主观标准往往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执政集团应该是“先进、无私、团结”的，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以后，党的相当部分干部继承革命党时期的优良传统较少，反倒是染上不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恶习。这部分领导干部也许是少数，但败坏了执政党的形象，玷污了整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此外，在党政系统里面，由于“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必要、有效的监督，纠错机制往往依赖于上级领导的“明察”，否则很难实现有效的纠错。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优势在哪里呢？从中国 30 年的政治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决策方式简单、抽象地说是一种“中心供给型”模式。从政策的制定到推行都是政府主导下的，即便是有些改革举措是从民众中开始试验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但最终也是在纳入政府的政策后才在政府的主导下得以全面推行，因而它风险小。这种“供给型”的模式既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良好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更是促进中国迅速发展的政治原因。当然，这种模式对于集中资源解决脱困问题是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的，但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所以，它根本上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政府决策机制上的表现。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最终要体现在转变政府决策方式上，使政府决策能够更经济、更注重效率和效能。

关于中国社会模式，学术界一般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来探讨的，认为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层模式，这是社会学的解读，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这里仍然是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模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是空白，唯有潘维第一个采用了这一概念并进行了详细剖析。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直接原因，是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分

①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 页。

散流动的家庭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和行政网络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络；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①] 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社会模式最全面的概括，但也看到其中还是有所欠缺的。虽然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单元、社会网络构成、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关系等，但在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关系问题上，潘维认为两者是重叠且相互依存的，但实际上两个网络是有区别的，而且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是社会网络依存于行政网络之中，甚至可以说是行政网络的一个特殊部分。这是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区别之处。西方的市民社会是作为行政网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且通过批评行政系统来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中国的市民社会网络虽然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培育起来的，但这个网络与行政网络在价值取向上保持相对一致，且通过作为行政网络的重要补充而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从实践来看，其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远比西方市民社会要好。[②] 中国的市民社会网络不仅共享行政网络的价值，而且也共享行政网络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参与、经济参与等行为合理化地"消费"行政网络所提供的各种资源。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模式是一个"需求型"的模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原因在于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由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模式的智慧来源，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提出"文化模式"的是梁漱溟先生。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第一次从现代化的视角用这一概念赋予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此后，就鲜有人再论及这一概念，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从文化学视角来阐述不同民族的文化结构，而没有涉及文化对现代化的意义。

那么，从现代化意义来看，中国的文化模式是什么呢？沿着潘维的逻辑，笔者认为它也由四大支柱构成："重天道"、"法自然"，着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生命本真价值提升的自然主义；强调"人最贵"、"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

①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2 页。

② 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作用请参见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5－462 页；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5 页。

灵"的人本主义；反省自我、提升自我的内省主义；"克己复礼"的礼仪主义。四大支柱融和了道、佛、儒三家之精粹，乃至其他众家之所长，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基本框架。但是，这里并没有体现出文化模式对现代化的意义。其实，文化本身对国家的现代化是不直接发生作用的，它是通过滋养和塑造国家的品格而对国家的现代化发生作用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曾说过："品格在重大的时刻表现出来，但它却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刻形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过多次重大时刻并成功应对，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的品格"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滋养下形成的。"中国的品格"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中华文明所打造出来的一种特有品质。[①] 这是中国现代化能够走到今天的文化根源。

中国文化并非是一种单质文化，从主脉来看，中国文化主要是儒、道、佛三家：道家以"道"为本，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和生命本真的价值提升；儒家以"仁"为本，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的内在价值的提升；佛家以"德"为本，强调人内心的和谐和心智价值的提高。但是，中国文化并非仅此三家而已。在中国文化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中国边缘少数民族文化还是非中国文化圈的其他文化，一旦进入中国文化环境后，都会被吸收和接纳，成为其自身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与包容性的统一，中国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包容型"的模式。

中国的外交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热议中国外交模式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后，而且主要是从中国软实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是否对西方构成挑战等方面来讨论中国外交模式的。仅 2008 年，美国多家机构的研究报告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但都认为中国的崛起目前还不足以抗衡美国的实力，但把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做出如此详细和扎实的比较，显示美国对"北京模式"已不再轻看。[②]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外交频频评论，认为中国的对外模式，尤其是务实外交，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那么，中国外交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也应该包括四大支柱：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式；政府外交为主与公共外交为辅但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的外交手段；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外交政策基石。

---

① 楼宇烈著：《中国的品格》，南海出版公司 2009 年版，"再版赘言"，第 1 页。

② 参见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http://www.gpoaccess.gov/congress/index.html; The Chicago Council of Global Affairs,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dynamic_page.php?! d=75。

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观包括中国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气候观等一系列有关世界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性主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式包括独立自主、国家主权和国际利益至上、不结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等政策主张；政府外交的目的在于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二者"各司其职"但又相互补充；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外交政策基石，这不仅包括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也包括中国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处理中国的各种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等策略主张。由此可见，中国的外交是以天下主义为理念、以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为视角来观察世界、以"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来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软实力优先的一种模式，是一个"内敛型"的模式。

四、怎样认识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脉。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毫无疑问具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模式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通过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而彰显了中国软实力的重大提升。

从前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在于：

第一，中国模式的成就昭示了世界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一条，任何国家都可以从本国国情出发，开创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众所周知，欧洲先于其他地区迈进现代化的门槛，因而一直抢占着现代化的话语优势。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看来，西方国家已经用自己的历史经验向全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美景，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要按照西方的方式逐渐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即可。[①] 结果，那些走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就往往被视为"异端"，中国模式也不例外。然而，中国模式尽管还不完善，但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再次表明，现代化绝不是"西化"。历史事实也告诉人们，摆脱西方模式和西方中心主义，才能真正成功地走上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

---

① 参见 John Martinussen, *Society, State and Market: a guide to competing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1997, p. 35。

第二，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也必然要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不是孤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换言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开放性的，封闭的现代化模式永远行不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复杂性，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化屡屡被提上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①]但都屡屡受挫，包括新中国建国后的前 30 年，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其原因就在于，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句话道出了中国模式的灵魂所在。

第三，中国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用于世界其他国家也会成功，任何国家照搬中国模式、复制中国模式都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任何国家都必须要付出自己的创新成本。复制一种模式也许会有一时的收益，但绝不会有一劳永逸之效。当年乔舒亚·库珀·雷默研究“北京共识”时，提出了它的三个定理，第一个定理就是创新，即“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③] 同样，创新也是中国模式的精髓。正如奈斯比特所说，中国通过 30 年的改革发展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④]

从后一方面来看，作为中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模式，其意义在于：

第一，不管是否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对中国模式的热议都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上升。众所周知，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被国际社会广泛热议。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也普遍关注促成中国崛起的中国模式，有赞同中国模式的，认为正是中国模式支撑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发展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⑤]有反对中国模式的，认为“虽然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有部分因素单独来说是独有的，但是它们不能构成一个全面的一贯的

---

①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事实上对外维持着一个与西方相对孤立的东方朝贡体系，对内则用“天道”的观念、“大一统”的思想和“纲常伦理”维持着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成熟过度而在慢慢腐烂之中”的封建秩序，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才被提上日程。参见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一章；陈廷湘、周鼎著《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一章。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 页。

③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载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4 页。

④ 参见［美］约翰·奈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9 年版。

⑤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Penguin Books Ltd, 2009, p. 185.

'模式'——更不能容易地被他国借鉴";[①]还有的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把中国模式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将对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及经济的长远健康状态造成很严重的后果"。[②] 简言之,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威胁"论。但是,不管是否承认中国模式,国际社会都关注中国模式,使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成为一个热词,这就意味着"中国元素"正在国际社会增多,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上升的集体体现。

第二,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并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不仅是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基本方略,而且它直接就转化为中国的软实力。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并不依赖于硬实力,而且在奈看来,软实力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③] 但实际上,庞大而坚实的硬实力也可以直接转化为软实力,也就是说,有形的物质资源也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近年来被世界广泛关注的情况就是中国的软实力,但中国之所以被广泛关注,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为什么能够快速提升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以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按照制度主义的说法,制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程或准则。简而言之,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制度软实力,而且由于中国模式的成功而使得中国制度软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第三,承认中国模式存在,但把中国模式作为"异端"来加以批判的,实际上是西方在自身走向衰落且面对危机又难以摆脱的情况下,而对中国的奇迹产生的一种嫉妒和无奈。美国学者彼得·蔡汉在《中国:关键时刻》的报告中认为,中国经济的缺陷在于内在不稳定性、资本利用的低效率、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和浪费。因此,中国经济及中国模式必然崩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④] 英国专栏作家威尔·赫顿在《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书中

① David Shambaugh, "Is there a Chinese Model?" China Daily, March 1, 2010.

② 参见 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Portfolio Hardcover, May. 2010.

③ [美]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页。

④ Peter Zeihan, *China: Crunch Time*, 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00329_china_crunch_time.

也指出，中国"列宁式社团主义"增长模式——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利用国家力量掌控银行资金流向，并故意压低人民币币值——从长远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其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发展，而成为21世纪的巨人。如果中国不放弃中国模式而采取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价值观念，来化解由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问题，就难逃失败的命运。[①] 把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相对的东西提出来，对于西方而言，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②] 其实在欧美有一批学者持这样的看法，在中国模式的成绩面前，他们无法否定中国模式，但又因意识形态的偏见而不得不批判中国模式；不得不承认是中国在危机中拯救了西方，但又担心中国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挑战。这种情况实际上从反面衬托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客观事实。

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大多数学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的，认为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外部来看，它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效仿的一种模式，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在中国崛起的映衬下，西方的衰退显得更为严重，所以中国模式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也是西方学习的榜样。显然，这是浅层次上的意义，并没有涉及其实质。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的意义，笔者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假若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手段是中性的，谁都可以使用。因而，中国模式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中国可以用，其他国家也可以用。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那么，中国模式具有特殊的价值取向，中国模式的意义就应该主要是在中国自身，即便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也是通过对中国自身的影响而对世界产生间接的借鉴作用。如果把中国模式的意义集中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之上的话，那么，那些经济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在金融危机之下经济陷入困境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可以采用这种模式来促进经济发展。不过，赞同中国模式的学者有一个共识：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发展战略。如果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就把它的内涵缩小了，把它的使用范围扩大了。无

① 参见 Will Hutt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Verso 2007.

② Timothy G. Ash, "China,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The Los Angles Times*, September 11, 2008. 另外，还可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论是把中国模式的内涵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两种情况都错误地理解了中国模式的意义。

二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在特殊文化背景下、在特定国情下形成的、只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还是不分文化背景、不分国情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战略？如果是前者，那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模式就只能适用于中国。任何超出中国的范围来谈论中国模式的意义，都是对中国模式的错误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现在越来越担心中国模式会成为西方模式的威胁，担心中国把自己成功的发展模式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问题还不仅在于此，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在不少国家包括部分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所以，西方感到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现实挑战已经不可避免。① 在西方看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巨大"产出效应"早就对西方产生了"经济威胁"，而且中国政治模式的超常动员能力也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优势，更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讽"，是美国政治制度强有力的"竞争者"。② 实际上，西方主观上有意在把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模式"被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沿着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创造的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③而不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共识"。

三是中国模式究竟只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史的总结，还是在此基础上勾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假若中国模式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最多是一种经验性，而且这种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应将慢慢消退。假若中国模式既是过去 30 多年的历史总结又是未来发展的蓝图，那么它就具有长期性的效应。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把 30 多年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中国模式"，是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概念可以概括。"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概念，有不少学者在使用，但这些概念的内涵显得太小，不足以概括过去 30 年这段历史的丰富实践及其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过去 30 多年中，中国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发展滞后，而是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

① [英]吉迪恩·拉赫曼：《崛起的中国是真正的对手》，载《金融时报》2010 年 3 月 16 日。

② [美]哈罗德·迈耶森：《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载《华盛顿邮报》2010 年 3 月 31 日。

③ 胡伟：《"中国模式"的深层涵义与世界意义》，载《解放日报》2009 年 9 月 27 日。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模式就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还创造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对历史总结的意义与对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相比，两者虽然都很重要，但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四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还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是封闭型的；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那么它就是扩张型的。显然，两种情况都没有真正揭示中国模式的意义。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中国模式的意义体现在既要着眼于内部的发展，又要兼顾外部的拓展，但主要目标是内部的发展。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模式的责任。中国模式是中国实践的产物，它必须回应中国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中国的实际是，内部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现象，改革、发展、稳定仍然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发展进程的三大战略性问题，而发展则是中国的重中之重。[①] 因此，中国模式首先是要解决中国内部的发展问题。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关联性使中国的发展又必须关注外部的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内部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不得不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与自身身份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从而有效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利益。这样，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就成为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意。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内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作为中国内部发展的模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治理。

综上所述，要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就要坚持内涵与使用范围的统一，即要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它被使用的范围；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即要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发挥中国模式的功效，而不可使之成为全球的价值取向；要坚持历史与未来的统一，即中国模式既是中国过去 30 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架；要坚持内部与外部的统一，即中国模式是中国内部的发展战略，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也需要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某种全球治理的作用。当然，中国模式还不完善，需要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必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的基本骨架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在基本骨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而在内容和机制上

① 胡键：《“中国责任”与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7 期。

不断创新。

最后还要强调两点：一是中国模式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更不宜把它政治化；二是中国模式不是儒家模式，不宜把它儒家化。

中国模式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中国过去30年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时间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一种设计，因此，中国模式也不是一种价值观。作为经验的总结，模式具有可借鉴的意义。这就像苏俄革命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样，但别的国家借鉴苏俄革命的经验并不意味着一定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革命的方式。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危险的。中国革命最初按照苏俄的方式走，结果走不通，最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中国的革命道路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借鉴苏俄革命成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探索出来的。同样，今天的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昭示了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可以有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都要按照中国模式来搞，而是从中国模式当中获得相应的经验，并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来探讨自己的发展模式。

把中国模式视为某种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西方的一厢情愿，或者是西方可以为中国模式贴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标签。而他们把中国模式贴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标签后，不是为了更好地来认识它，而是把中国模式至于对立面来加以批判。例如，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自由市场的终结》一书中指出，中国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仲裁者，由国家来推动投资和制定规则。经济危机后，这种国家控制经济体的崛起将对美国不利。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最终驱动不是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政治（国家权力及领导阶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当人们为了政治目标而开发市场时，将导致全球经济的价格扭曲及不平衡。更重要的是，政府授权的商业关系逼走了跨国公司等自由市场竞争者，这样“将对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及经济的长远健康状态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是对美国的“威胁”。直接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认为中国模式将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西方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是哈尔珀。他认为，中国市场威权主义输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之争”。市场威权主义的要义与所谓的“发展模式”并无多大关联，很大程度上与“意识形态之争”有关。哈尔珀指出，中国模式可以在维护精英阶层执政地位的同时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拥抱“中国模式”，也就意味着接受威权主义的统治规则而拒斥多元化的民主政治，这将削弱西方金融和意识形态的规导作用，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之争”的原因所在。哈尔帕反复强调，

中国模式更大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集团的全球网络，不是在军事或经济上挑战西方，而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抗西方。当然，中国的这种强势输出并非自愿，而是潜移默化的“榜样效应”，它并不具有意识形态野心，也没有意愿向别国推销其治理模式，但其影响是强大的——中国正在悄悄地重塑国际秩序。

虽然哈尔帕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有一点他是正确的，“中国的这种强势输出并非自愿，而是潜移默化的‘榜样效应’”。他承认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并没有主动去输出“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视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是西方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中国和中国模式。因为在西方看来，现代化模式除了西方模式之外，没有别的模式。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就像否认世界上叶子的形状具有多样性一样，是一种机械主义的错误。

当我们强调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时，很容易陷入另一种极端，即把中国模式完全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孕育中国模式的精神土壤，而且它本身又成为中国模式的构成要件。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国模式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有学者把中国模式视为“威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上模仿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控制言论自由；认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家和教育，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建国后，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并被附以巨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三家组成，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脉。于是，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模式的“威权”是儒家的政治“现代版”，而资本主义则是对西方的借鉴，因而中国模式总体上来看就是儒家模式。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模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中国模式，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模式也将消亡。“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文精神，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儒家强调“修身”，通过“克已”来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道家倡导通过内心的修养来实现道德的提升；佛教提倡“内省”，这正是中国模式中人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特别是儒家思想主张以“仁政王道”来化导天下。“王道”就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从而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恰恰是中国模式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但是，把中国模式儒家化，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这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模式的内在自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建设也就是中国模式的自我解释，概

括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最好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中国模式就是通过“民族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至于中国模式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相结合后在当今中国实践发生效能的资源性要素，但它不是中国模式的全部内容，更不能代表中国模式。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不少元素在当今仍然有不少积极的内容，但这些元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并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这也正是中国模式的生命力所在。

第三章

知识、制度、利益：理解中国改革的三个维度*

中国的改革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但近年来对中国改革的理解越来越简单化，甚至仅仅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之类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改革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① 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问题，即便存在，仅仅用这样一个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是不科学的，它会导致对中国改革的理解片面化。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同时也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重大利益调整。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涉及到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即只有在有效的制度下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经济增长则是确保利益增长的必要手段，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整体性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制度创新并非是毫无依据的，必须

---

* 本章主要内容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修改。

① 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如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May 2004；江金权著：《“中国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徐贵相著：《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韩保江著：《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ium Books Ltd, 2009；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1 期；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的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 5 期；周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韦定广：《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李世坤：《对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思考——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 年第 3 期；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5 期；左宪民：《论中国道路的辩证特性》，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左宪民：《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解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 年第 1 期等。

要在一定的知识存量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制度创新的成功，否则制度创新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本文将从知识、制度和利益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的改革。

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学术界的成果所见不多。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分析经济结构（即制度）变化的原因时，不仅涉及了收益（即利益）问题，而且也指出了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除非基础知识存量增长，否则，新技术发明最终将陷入收益递减”，“知识存量和技术存量扩大人类福利的范围，但它们不决定人类在那些范围内怎样达到成功。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①] 从诺斯的这段话来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其一，知识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其二，知识并不决定经济结构的变革方式；其三，诺斯所说的知识并不包括制度和技术，而仅仅是指科学知识。后来，也有学者如拉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提及知识对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但他所说的知识特指社会科学知识，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②] 这里所指的知识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也包括制度和利益。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改革，主要是分析中国改革在处理存量知识与增量知识的关系上对改革的经济绩效产生了哪些影响。

制度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包括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等文化因素。制度学派主张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有的学者如诺斯与托马斯等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是“制度决定论”者。[③] 然而，制度主义主要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在意作为知识一部分的制度在变迁中如何对待存量知识，而更多的是关注增量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所考察的制度与知识的关系，不仅强调制度创新中增量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存量知识对制度变迁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利益一般而言是制度变迁的目标诉求，它通过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平表现出来。改革是否成功往往是通过经济增长来衡量的。几乎所有研究转型经济理论的成果都不得不关注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平，但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并非一个而是多个，有的情况下，改革的方式不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经济增

① ［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7－18 页。

② 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2 页。

③ 参见 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1 页。

长，也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也就是说，从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单维度来理解改革可能也是不合适宜的。不过，本文反过来理解，符合国情的改革方式一定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的方式并没有对与错之分，关键是要看改革的方式是否符合国情，只要符合本国国情，无论是保存知识存量的渐进式改革，还是摧毁知识存量的激进式改革，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有成功的个案。这里所谓的成功与否，既是指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制度，并且能够通过制度持久性地发挥作用而实现经济增长。

一、制度设置：特别重视知识存量

制度是指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更通俗地讲，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制度设置安排，即是在保持中国社会既有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而进行的一种制度设置。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制度设置，它至少包含着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根据已有的历史实践大致有两种方式，即"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方式。这正好可以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实际相对应。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方式被称为渐进主义的方式呢?[①] 不少学者以过渡的时间和速度来评判过渡方式，过渡时间短、速度快就是"大爆炸式"的，反之则是渐进主义方式。[②] 这只是表象并没有触及其实质。实际上，中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大区别在于，俄罗斯摧毁了原有的知识存量，是"休克疗法"，而中国则充分尊重知识存量，把既有的知识存量作为制度设置的基础，这样，其过程

---

① 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就有学者把中国的过渡称为"渐进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整体上是渐进式的，而在具体问题上则是激进式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包括废除干部终身制，18 个月后，90%的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离退休了，采取了赎买的办法，包括多发一个月工资，维持级别待遇等。参见李稻葵：《官僚体制的改革理论》，载吴敬琏主编《比较》(7)，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进入 21 世纪以后，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渐进式过渡又重新进行了定义，主张用"平行推进"来概括中国的体制转轨方式。参见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② Alan Smith, Shock Therapy or Gradualism ? Economic Controversies with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 Vol. 72, 3772, No. 4, 1994；张东辉：《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8 页。

就表现出渐进式的特征。

所谓知识存量是指在某一时点上社会总体所具有的知识总量，或者说是某一系统特定时点的知识储备水平。[①] 制度设置的过程离不开初始条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最大的特点是对自身的初始条件非常敏感。[②] 这种初始条件就是知识储备水平。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面对的最大现实是观念问题，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念是否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这是决定中国选择过渡方式的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深受苏联的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③]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观念上的知识储备还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因此中国在实践中仅仅是非常有限地吸纳了“商品经济”的成分，即推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198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认识虽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但“市场经济”的观念仍然没有被接受。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一步一步加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虽然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机制运行上，中国经济已经较大规模地采用了市场调节的方式。这实际上是通过实践来推动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1992 年 2 月，邓小平南方讲话关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把中国社会关于市场经济的观念知识储备水平提到了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社会推行市场经济可以说已经是水到渠成。因此，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知识存量包括物质性的知识储备，也包括精神性的知识储备。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念在社会化发展进程中有很大的惯性，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中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因而更新观念和提升观念知识的储备水平，不可能一蹴

① 李顺才、邹珊刚、常荔：《知识存量与流量：内涵、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 年第 4 期。

② 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述请参见拙著《转型经济新论——兼论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第一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6 页。

而就。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容易的，可以通过革命式的手段，将原有的经济制度彻底摧毁。但是，在毫无知识存量的前提下重新进行经济制度的设置，那么这种新的经济制度能够发挥积极的功能是值得怀疑的。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制度设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无效率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中国的经济制度重新设置的过程启动早、建成晚，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进行制度设置的过程中，特别尊重知识存量尤其是观念方面的知识存量。否则，中国也会陷入因观念上没有共识而导致新的制度设置与社会主流观念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经济严重滑坡。这样的制度设置是与实际目标背道而驰的。

以上是中国精神层面的知识存量，中国物质层面的知识存量则是落后的农业国。中国改革的目的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把落后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国。但是，建立现代工业社会决不能像原苏联那样靠全力以赴地发展重工业而实现。由于苏联在建立时也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它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但是，苏联的工业化是畸形的，因而其工业社会也是畸形的。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苏联最后走向解体的一个经济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的前 30 年中，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但无论是以消除小农经济为目标的农业集体化还是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忽视了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现实，即忽视了物质性知识储备水平。

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中国认识到落后的农业社会知识储备的现实，不改变农村、农业、农民的窘境，无论中国的工业怎样发展都摆脱不了落后农业社会中"三农问题"的制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解放农村劳动力，所以中国在当时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由于家庭联产承包释放出巨大能量，农村众多劳动力由从事农业的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移，加快进入二、三产业。1984 年至 1988 年被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黄金时期"。据统计，这期间从事非农业农村劳动力从 5 028 万人增加到 9 545.5 万人，增长了 89.8%。① 这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预留了大量的"劳动力红利"。在物质性知识储备水平提高的前提下，中国的改革才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内部改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0)，中国年鉴社 2000 年版，第 1812 页；《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9 页。

革发展到对外开放。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物质性知识储备还是精神性知识储备也都随之不断增多，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制度设置也开始跟国际规则接轨，特别是在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今天，中国更是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

不仅经济改革是这样，政治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从政治体制来看，中国政治体制的知识存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建政史。中国的政治传统一是天下主义的意识形态，[①]二是"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观念。[②]天下主义实际上是作为对外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在天下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家国同构体是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甚至也无确定民族为依托的集合，任何实现儒家伦理的地域、民族都可以纳入这一家国同构的道德共同体中。由此可见，从所覆盖的范围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要远远超过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世界主义，后者基本上还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前者则是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对内而言，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大一统"的观念。根据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黄仁宇先生认为，黄河文明是华夏文明最主要的源头，黄河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建立在其之上的人类文明的特性。它根据地理环境提出了"大一统"传统的三个理由：一是因农业劳作时代人类抵御自然侵袭的条件很差，比如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除了不断地迁徙，就只能依靠有组织的赈济一途。二是黄河流域诸侯竞争，"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③]所以，资源上的集中能够在生存竞争中更具备优势。三是气候因素，气候和雨量的差异使得中原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塞外则以牧畜为务。当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④]这种生存竞争迫使国

①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赵汀阳：《天下主义的一个简单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② 朱其永：《"天下主义"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③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页。

④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

家必须扩大其规模，才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应付不间断的外部侵袭。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主体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生存和有效又必须统一成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以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局面，否则伴随组织支离破碎而来的必然是长期的饥荒、动乱、羸弱和个人极度的贫穷。实际上，时至今日，"集中和资源办大事"的观念一直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包括在抗震救灾、扶贫、应对其他重大危机事件时。

由此可见，尽管天下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一统"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但本质上都是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中国政治传统思想的两翼。也正是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一些学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华帝国，导致了文化集团和政治集团的认同观往往相互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接近于一致；在儒教传统和集权主义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的有选择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通常根源于高度乌托邦的集权主义取向，极易成为孕育专制与集权现象的文化土壤。[①] 不过，无论是对外的天下主义还是对内的"大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秩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尤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②]

从中国社会领域来看，中国社会领域的知识存量也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单位制社会，二是总体性社会。所谓单位制社会，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单元，承担着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与调控、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控制的基本功能。[③] 另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是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化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它承担着多元化的功能，包括社会控制、权力分配、资源和地位分配以及单位成员的合法性等。[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及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⑤] 但不管是从

---

① ［以色列］S·艾森斯塔特著：《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1－284页；朱其永：《"天下主义"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② 赵汀阳：《天下主义的一个简单表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③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王沪宁：《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中国意义》，载《复旦学报》1990年第4期等。

④ 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⑤ 李璐璐、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载《社会》2009年第4期。

哪个角度来分析“单位”，都表明“单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一，单位职员完全依赖于单位组织；其二，单位组织是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组织手段；其三，单位组织是单位职员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领域；其四，单位中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不仅是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机构，同时也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着党和政府。[①]

这些特征决定了单位具有功能合一性、非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内在性质。[②] 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另一种知识存量，即总体性社会。在这一总体性社会中，通过单位制这个组织中介，并借助于严密的单位组织系统，中国社会形成了极强的国家动员能力；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单位制，过去的“国家—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可以将各种资讯直接传达到民众手中，但民众却没有有效的形式实现自下而上的沟通，社会秩序完全依赖国家控制的力度；单位制使得全部社会生活呈现出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③]

实际上，单位制和总体性社会是“大一统”政治观念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表现形式，而计划经济则是“大一统”政治观念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形式，中国社会的知识存量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要改变任何一种领域的现状就必然带来另外领域的变化。不过，相比之下，在这三者之间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更为深远，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遗传密码”。这种“遗传密码”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之路上不能一次性摧毁既有的知识存量，而是在充分尊重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基础来发展知识增量；同时在知识增量不断壮大的基础上来不断淘汰与时代不相符的知识存量。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复杂进程，也展现出中国改革的复杂性。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新的制度设置一直存在着刚性需求，但因中国社会的知识储备不足，知识存量不足以进行新的制度设置，因而制度创新尽管有冲动，但难以转化为实践。即便有小规模的实践，也只是战战兢兢的，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积累知识储备的一种自为行为。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一方面，知识储备的自为行为上升为一种自觉行为；另一方

①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第 5 期。

② 李璐璐、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载《社会》2009 年第 4 期。

③ 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第 1 期；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5 期。

面，制度设置在知识储备水平的提高过程中也同时在有序地进行着。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也就水到渠成。

二、制度创新：优先拓展知识增量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仅仅尊重知识存量是不够的，尊重知识存量是为了更稳妥地获得和拓展知识增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优先拓展知识增量。转型经济理论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优先发展新制度。[①] 这是制度创新的目标要求。新制度正是知识增量最重要的一部分。所谓知识增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制度增量即新制度，二是指利益增量即新收益。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制度创新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虽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是不断提高利益增量，以解决社会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但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利益增量。也就是说，利益增量的产生有赖于制度增量，新制度才能带来新收益，没有制度增量就没有利益增量。

当今中国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存量不动、增量先行"。"存量不动"是对知识存量的尊重；"增量先行"意味着优先发展新制度，以产生利益增量。中国拓展这两种知识增量的过程具体表现为：

一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不断增加被认可的市场经济要素，随着市场经济要素的不断增多，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逐渐构成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就形成了两种可以比较的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双轨制"。

二是在保持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其外部培育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为竞争性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各种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而这种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利益增量便是在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产生的。

上述两方面并不是两个过程，两种知识增量也并非是在两个没有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相反，不仅上述两个方面实质上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两种知识增量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相对于国有计

① ［俄］A·布兹加林、B·拉达耶夫著：《俄罗斯过渡经济学》，佟刚译，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 页。

划经济而言是新的市场要素，这些新的市场要素在竞争与合作中构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就是制度增量。而利益增量也主要是在民营经济、私营经济中产生的，国有经济由于继续维持着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充其量是保值，而不会形成增值。

不过，上述过程只是产生知识增量的一次博弈情形，而实际上知识增量的拓展是反复博弈的过程。在第二次博弈中，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转化为知识存量，而国有经济则反过来成为知识增量。如果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市场主体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一直发展下去，而国有经济一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保持不动，那么国有经济会在市场的比较利益之下全面萎缩，这样，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就会丧失，受其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被市场彻底掏空。因此，在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在市场机制下得到大幅度发展之时，壮大国有经济就不得不提到改革日程上。

究竟怎样来壮大国有经济？没有别的方法，唯一可以参照的是国有经济外的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在市场上成功的示范效应，促使国有经济改革朝向市场经济。因此，在市场效益的诱致之下，国有经济的改革也正式引入市场经济机制，通过借用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采用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不过，最初国有经济的改革也是谨小慎微的，当然所谓“存量不动”，也并非是如泰山般纹丝不动，其实国有经济内部也在进行某些变化，自我渐进地进行着知识储备水平的提高。最初是放权让利。从 1979 年 7 月开始，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1983 年 4 月，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利改税的改革；[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1988 年 4 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1992 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目标的确立，国有企业正式确立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 年以后，国有企业全面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与此同时，企业法人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也初步建立起来。

虽然国有经济改革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政企、政资并未真正完全分开；

①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Ⅸ—83－86 页。

股权多元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国有独资或一股独大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法人治理结构还很不规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企业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还未根本改革，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还未真正建立；由于企业冗员、资产负债率高等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市场退出机制也没有真正形成，以致企业效益差的状况还难以根本改观，等等，但是国有经济的这些改革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的知识增量得到大大拓展。正是这些新的知识增量使中国能够有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的新挑战。

当国内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国内经济体制及其产生的利益又成为知识存量，并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基础，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所形成的更为广泛的一体化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国际利益，则成为中国社会新的知识增量。众所周知，在没有开放之前，中国与世界是隔绝的，即便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也没有自己的国际利益，中国的利益基本上是界定在国内。然而，随着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跟外部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所有内部的利益和制度安排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知识存量。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最重要的是如何最大可能地拓展外部利益。由于市场的巨大传导效应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巨大联动效应，外部利益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知识增量。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社会从两个方面从外部获得了新的知识增量：一是制度塑造，二是利益拓展。从制度来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此前主要是对内部制度建设发挥作用，而在国际制度的塑造方面缺乏机会和能力。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初期主要是学习国际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社会的讨论话语，而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越来越深入，中国的话语能力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形下，国际社会开始被迫把部分话语权不断地“让渡”给中国。2006 年 9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84 个成员投票通过了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投票权的决议，从而使这四个国家在该组织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根据上述决议，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的投票权从 2.98%提升至 3.72%；2010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确认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 6%的投票权，而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不足 3.91%升至 6.394%，超越了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①] 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内，中国的话

①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htm, February 11, 2012.

语权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拥有相当一部分对世界经济秩序建设的发言权，而这种知识增量在中国社会中是前所未有的。

从利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日益密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中国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公民的国际活动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延伸到海外的中国国家利益急剧扩大。因此，中国从海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增量，即中国的海外利益。所谓中国的海外利益是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产生的、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存在的、主要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利益。① 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内部与外部的互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最近 10 多年来，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力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1 年增长了 4.6 万亿美元，占同期世界经济总值增量的 14.7%。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 年至 2009 年，中国出口量和进口量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7%和 1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总量 3%的年均增长速度。②

经济领域的知识增量能够明显地被人看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增量不易被人看到。于是，中国社会的改革给人的感觉是只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根本没有改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中国的改革同样是采取了优先拓展知识增量的原则，不断推向深入。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③

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开启了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进程。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剖析了中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所以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

① 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8 期。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2011 年 12 月 7 日。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6 页。

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①] 从那时起，中国政治体制内部就不断加入知识增量。首先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1980 年 9 月 2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就辞去了所担任的职务。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式决定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同年 12 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机构人员的任期做了明确规定。至此，离退休制度被确立为党和国家干部人事的一项基本制度。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把这一制度完善到顶点。[②] 这应该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知识增量。中国政治体制的另一个重要知识增量是中国共产党组成成员的重大变化，即从 2001 年 7 月 1 日起，中国共产党吸收优秀的私营企业家到自己阵营来。这一重大创新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工农联盟到包括一个代表社会和经济‘先进’方面的广泛基础”。[③] 这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时相比是不可想象的。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中国政党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从政治权力运作和政治参与来看，2003 年 SARS 以后，政府问责制引入到权力运作的程序中；同年，孙志刚案以后，在公民的直接参与下，国务院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4 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④]

从社会领域来看，中国社会也在不断促使社会领域的变迁，而且这一领域的变迁是直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的。客观上来说，社会领域的增量知识往往会对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具有天然的瓦解功能。但是，中国并没有因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而放弃社会领域的改革，而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3 页。
② 沈大伟著：《中共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4 页。
③ 沈大伟著：《中共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 页。
④ 董云虎：《“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载《人权》2004 年第 2 期。

社会领域自然地吸收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新知识，并将其不断转化为构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重要元素。这些新知识首先是从民营企业的改革成果中释放出来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为"非单位组织"的成长开拓出广阔的空间，而"非单位组织"成长起来以后，很快"抢占"了单位制度的部分空间，且成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一部分。虽然民营经济处于"体制外"，但也需要"体制外"的秩序来维持自身的运转，于是逐渐形成了单位制度之外的"非单位组织"，它们通过自身的存在而消解单位组织的社会功能，从而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其次，社会领域的新知识也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并且成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主要元素。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的行政职能特别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基本丧失，更多的是履行其经济职能，因而掌握着更多的经济资源。随着国有企业社会管理功能的消退，各种"非单位组织"迅速获得了成长的空间而主动"接管"了国有企业的社会管理功能。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原来掌控的关于社会管理方面的资源，也随着其功能的消退而逐渐"让渡"给逐渐成长起来的各种"非单位组织"。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为社会领域的新知识既"让渡"了空间，也释放了资源。而社会领域的各种新知识在通过"以时间换空间"和"凭空间占资源"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壮大起来，成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中最重要的元素。总之，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整个社会中的利益主体由一元变成了多元，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识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随之也变得愈来愈明确；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非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急剧扩张，迅速成长。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等诸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在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下，中国的单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

改革是重大利益结构的调整，难免要产生一些社会矛盾。但是，中国内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并非如有的媒体和西方人士所说的是由于中国执政党对社会控制紧的缘故，也并非是因为中国政府把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社会维稳工作，而是由于中国社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知识增量在不停地转为社会的知识存量，使下一步的改革获得了物质基础，特别是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新的知识存量成为了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的重要物质后盾。也正因为如此，优先拓展知识增量往往容易成为社会的共识。

① 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载《社会》2008 年第 3 期。

三、利益调整：整体性利益增长和社会普遍性收益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马克思还曾指出，要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关系是理解社会阶级关系的金钥匙。甚至可以说，社会一切动荡的最初原因都是经济利益关系。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转型进程中，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根源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过渡方式，而在于这些国家在过渡进程中没有处理好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国家制度创新过程中过于强调制度的建立，而忽视了新制度是否带来新收益，即便在社会大多数成员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制度创新的进程仍然强行推行下去，其必然的结果是社会成员为了减少自身利益过多受损而采取抵制制度创新的策略。于是，国家主导的制度创新进程与社会层面的利益增值欲望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有时甚至发生流血冲突。从俄罗斯、东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教训来看，成功的制度创新不应该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更不能超越民众的可接受程度。②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俄罗斯、东欧那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尽管中国的过渡方式普遍认为是渐进方式，而是因为中国在这个过渡进程中，利益的调整是整体性的利益增长和社会普遍性收益。

整体性的利益增长在中国是指国民财富的整体性增长，这种整体性增长首先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4 062.2 亿元人民币；2000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99 214.6 亿元人民币。20 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 24 倍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 10 年中，中国经济规模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 4 倍多（数据见表 1）。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达到 9.5%，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82 页。

② 关于转轨方案的选择问题可参见樊纲著《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七章。

③ 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年国内生产总值

年 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GDP 亿元	4 062.2	4 545.6	4 891.6	5 323.4	5 962.7	7 208.1	9 016	10 275.2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GDP 亿元	12 058.6	15 042.8	16 992.3	18 667.8	21 781.5	26 923.5	35 333.9	48 197.9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GDP 亿元	60 792.7	71 176.6	78 973	84 402.3	89 677.1	99 214.6	109 655.2	120 332.7
年 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GDP 亿元	135 822.8	159 878.3	184 937.4	216 314.4	265 810.3	314 045.4	340 902.8	401 202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库相关各年的统计数据整理而得。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一定是财富总量，但从经济的层面反映了国家的实力。国家实力的增长是中国社会改革能够顺利推行下去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也是中国社会在改革问题上能够形成共识的重要基础。如果说最初中国社会对改革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包括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经济特区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是否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等。但是，随着国家实力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动力推动下不断增强，所有的问题逐渐淡化，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对改革形成共识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任何社会变迁都会产生新矛盾、新问题，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最根本办法是利益协调。特别是当政府出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时，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调动。如果政府仅仅是讲大道理、说空话，问题和矛盾就不能及时解决，即便是问题与矛盾淡化，那也是因为政府因缺乏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资源而绕开了问题与矛盾。而国家实力的增强，对内而言就是使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

中国社会产生对改革形成共识的另一个重要物质基础，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普遍性收益。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问题，陆学艺研究员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即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十大社会阶层。① 李强等则根据改革以

①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情况将中国社会成员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①] 两种划分的标准虽然不同，但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两个阶层在中国社会中掌握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最少的，因而大致可以归入社会底层群体。如果这两个阶层和群体在改革中都获得了增益，那么掌握这些资源超过这两个阶层的其他各阶层和社会群体，无疑会在改革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客观地说，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群体的增益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从农业劳动者来看，1978 年以来，中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直线上升，从 1978 年的人均纯收入 133.6 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5 153.2 元，30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38.5 倍(数据参见表 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0 年，这一数据上升到 5 919 元，2011 年再次攀升到 6 977 元。从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情况看，虽然国家无法对这一阶层的收入进行统计，但作为中国社会最弱势的一个阶层(也就是中国社会的贫困人群)，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国家给予了必要的救助与扶持。最直接的扶持方式是国家给予最低生活保障补贴。1993 年 6 月，上海市率先试点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时确定的保障标准是月人均收入 120 元。厦门紧随其后于 1993 年 10 月也开始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后，青岛市于 1994 年 6 月，福州、大连和沈阳也于 1995 年 1 月实施了这一制度。1999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并于当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十多年来，各省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不断提升。上海从 1993 年月人均收入的 120 元上升到 2011 年 12 月的 505 元，其他省市也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②] 从全国来看，1997 年全国城市低保资金投入只有 2.9 亿元，到 2000 年这一数据已上升到了 21.9 亿元，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7.5 倍。[③] 新世纪的前十年里，这个数据继续飙升，从 2001 年的 41.6 亿元上升到 2010 年底的 524.7 亿元，十年中增长了 12.6 倍。[④]

---

①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5 期。

② 民政部http：//files2.mca.gov.cn/cws/201202/20120209130151390.htm。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 页；民政部发布的"2010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106/20110600161364.shtml。

表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状况

年 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元)	133.6	191.3	397.6	686.3	708.6	784.0	921.6	1 221.0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元)	1 577.7	1 926.1	2 090.1	2 162.0	2 210.3	2 253.4	2 366.4	2 475.6
年 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
(元)	2 622.2	2 936.4	3 254.9	3 587.0	4 140.4	4 760.6	5 153.2	5 919.0

* 2010 年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不仅城市底层居民直接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普遍性收益增加的同时，农村的弱势群体也获得了国家有力的救助与扶持。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全国逐步推广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救助农村经济困难的居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制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探索，进入 90 年代，全国不少地方进行了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到 2005 年底，全国有 13 个省份、1 308 个县(市)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①] 从低保金的投入来看，1999 年只有 3.7 亿元，2000 年到 2004 年的五年中，各年的农村低保金投入分别为 7.3 亿元、9.1 亿元、13.6 亿元、16.9 亿元(2003 年没有统计数据)。[②] 这段时期国家投入的资金不多，且增幅也不大。这与农村低保制度尚未完善有关。但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随着农村低保制度的完善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国家投入的资金大幅度提高，不仅低保对象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各年的增幅也在提升。2007 年国家投入的低保金是 109 亿元，2008 年上升到 228.7 亿元，增幅为 109.6%；2009 年投入 363 亿元，增幅 58.7%；2010 年投入 445 亿元，增幅为 22.6%。[③]

当底层民众都能从改革中获得收益的时候，改革就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普遍性收益，也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的最重要的保证，也是推进中国改革的最大动力。即便是有部分社会成员在改革中存在着相对受损的情况，但这部分社会成员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获得了利益补偿，从而

① 民政部：《2005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0801/20080100009380.shtml。

② 参见洪大用著《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2 页。

③ 数据来源于民政府发布的相关各年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10 年是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参见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

也成为改革的积极支持者。

四、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中国的改革已历时 30 余年，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国的成功，导致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顶礼膜拜，甚至对中国模式产生了某种偏执：只要是中国的就是最好的，即便是一直被人诟病的中国权力腐败现象也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因为西方现代化也有过腐败的一段时期。如果照此逻辑顺推，那么当今中国的现代化是与西方的现代化不同阶段的现代化。这种认识显然是不科学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学基础上的现代化。中国理应跨过西方现代化的陷阱，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发生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才具有世界意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国化'复兴"。如果我们在中国模式上过于自负，必然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认为中国不再需要深化改革，只要按照既有的"中国模式"走下去便是。这也是机械主义者，其必然结果是使中国的改革陷于停滞。因此，在思考如何推进新的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中国过去已经走过的改革历程。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模式是非常不完善的一种发展模式，甚至包括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包含着不少问题。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主义的改革，按照樊纲所说的是因为"旧体制"内部的阻力较大，只好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如市场定价机制、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等等)。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改善，再逐步改革旧的体制。[①] 客观地说，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在发展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在改革旧体制方面的力度却显得相对较小。这既有可能是来自于旧体制中利益主体阻力太大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旧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的原因。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基本上是绕开问题谋发展的。结果是，旧体制的问题尚未解决，发展新制度、新经济成分即拓展知识增量方面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因此，继续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解决原有的问题而不断发展生产力。

① 樊纲著：《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2 页。

第二，所谓"旧体制"就是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确实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尊重知识存量可以确保社会稳定，使制度创新不至于产生较大的动荡。但是，知识存量往往又是制度创新的阻力。因为在知识存量中，既存在着对制度创新有促进作用的因素，也存在着对制度创新产生消极阻碍作用的因素。关键是看究竟哪种因素在知识存量中占主导地位。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后，旧体制中对制度创新有益的因素早就被新制度所吸收，并成为新制度的一部分，属于增量知识的范畴，而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没有触动的部分，往往就是那些对制度创新具有阻碍作用的因素，但由于这些因素占据着社会资源优势而拥有强大的势力，改革的力度不大，就往往难以撼动这些如磐石般的旧体制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制度创新会出现僵滞或者是逆转的现象，克服这两种现象的唯一手段就是加大力度深化既有的改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是僵滞与逆转，要么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前者将使中国面临累卵之危；后者会使中国迎来新一轮的战略发展机遇。

第三，过去30多年改革的最典型特征是"双轨制"，即旧体制与新体制共存、知识存量与知识增量共存。诚然，"双轨制"为中国过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制度性的理由，而改革的成就又为"双轨制"提供了合法性。但是，如果因为"双轨制"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认为它具有一劳永逸的合法性，这无疑会在实践中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双轨制"最容易导致寻租活动。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却仍然在一些领域继续发挥某些作用，这给国家治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新旧体制之间存在着体制"间隙"；另一方面，经济和政府的"潜规则"行为往往因既不符合新体制规制的对象，也不符合旧体制管制的对象，结果却获得了更大的空间。简言之，新旧体制的长期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长期并存，为寻租活动等腐败现象提供了制度空间。根据"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在改革初期的1980至1985年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5.13，属于轻微腐败国家；但到了1993至1996年期间，中国的清廉指数降到了2.43，属于极端腐败国家。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榜上保持在3.4至3.8之间。① 到后来，新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双轨制"的特征明显淡化，清廉指数又有所上升。当然，迄今为止，中国"双轨制"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深化改革的

① 更详细的数据参见"透明国际"网站：http://www.gwdg.de/~uwvw。另外，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简称 CPI)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为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

过程中，目的不是要为“双轨制”提供更大的合法性，而是要尽可能降低其合法性程度，加大力度发展新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第四，中国未来的改革仍然是整体性利益增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能不再是普遍性收益的改革，而是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中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的改革。旧体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将在新的改革中失去相当大的特殊利益，很可能会导致在新的改革中增加社会的“摩擦成本”。但是，中国的改革绝不能因为社会“摩擦成本”的增加而终止，相反，中国更应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前提下推进和深化改革。

最后，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反映了制度设置的艰难性和制度创新的探索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人在媒体上把中国模式简约化地理解为“摸着石头过河”，这显然是没有真正地研究中国模式。如果真如媒体所说的那样，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是没有发展战略的，是“半夜里吃黄瓜，摸头不知尾”；或者说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假若是这样，不仅西方更加担心中国发展是不确定的，即便中国自己的民众也会担心中国的发展会陷入混沌之中。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的改革始终是有路线图的。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并非是一种战略路径，而是一种策略方式，是指因中国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会产生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现存的“钥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是在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战略上，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早就为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一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走上经济腾飞之路的。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模式更不可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和平发展战略指导下，在动态中不断调整知识存量与知识增量相互关系的一种发展模式，即在新旧体制关系上，不断减少旧体制的因素，尽更大的可能来增加新体制因素，不断促进制度创新；在利益关系上，通过不断拓展利益增量（知识增量）并使之转化为利益存量（知识存量）来不断增加利益存量。

第四章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精神支撑下的市场体制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目标的讨论，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积极手段。"①正是这次讲话从根本上使中国社会迎来了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随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区别两个概念："经济改革目标"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无疑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实际上在今天已经实现，但经济改革目标并非只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最终建立起在市场经济精神支撑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们回顾了中国改革的四次争论，最近一次的争论虽然主要是关于"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问题，实质上则是关于产权改革的问题，也即是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问题。

产权名义上是人与物的关系，但实质上是由物的存在及相关的使用所引起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经济学家登姆塞茨指出，“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①。阿尔钦也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②。可见，产权并不是一种物质对象关系，而是一种在社会中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利和义务③。产权制度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④ 产权结构与经济效率有关，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能否为在其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某种正常的经济形态下，人们并不需要去选择产权结构关系，而是在某种既定的产权结构即产权制度安排下，或运用行政杠杆，或运用市场杠杆，来实现最大化的利益。但是，中国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要选择产权结构。产权结构选择不适当，将直接影响经济改革的成败。从这一角度来看，产权关系将影响经济改革的绩效。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最初中国经济改革的效益和效率都来自于非公经济领域，从而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私有产权是收益最高的产权结构。正如“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那样，要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的干预，因为政府是低效率的制造者。诚然，私有产权是运作成本最低的产权结构。但是，当政府最小化以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往往会出现“失灵”的现象，甚至导致市场崩溃。实际上，市场万能的神话早就被 1929 至 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所粉碎。但是，世界往往没有这样的集体记忆，危机过去以后，人们就会忘记曾经的痛。然而，客观的事实与规律往往对人们的“背叛”行为采取报复，而这种报复常常很快见效。就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为了摆脱超级通货膨胀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不久，1994 年墨西哥爆发了货币危机，随后一系列的危机接踵而至，包括巴林银行倒闭、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等。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西方社会又出现了试图“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这实际上仍然是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一

---

① 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美] 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96 - 113 页。

② A·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载[美] 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66 - 178 页。

③ [德] 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12 页。

④ E·G·菲吕博腾、S·配杰威齐：《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载[美] 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01 - 248 页。

个平衡点，使二者能够有效地调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转型则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完美合作的持续寻求。[①] 在亚洲金融危机迅速席卷世界各国的同时，俄罗斯和其他东、中欧国家在激进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失败了。在这两种情形下，连美国学者也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和金融危机不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欧洲人也指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上的过度自由与政府的严重缺失。也就是说，寄希望于自由市场经济能够长期有效的持续下去，不过是一种奢望。2007 年以来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再次把自由市场经济逼上了绝路。事实证明，一个健康的市场往往需要一个有效干预的政府。[②]

但是，政府作为"扶持之手"虽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政府面对市场究竟应该做什么是难以把握的，甚至往往把实际的所作所为用理论上"应该做什么"来进行解释。结果，政府的"扶持之手"就会变成"溺爱之手"，即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从而导致经济改革中的"政府病"，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管制措施使官僚机构腐败丛生，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以政府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挥霍国民财富，最有才能的人不是致力于生产性活动，而是削尖脑袋挤进寻租部门，从而给经济生活带来沉重负担等现象。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市场的因素不断在增多，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原有的计划体制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双轨制"。可以说，"双轨制"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金钥匙，但同时也是腐败的制度性土壤。

诚然，"双轨制"为中国过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制度性的解释，而改革的成就又为"双轨制"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因为"双轨制"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认为它具有一劳永逸的合法性，无疑会在实践中犯机械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双轨制"是最容易导致寻租活动的。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仍然在一些领域继续发挥某些作用，这给国家治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新旧体制之间存在着体制"间隙"；另一方面，经济主体乃至政府的"潜规则"行为常常由于既不符合新体制管制的对象，也不符合旧体制管制的对象，结果却获得了更大的空间。简言之，新旧体制的长期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长期并存，为设租型腐败和寻租型腐败都留下了更大的制度空间。所谓设租型腐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寻求立法代理人，通过立法保护垄断地位；二是通过既有的

---

① ［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应春子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4 页。

② Marshall Pomer, "Transition and Government", in Lawrence R. Klenin, and Marshall Pomer, ed., "*The New Russian: Transition Gone Awry*", S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 - 52.

垄断地位影响政策设计，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三是代理人完全控制立法委托人，由此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在设租型腐败中，立法通常保护的是特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为对当局而言，通过立法所得的"政治收入"高于正常的经济合同收入，这样可以通过这种收入来平衡各利益集团的收入与公众福利，从而形成政策制定上的稳态均衡。[①] 中国如果长期是国有垄断，那么政企不分的情况将永远不能解决。其结果必然是，政府与其所属企业之间的脐带关系使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国有垄断部门的利益，经常通过行政手段来保护其所属企业，长期让这些企业享有经营特权，排斥市场进入，维持这些企业的低效率经营。这种行政垄断正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严重的腐败形式之一。[②]

所谓寻租型腐败，就是指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因掌握相对完全的信息而故意忽略委托人的利益而滥用权力。实际上，在一个缺乏透明度和司法有效监督的经济体中，腐败和盗窃的泛滥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腐败的研究表明，如果受贿与效率直接相关，则行贿可以提高生产数量与质量；同时，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家对公职人员的工资开支，所以说，腐败有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提高效率。[③] 不过，即便如此，也没有根本改变腐败对整个经济的扭曲。[④]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寻租腐败活动，同样因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而十分严重。1993～1996 年期间，正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的初期，"双轨制"的特征尤其明显。到后来，新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清廉指数又有所上升，但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峻。这种情形下表明，政府的"扶持之手"既有可能成为"溺爱之手"，也有可能成为"掠夺之手"。

总之，一方面，公共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自由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对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而在经济社会不能缺少公共品的情况下，政府必然要承担起集中地提供公共品的任务；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出现收入(财富)分配两极化问题，这与广为接受的公平概念相违背，政府干预有可能在不损害经济效率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市场不完全、信

---

① Gray Becker,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8, No. 3, 1983, pp. 371－400.

② 过勇、胡鞍钢：《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年第 2 期。

③ Susan Rose-Acherman,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4, 1975, pp. 187－203.

④ Daniel Kaufmann, and Aleksander Kaliberda, "Integration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to the Dynamics of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in B. Kaminski, ed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omonk: M. E. Sharpe, 1997.

息不完备和其他原因导致市场在引导资源有效配置上出现阶段性失灵，产生诸如资源非充分利用、劳动失业、经济结构失调等问题，政府有选择地进行干预通常有助于在较短时期内使市场经济恢复正常运行状态。经济过程中某些情况下对个人或企业而言的经济效率，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效率损失”（如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质量下降等），一些特定的政府干预就是针对这种经济过程产生的“外部效应”实施的，其目的在于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因此，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之手”，而不是“掠夺之手”。

综上所述，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完全的政府控制经济，都不是好的选择，都会使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是从民营化开始，并在民营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大增益的。但是，民营经济的巨大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国有经济，相反中国更加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性。与计划体制下强调经济的“纯洁性”不同，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性主要是强调国有经济对经济的控制力。因此，众多国有企业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么参股民营经济，要么被民营经济兼并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但国有经济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因此削弱，不仅在质量上大有提高，即在改革中普遍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与活力，而且国有资产总量也大幅度增长。[①]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合作”经营方式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恰恰体现了恩格斯提出的“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思想。[②] 因此，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重组现象，如前文提及的淮南矿业重组芜湖港、山钢对日钢的重组、晋浙江煤企“被国有化”等，就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这显然是没有真正理解中国所有制改革的要义。当然，众多学者仅仅以国有经济的比重、国有企业的数量为依据来证明“国进民退”，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解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最根本要义在于中国选择的是混合产权制度，即混合所有制。

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另一方面也指整个国家经济中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形。中国在改造国有企业时就一直主张同一企业中的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同时，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也主张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或者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① 袁恩桢：《“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争论的背后》，载《探索与争鸣》2010 年第 6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16 页。

度。混合所有制是混合经济的产权基础，具有很多的优越性：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到大量资金投入生产经营，特别是投向新技术产业和新兴项目的开发，以促进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可以强化企业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保证公有资产的有效使用和增殖；可以壮大优势企业的力量，有效解决困难企业的问题；有利于公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与重组；可以迅速形成规模经济，提高企业竞争力，等等。混合所有制不仅仅是协调社会多种利益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的产权组织形式，而且也是推动国企改革的有效财产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经济或单一私有制经济等传统所有制的界限，实现了公有或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所有制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合作；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打破了"纯粹公有制"的束缚，找到了以现代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即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体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支配优势，体现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对其主要命脉的控制优势，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促进了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转化。

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从产权关系来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对中国经济发展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中国已经不再需要深化改革了，只要沿着既有的市场体制走下去就行了。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不完善的，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尤其是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专注于市场体制的建立，即市场的硬件建设，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完善的市场硬件设施，而且还应该而且必须有完善健全的软件。市场经济的软件就是市场经济精神，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另外，当前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今天的"国进"并非是回到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参股改造，或者是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重组。同样，"国退"也不是彻底放弃国有企业，任由民营企业占据全部市场，也是让效益好、技术领先的民营企业来对效益差、技术落后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这实际上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国进民退"并非是要使改革逆转，"国退民进"也不会动摇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问题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转型受制度的约束，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

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构架、经济体制、社会模式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的道德习惯、思想意识等。新的正式制度容易建立起来，但非正式制度是人们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东西，有相当大的继承性，在人们头脑中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其发展具有巨大的“惯性”。因此，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是长久的、持续的。[①] 关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早就有过论述，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②]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传统既包括正式制度的传统，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传统，可能更多的是指非正式制度的传统。通过经济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成功转化，混合所有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产权形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直接结果则是以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为标志的“中国奇迹”的出现。但是，“中国奇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形象。相反，“中国奇迹”把原来贫困落后的中国人形象转变为另一种被物质财富扭曲的形象，即暴发户形象。这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支撑其健康运作的市场经济精神，或者说是缺乏支撑市场经济体制的以市场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新的非正式制度。

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发展来看，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商业道德，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精神。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中，“义”一直被置于关键的位置。人们对“义”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孔子那里，“义”大致有五个意思：(1)“应当”、“正当”，如“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2)“合适”、“合理”，如“义之与比”(《里仁》)；(3)“天理之宜”、“事之当然”，如“君子喻以义”(《里仁》)；(4)“善”，如“闻义不能徙”(《述而》)、“徙义”(《颜渊》)；(5)“道理”、“意义”，如“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卫灵公》)。概括而言，“义”在孔子那里是指一般的道德准则，其顺乎人情，合乎事理，通乎天理，是指导和判断人之行为的道理与意义，其基本特征是合情合理。[③] 但不管是哪一种意思，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之说一直占据着传统道德的主导地位。例如范蠡就主张“君子富，好行其德”即行德济众。他还倡导“与时逐不责于人”，也就是诚实守信。即便是到了近代，在中国近现代新

① 参见胡键著《转型经济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3 页。
③ 张汝伦：《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兴商人中，仍然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他们在求利的同时，依然时时不敢忘义，有的甚至不敢公开表示其经商的目的在于求利，而是经常标榜自己以崇儒崇义为先。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更是以民族大义取信于民众，以民族复兴的诺言而获得民众的拥戴。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民族大义和民族复兴的承诺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的纲领之中。大会指出，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这一纲领激励着全中国人民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的道德素质一直是比较高的，道德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然而，由于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怀疑道德是否还能坚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社会道德被严重扭曲。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整个社会人人自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虽然各条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但道德伦理无法通过拨乱反正很快回归到原来的底线之上。而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导致道德底线严重倒退的基础上启动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即便在体制上没有问题，在运作上也会受到低水平的道德约束而产生种种与市场经济精神相悖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个人物质利益人皆有之，它是个人行为的动因之一，是人的其他一切需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肯定了个人合法的物质利益。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不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①也就是说，个人的合法财产权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伴随着个体谋取利益的原有社会禁锢和道德禁忌的解除，不只是单纯获取个体物质利益的冲动成了经济行为的动机和诱因，而且这种对个体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在不少个体那里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于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些人往往不择手段。

二是道德的滑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经济人"的理性会暴露无遗，特别是假设在没有任何约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的情况下,"经济人"的"恶"的一面将充分表现出来。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必须通过法治来遏制"经济人"的理性的泛滥,从而也就阻止了社会成员的物欲横飞。法治是遏制人的"恶"的一面,而道德则通过"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来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服务"。[①] 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由于是在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的法治基础上,以及在被文化大革命严重践踏的道德基础上启动的,法治本来就不健全,道德早就出现了危机。因此,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人"恶的一面远远要多于善的一面,道德滑坡的情况日益严重。例如,其一,食品安全问题。近些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出:三鹿奶粉事件,食品添加剂超标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丹红、孔雀绿、一滴飘香等,毒饺子事件,双汇肉事件等等。因此,在民众中流行着这样的话:吃肉怕激素,吃素怕尿素(指化肥),喝饮料怕色素;究竟吃什么,老百姓心里没有数。在这样一种市场下,想想看:我们还能吃什么?如果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人们对自身健康安全的深深忧虑,我想人们宁可不要这样的市场经济。其二,基本伦理的缺失。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强调敬老爱幼。例如,孔子对大同世界的理解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②]孟子也认为,人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则"天下可运于掌"。[③] 这样的伦理准则是数千年来维系中国社会的基本纽带。时至当今,它仍然应当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伦理。然而,阶级斗争导致的社会不信任感直接进入到市场经济社会中,甚至使这种不信任感不断放大。社会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如果不扶,可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如果扶,可能会被老人讹。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社会,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扶起摔倒的老人。这样的情况并非一例,近年来已经发生过多起:2006 年 11 月,南京的"彭宇案"震惊全国,彭宇扶起被撞成骨折的老太太却被指认为撞人者,此案历经三审最终和解撤诉,此后双方三缄其口;2009 年发生在天津的"许云鹤案"更使人们产生了"扶老人恐惧症",许云鹤称看到违章爬马路护栏倒地受伤的王老太,立即停车为其包扎并打了急救电话,老太却称被许车撞伤将他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许云鹤赔偿 10 万元,理由是许的车离老太很近,引发其惊慌而跌倒,此案二审开庭双方各执一词,尚无定论;2011 年,南通的公交车司机殷红彬将跌倒在马路上的老太扶

① 韩东屏:《道德究竟是什么——对道德起源与本质的追问》,载《学术月刊》2011 年第 9 期。
② 《礼记・礼运篇》。
③ 《孟子・梁惠王上》。

起却被诬告成肇事者，最后多亏有监控录像才还了他一个清白；2011 年 9 月，郑州贾建英因“好心帮助摔倒的老太太，反被冤枉”，他被老太太告上法庭，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 10 万元，法院一审判决贾建英赔偿邢老太医疗费等 5 万余元；2012 年 8 月，湖南鱼贩王培军骑车与三轮车发生刮擦事故后，扶起并非自己撞倒的老人并为其支付了医药费，但之后发生的纠纷使他无力应对，老人家属索赔 20 万元，最后王培军因难以承受这种压力而喝下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民族因为有钱而富裕了，但在道德的天平上却变得轻微了，在道德的标尺上变得矮小了，那么这种富裕是有严重问题的。

三是诚信缺失的问题。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信既是君子立身、进身的根本，也是为政者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他强调做人要“言而有信”，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守信用。他指出：“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得更透彻：“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成语“抱柱守信”便告诉了我们一个视信用高于生命的故事。据《庄子・盗跖》记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而不去，抱梁柱而死。说的是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一个女子约定在桥梁下会面，结果女子没来，而大水来了他还不离开，抱着梁柱被大水淹死了。在常人看来，尾生是一个“在一个树上吊死”的傻子，但他那种坚守信约、恪守信用的态度，颇值得深思。中国有古语说：“无信则不立。”日本有谚语说：“信用是无形的资产。”英国也有谚语道：“信用乃成功之伴侣。”古今中外，人们对自身的信用呵护备至，甚至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自己的信用，也同样都强调信用的重要性。然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不少人在改革过程中为了利益而失去了应有的诚信。例如，盗版一度在中国颇为猖獗：有盗版的书，有盗版的杂志，有盗版的光盘，各种各样的“克隆”产品充斥着中国的市场。质量低劣也曾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同义语：低劣的用品、低劣的食品……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市场化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和学术界。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出现了教育产业化，在教育领域，不少高校为了自己的经济效益而把最珍贵的学位证书、文凭证书卖给一些官员、商人和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另外，学术领域也受到市场化的冲击，一方面表现为学术水平的高低靠学位点来支持，有硕士点、博士点就意味着学术水准高，各高校千方百计到教育部“跑点”，到各个评审专家“跑分数”，学校往往为此不惜血本，很难说不会产生某种利益交易，包括高价邀请评审专家来校进行所谓的讲学，而一些评审专家也欣然接受，毫不回避。学术市场化还表现为对学术的数量化管理和数量化考核，因为在管理者

看来，一个学者是否有学术水平，主要标志在于其是否有课题特别是重大课题，是否获得过重要奖项，是否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于是，学者跑项目、跑奖项、跑论文发表的现象几乎成为其一年中的主要任务，难免不会出现送礼、请客等市场行为。

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好机会和平台，但我们绝不能变成只考虑自身利益的功利主义者，尤其是不要变成在利益面前丧失信用的势利小人。信用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缺乏信用、丧失信用，在这个社会就没有立足之地；信用也是最大的资本，一个有信用、讲信用的人，才能在这个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信用更是助人成功的最大帮手，靠坑蒙拐骗，也许能获得一时的收益，但绝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的本性时就指出，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产阶级把一切都资本化了，包括“把人的尊严都变成了交换价值”，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①] 因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为了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一方面，资本在它的发祥地西欧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使原来的自由农转变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资本又高歌猛进地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③]为此，西欧资产阶级开辟了一条殖民增值的血腥之路：残杀土著居民、在非洲与美洲之间贩卖黑人、在爪哇推行盗人制度等。所以说，西欧殖民主义“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景”。[④]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刻画得入木三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作出科学的预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如果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仍如18、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唯利是图、缺乏道德、缺乏诚信，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失败的市场经济。换言之，中国市场经济要真正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切弊端，使之在市场经济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页。
④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862页。

神的支撑下顺利发展。

三、中国深化经济改革需要培育市场经济精神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过去 30 多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于是，一些人就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以后，中国面对的就不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按照既有的模式来确保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规模的增大根本无法掩饰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建立并不能表明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成熟和完善。上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是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如果不加以克服和消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难以持续发展。众多的西方左翼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难以持续，也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仍然“染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怪疾。这种担忧固然有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充满了怀疑甚至是某些错误的偏见，但也有一些是善意的批评，希望中国不要感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综合症”。不过，我们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学者往往忽视善意的批评，一味认定西方的批评是为了搞垮中国，这部分学者没有摆脱意识形态对立的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同时，他们也常常对西方国家的某些优势视而不见。这种自负感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百害无一利。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是十分清醒的。1979 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同时又提出“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的社会风尚”。[①] 究竟什么是“好的社会风尚”？邓小平没有下定义，但他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初，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人们都守纪律、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中。而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陷入无政府主义泥潭，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人都知道，邓小平所指的“好的社会风尚”是什么。因此，邓小平不仅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遗憾地指出“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的损失是很大的”。[②]“‘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们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要成为‘四有’干部”。[②] 这就是说，邓小平并非只是注重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5 页。

抓经济发展，同时也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①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其他方面的工作往往因中心而被忽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一些风波，邓小平很快就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②在随后的几年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③可见，教育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总体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邓小平之后，中国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迄今为止还只是领会和践行了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他关于加强教育的战略构想却完全被经济建设所遮盖了。事实上，如果不深化改革，即便中国在被一部分人极力推崇的中国模式下实现了物质的现代化，那也只是完成了邓小平所涉及的一般战略构想。国家的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的现代化，最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教育。

邓小平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因为他深刻领会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而才有战略预见性：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法制十分不完备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可能会使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病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教育才能真正在国民中培育起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市场经济精神。虽然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精神，也没有对市场经济精神进行科学定义，但他所涉及的每一次关于市场经济的讲话都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精神支撑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精神呢？作为支撑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精神是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的，是具有普适性的。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新生事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较早且较成熟，因此要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精神，我们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去寻找和挖掘。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基于资本所有者的非道德价值，也就是缺乏市场经济精神的。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资本所有者要在道德的基础上来实现资本的增殖。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也有赖于市场经济精神。这种市场经济精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诞生之初并不存在，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百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是市场经济体制固有的组成部分，需要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觉维护。如果市场经济主体不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精神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固有部分也会丧失，从而使市场经济空存其魄，并无其魂。

市场经济精神的核心内容包括：

其一，公平，即公平交易，力求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不平等因素。市场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从客观上来说，市场的交易不会因为身份、等级、权力等非市场因素的不同而导致交易发生变化。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不乏各种非市场因素干扰市场交易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市场的交易是难以秉承公平的精神的。马克思曾经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公平的掠夺性。他指出："在整个 18 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到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①因此，某些学者说，英国最初来到中国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加上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对此说法，笔者不够苟同。说此话的学者应该知道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本性。一般的贸易仅仅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以及资本对其他民族的自然征服，但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是无法满足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资本的本性和资产阶级的无限欲望强烈要求资本的发展要有一个巨大的加速度。资本发展的这个加速度来自于哪里？只能来自于武力掠夺。也就是说，殖民掠夺是为资本的加速增值服务的，是为资本能够更快地"迫使"一切民族接受资本的支配服务的。不仅殖民掠夺是这样，包括灭绝人性的贩卖奴隶也是为了使资本增值获得这样的加速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3 - 174 页。

易是大工业的条件。"[1]照前面学者的逻辑，贩卖奴隶也是"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了"。这显然是滑稽可笑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对外的商业贸易在世界各地都遭到抵抗，原因就在于这种商业贸易至始至终都不是建立在公平精神的基础上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坚持以公平为价值取向。

其二，合作。合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精神。市场主体受趋利因素的影响，使市场理性具有天然的利己性的价值取向。但是，市场主体在谋利的同时必须以提供一定的商品或服务、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为前提。这种互利性就要求市场的各方必须具有合作精神。这样才能确保市场的有序性，不至于产生混乱。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但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条件下，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不同的资本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合作精神的。因为每一个资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最终会导致相互之间发生恶性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度，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资本之间缺乏合作精神来理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追求社会收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因此更需要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

其三，诚信，也就是契约精神。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经济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资本是通过哄骗与欺诈来实现增殖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有了重大变化，"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资本家开始守法律、讲诚信，但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也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因为"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3]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社会，诚信对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资本主义经济信用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公共信用制度体系中，掠夺永远是资本增值的第一手段。例如，作为资产阶级公共信用制度重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9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9 页。

要内容的国债，实际上是国债发行人凭着等同于相同金额的公债券掠夺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财富的工具；银行则是以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掠夺工具，是资本家"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①] 资产阶级的国际信用制度不仅可以隐藏资产阶级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而且还是一种强化资本的国际殖民掠夺的手段。由于资本在国际间的相互借贷，实力弱小的资本因获得这种借贷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从而也就可以实施更残忍的殖民掠夺。也因为这种借贷，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至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贩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②] 由此可见，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大工业时代已经开始讲诚信了，但并非真正的诚信，而是欺诈、哄骗得更为掩蔽。然而，掩盖得了欺诈和哄骗，却掩盖不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异化的本质，更掩盖不住因缺乏真正的诚信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是加速它的灭亡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能充分解放社会生产力，因而应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切弊端包括不讲诚信的本性，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

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等。一句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精神的缺失。因此，当前深化经济改革，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培育以公平、合作和诚信为核心内容的市场经济精神。

第一，要遏制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财富只能使一个民族变富，但不能使一个民族变得高尚。只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5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6页。

有将财富转化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工具，一个民族的经济行为才能显示出其高尚的动机。任何人都有物欲的冲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物欲更加容易膨胀。但是，如果不与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物欲就会冲破道德的底线而泛滥。在这种情况下，物欲将彻底摧毁市场经济。

第二，要摈弃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意识，代之以互助协作、崇尚正义的精神。以邻为壑是一种封建式的小农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消除了以邻为壑的状况，开辟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所到之处，用资本的利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并迅速地不断消除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世界在经济政治上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①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永远摆脱不了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本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最大化的社会利益，不是满足个人物欲，它需要互助协作，需要市场主体崇尚正义。

第三，要把靠权力资本和社会潜规则实现财富增值的观念转化为强劲的法律意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要弘扬法律精神。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但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市场经济受到政治权力干预的情况还比较严重，从众多被揪出的腐败来看，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经济几乎是每一个腐败官员的普遍现象，他们则从中获得非同一般的回报。另外，中国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普遍性的社会潜规则，按正常规则办事往往行不通，用潜规则办事反而顺风顺水。这两方面都表明，在市场规则上，中国市场经济目前存在着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此，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完善其体制，更重要的是要在民众中培育诚信、合作、守法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市场经济精神，从而使市场经济与人的文明进步同步发展，使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变成一个整体文明的渐进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第五章

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持续追寻

当前，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知识界对此诟病颇多。一种观点认为，在苏联东欧的"党国体制"失败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从中汲取了不少教训，但迄今为止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仍然是一个僵化的列宁主义国家。[①] 当然，这种观点也有一些学者表示不赞同，如果中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要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仅仅靠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支柱来维持其执政地位也是不可能的。[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不仅需要社会民众的认同、接受，更需要政治人对政治体制的自信和自觉。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是在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革命中和经济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这两方面均使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在社会民众中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可见，中国政治体制拥有强大的合法性资源，而且这种合法性资源仍然能支撑既有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政治体制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这种观点虽是少数，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有不小的影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自然延伸的内容，不需要刻意去启动政治改革，因为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政治民主，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行是不客观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机械主义观点。实际上，中国政治改革从经济改革一启动就已经开始，同样按照渐进式方式在不断追寻中国的理想政治秩序。

---

① 参见 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② 参见[美] 沈大伟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新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 页。

一、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

究竟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中国先秦的政治先哲们认为,理想的政治秩序就是秩序与正义相统一的政治秩序。尽管"秩序"与"正义"是西方政语境中的概念,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并没有直接论及这两个概念,但先秦思想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政治价值。《韩非子·难一》中所说的"国无君不可以为治"强调的就是秩序,而《慎子·威德》中所说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强调的则是正义。实际上,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调适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内在矛盾,一直就是儒法苦心思考的核心话题。在周以前,君主世袭一般沿袭的是"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并存的继统惯例,但自周公放弃以武王胞弟身份继承王位的资格而转立武王之子成王以后,周人从此将王位世袭制改为嫡长子继承制。周人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改革,是为了吸取商人为争夺王位而历经近百年的"九世之乱"之教训。而嫡长子继承制则可以避免兄弟之间的王位争夺。虽然嫡长子继承制的理论初衷在于维护政治秩序并最终有利于天下后世,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试图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制度构想的政治秩序内来实现"以利天下后世"的政治价值,从而实现"立天子以为天下"的"正义"。特别是到了春秋时期,面对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儒家法家都不约而同地主张君主存在的价值,并且赋予君主一种止乱趋治、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法家强调"失君必乱"和"国无君不可为治"等,实际上都是从政治秩序的角度强调君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儒法诸子又认识到,当时"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社会现实固然体现为一种秩序混乱,但是追根溯源,造成这种乱象的根源又恰恰在于"政治秩序"有机组成部分的君主及上层王侯的私欲膨胀和权力滥用。所以,儒法诸子强调由现实最高权力确保的社会秩序必须以符合天下万民的整体利益为正义前提,提倡"君道"以确保最高权力的正当使用。[①] 然而在当时情形下,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不可能实现秩序与正义的完美统一,那不过是思想家们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指出:"人类在本质上正是一种政治动物。"[②]后

① 宋洪兵:《秩序与正义之间——略论先秦儒法指理想政治及其实现途径》,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来马克思也借用过这一概念来揭示人类的本质特征。“政治动物”不仅揭示了人类的群体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更表明了人类由于群体性和社会性特征而必须要进行规制：如何对社会资源进行使用，社会产品如何分配等，围绕这些问题进而产生了权力，权力的运作方式就是秩序。一旦有了秩序，人类就必然要追寻一种权利运作的理想方式，即理想的政治秩序。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曾指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糕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① 后来，亚里斯多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判“理想秩序”的标准，即“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判”。② 尽管西方国家宣称继承了古希腊秩序与正义的政治精神，但由于西方在过分追求正义的情形下往往失掉了秩序。

马克思、恩格斯在详尽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下，也提出了自己的理想政治秩序的相关价值，并科学地设计了未来社会的理想政治秩序：“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因为“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③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平等权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项基本权益。他引用法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平等是法律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不论是予以保护还是予以处罚。”④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⑤ 恩格斯还指出：“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⑥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平等是平

① ［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33 页。
②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 - 4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1 - 112 页。

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统一。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没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义务也就无从谈起。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中，针对1844年英国颁布新济贫法恩格斯就指出："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人权是根本没有保障的。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不自由的政治秩序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并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②]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平等权的虚伪性，认为资产阶级以平等权来反对封建特权是进步的、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平等是欺骗，是谎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不可能有平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他们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平等权的获得，就是消灭阶级本身。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定价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③]

到了晚年，马克思又再一次回到对权利、国家等的思考中。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全面批判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所谓"平等的权利"体系。他说："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这种平等，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因此，这种平等的权利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马克思认为，这是社会的弊病，并进一步认为"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①]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社会主义必然要替代资本主义。他们深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不可能建立起“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理想政治秩序。因为在阶级社会，政治体制乃至政治秩序也只能是服务于一定的阶级，除非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代替了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到那时秩序与正义才能得以统一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在理想政治秩序中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追求这样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并为此提出了具体的路径。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消除劳动异化，为此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②] 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了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③] 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必须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④] 只有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铲除导致劳动异化的土壤，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其次，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在马克思看来，“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⑤] 因为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弱小的，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力量就更微不足道。而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⑥] 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而言之，单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资本的支配。这也充分表明，“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的论断。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 在马克思看来，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存过程。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指的是摆脱了民族地域局限性的，与整个世界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具有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的现实个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解放的过程。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的，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共产党人必须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再次，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将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在这一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性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这一阶段，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不过，从第一阶段经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都要经历血与火的斗争。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②] 在这一阶段，人类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实现个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条件就是“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因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创造）的能力”。[③] 到那时，社会成员才能彻底摆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束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这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①]

二、中国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对理想政治秩序的追寻

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正式启动，即便有所动作，也很快停止，这种看法是不客观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换言之，中国在经济上追求繁荣富强的时候，政治上也同时通过改革在不断追寻理想的政治秩序。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至 1989 年的政治风波。真理标准的讨论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客观实际还是领袖人物的“重要指示”？通过辩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后实现了一个重要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只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因为，如果不抛弃“两个凡是”，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扰乱了的政治秩序就难以恢复，被破坏了的政治体制就难以重建。从这个方面来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正式启动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就已进入制度建设的过程中。1979 年，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县和县级以上地方设立人大常委会，将县一级人大代表改为直接选举。198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提出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重大改革。在这次讲话后，根据这一讲话精神，中国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一是在 1982 年修改了宪法，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在加强行使立法权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监督权的行使，特别是加强了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在宪法的框架下，民主选举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1986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8 次会议根据政治体制改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0 页。

的精神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要补充和修改，实行了差额选举和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1988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选出代表 2 970 名。选举提出候选人 3 872 人，其中政党提出的 3 286 人，占 84.9%；代表联名提出的 586 人，占 14.9%。在全国省级人大换届选举中，所有代表都依法实行差额选举，人大常委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府副职领导人也严格按法定差额进行了选举。还有 12 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8 个省的省长、15 个省的法院院长和 11 个省的检察院检察长实行了差额选举。在省级选举中，如此广泛地进行差额选举，并且由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且有相当一部分当选，这在建国以来人民政权选举史上是开创性的。这对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有力的推进。198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反复讨论、协商提出的，本身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产物和体现。文件指出，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二是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渐形成了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邓小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表示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1989 年 11 月 9 日，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决定任命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十三大后的几年里，每年有近百万干部按规定离退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强调要增加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坚持机会均等，各级组织部门采用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考核、公开招聘、公开考试等方式，探索建立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机制。

三是采取积极措施实行党政分开，加强党内制度建设。1987 年 11 月，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划（试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规划（试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两套工作规则的制定，明确了党中央机构和中央人民政府各自的职能、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为党中央和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关系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要求形成合理的格局，提供了初步的规范。按照党政分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党中央直属机构进行了改革。198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则上批准了中央直属机构改革方案以后，中央书

记处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并认真组织了实施。改革的主要做法是撤销与国务院职能部门重叠的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合并业务相关的事业单位；明确直属工作机构的职能，精简内部人员。党中央直属机构的改革体现和巩固了党政职能的分开，也为政府机构改革制定了有利条件。

四是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1988 年 4 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改革第一步的基本要求是，职能转变，下放权力，调整结构，精简人员。减少政府机构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增强重视调控职能，初步改革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行政效能低下的状况。

此外，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干部人事改革，着力推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1988 年 10 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草案第 15 稿出台。条例草案共 16 章 84 条，勾画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在进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试点的同时，进行了单项制度的推行工作，主要是考试录用的试行和建立培训制度。1989 年 1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国家行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实行考试考核办法的通知》，要求县以上行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实行考试考核办法。1988 年 5 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制定了《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引入竞争机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若干意见》，要求必须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人事管理，通过公开招标选聘企业经营者。实行干部聘用制，是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促进干部能上能下的一个有效措施，也是从优秀工人中选拔干部的一种好形式。

第二阶段：1989 年至 2002 年。在这一阶段，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苏共的改革直接葬送了苏联。这种情形无论如何都会对中国的改革产生某些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六四"政治风波后，国内"左"的思潮不断质疑中国的改革，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 但是，国际和国内的两种形势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相对放缓。即便如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政治构架。198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5 页。

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和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1990 年 3 月 12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1993 年 3 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了宪法。

二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了政企分开。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首次郑重提出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后来的实践中，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则是放在党的自身建设上。1994 年 9 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首次以全会的形式来集中讨论和解决党的建设问题，重点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并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命题，对继续有效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会议还提出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决定》特别强调，党的领导“需要以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

三是明确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1997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提到重要位置，专门撰写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强调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法治”的概念，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依法治国”的提出，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真正涉及政治体制中的根本性问题，即权力的运行、监督等问题。长期以来，权力过度集中，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求法治国家的建立。“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实施，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迈出了一大步。随后，与依法治国相适应的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相继实施，特别

是对干部选拔开展了民主推荐，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引进了竞争机制。

四是政府职能进一步转换，政府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精简。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不断转变职能，特别是国务院机构的大幅度精简。1993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从原来的 86 个减少到 59 个，人员减少 20%。1993 年 4 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 19 个调整为 13 个，办事机构由 9 个调整为 5 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 8 个。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 15 个部、委。新组建的有 4 个部、委。更名的有 3 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 40 个减少到 29 个。从 1998 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1999 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 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 2002 年 6 月，经过 4 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 115 万人。

第三阶段：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共十六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例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报告指出，一是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二是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三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报告从 8 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基层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

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使党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且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根据中共十六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是制度建设。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的法律和制度。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2003 年颁布，2010 年又正式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建立和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工作规划》（2008）、《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9）、《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发布》（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2010）、《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2010）等。这些是制度防腐的重要保障。

二是干部选拔中的民主测评。民主测评不是一项制度，而是干部选拔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环节不只是检验干部的群众基础好不好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对干部的能力、党性等的民主测评。它体现了党在干部培养方面"选拔"与"选举"的有机结合，使真正德才兼备的人进入党内。

三是个人事项申报。200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就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的情况；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私人在国（境）外经商办企业的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主管人员的情况；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等向党组织报告。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对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述职述廉。200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是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对督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履行岗位职责、认识问题、改进措施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五是干部任期、回避、交流制度。200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这三项规定有利于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有利于增强领导干

部的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有利于遏制领导干部的腐败，也有利于避免领导干部形成自己的“小圈子”，避免领导干部通过权力来谋取私利。

六是在任、离任审计制度。2006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审计法》，明确了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在任审计是为了避免重大经济损失，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而历任审计虽有“事后追查”之弊，但对下一任领导有警示作用。

七是干部问责制。2009 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的原则。问责制一方面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实现了领导干部从“权力主体”向“责任主体”的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整肃吏治，优化干部队伍。

总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并取得了不小成就。当然，这一进程是相对缓慢的，有时可能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不得不致力于经济建设，而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被置于次要位置，给人感觉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停滞。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对政治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对政治发展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而现实的政治安排无法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也会给人感觉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了。

三、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过去 30 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缓步推进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乃至于中国的整个改革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前文述及，政治发展就是为了追寻秩序与正义统一的理想政治秩序。但是，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往往会因强调秩序而忽略正义；或者因强调经济的效率而忽视公平；或者因强调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而忽视了政治人的道德问题。

强调秩序而忽略正义的情况突出表现在中国改革的双轨制中。强调秩序，改革必须要处理好新旧两种制度的关系，不能因新制度的产生而导致旧制度不适应。在这种情形下，改革要确保秩序，但过度迁就旧制度，新制度很难建立起来，制度变迁可能会出现僵滞，甚至出现逆转。另一方面，为了迁就旧制度的适应性，双轨制不得不长期持续下去，结果在新旧两种制度中会出现较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而腐败与寻租的产生往往是对正义的最大伤害。

中国过去 30 多年改革的最典型特征是“双轨制”，即旧体制与新体制共存、

知识存量与知识增量共存。诚然，“双轨制”为中国过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制度性的解释。经济学家樊纲在20世纪90年代曾对此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双轨制是中国改革的一种基本方式，这种制度最初出现在价格改革领域，后来扩展到外贸体制改革、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等。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较快增长，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之所以能够较快提高，正是因为双轨制条件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①] 不容怀疑的是，在双轨制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从一个贫困型社会走向了一个发展型社会，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不出现意外，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将成为事实。改革的成就反过来又为双轨制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促使一些人甚至认为，只有双轨制才能确保中国的发展，因而要继续用双轨制来推进中国的改革。众所周知，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优先发展新制度。在继续推进双轨制的情形下，新制度就很难发展起来，更不可能正常地发挥其功能。从这一方面来看，双轨制只是权宜之计，而非战略性选择。如果因为双轨制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认为其具有一劳永逸的合法性，无疑会在实践中犯机械主义的错误。

强调双轨制实际上就是强调稳定，强调稳定的秩序。但是，在第四章笔者已经有所述及，“双轨制”最容易导致腐败和寻租活动。双轨制改革虽然不至于导致社会的动荡，但由于双轨制倡导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老人”本身是那些占据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那既得利益者，所谓“老人老办法”实际上就是制度设计首先承认“老人”的既得特权并允许他们带着这种特权参与新竞争。因此，他们在竞争中占据着天然的优势地位。相比之下，“新人”由于没有掌握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是“赤裸”参与竞争的，处于天然的竞争劣势。因此，这种竞争机制是缺乏正义性的。当然，由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为了避免历史包袱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最初采用双轨制比较容易推进改革，这是明智之举。但是，如果长时间采用双轨制来确保社会的稳定，并以这样的稳定来确保改革和发展，这不仅是在纵容特权，纵容特权下的腐败和寻租，更是在纵容对正义的伤害。这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强调经济的效率而忽视公平。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所奉行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

① 樊纲著：《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平”。而实际上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基本上是围绕着经济改革这一基本原则而不断推进的。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成为了所有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承认，在短缺经济时代，为了摆脱贫困，走出短缺，强调效率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社会主义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就不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①] 在这种情形下，强调“效率优先”是再恰当不过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虽然是中共中央在 1993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时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围绕着社会主义如何摆脱贫穷的问题，邓小平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就反复强调效率的重要性。1978 年 9 月，邓小平提出“用先进技术和管控力方法改造企业”；同年 10 月，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9 年 1 月，提出“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等等。这些讲话都体现了他注重效率的思想。进入 80 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懈怠之情，邓小平非常及时地提出警示，强调中国“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还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②] 特别是在“六四”风波以后，一些“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且因害怕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把矛头直指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③]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讲效益、讲质量。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效率的思想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包括依靠科技和教育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等。邓小平关于效率的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基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他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在邓小平关于效率思想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实际上在各项改革中也是以此原则为基本参照的。

但事实上，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公平往往难以兼顾，甚至常常被忽略。特别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那时社会经济生活的统一性和秩序性主要是靠政治权力来维系的，甚至连精神生活都对政治权力具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4、22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9、155、16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4、375 页。

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因而，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划分社会等级的唯一工具，但经济的短缺使人们并不感觉经济生活有多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在改革之前，像其他转型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非常低，政治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市场改革以后，各种要素迅速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甚至包括一部分政治权力。而事实上，政治权力在改革一开始就具有特殊意义，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的政治权力十分容易转化为市场竞争中一种最具竞争力的资本力。进入市场以后，那部分政治权力往往天然地就占据着市场的优势地位，并迅速垄断市场的稀缺资源。也许，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权力资本化现象，但一部分政治权力在改革初期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左右市场的特殊力量。毫无疑问，掌握这部分政治权力的人优先获得了市场竞争的起点优势。特别是在"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中国当时政府的"扶持之手"在相当程度上是"扶持"了一部分政治权力走上了市场。由此可见，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起点不公平的问题。

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强调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而忽视了政治人的道德取向。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指一种政治制度究竟是"邪恶"的制度还是"仁慈"的制度。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假若政治制度和体制（主要是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施政方式）是仁慈的，那么腐败是政治人的个人素质问题；如果政治制度和体制是邪恶的，那么腐败就是体制问题。从功利主义哲学来看，政治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因为社会人偶然和零散的侵害对象只是个人或者少数人，而政治人可以通过组织手段轻易地和持续地使一个阶级或集团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阶级或集团而生存的可怕状态，个人的异化和堕落正是发生在政治社会和国家社会。在功利主义看来，政治人都有自私的偏好。自私的偏好会使政治人产生这样一种认识：虽然自己占据着某种资源，但他人也同样需要这种资源，并且也可以对这些资源提出正当要求。① 因此，我们不能怀疑"仁慈"政府的存在，但我们不能否认政治人的自私性和在外部监管制度缺乏的情况下私欲恶性膨胀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性质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是一个把最大化社会利益作为自己目标的政府。但是，不仅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且其中的政治人也在不断变化，革命

---

① 参见[加] 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75 页。

时期的那一代政治人在建政之后深知民众对党的支持的重要性，更知道政权得来不易而倍加珍惜，所以那一代人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不忘党与民众的鱼水之情。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政治人受利益的诱惑而在政治体制内大行不法之事，以公谋私。一方面，他们公然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侵蚀中国政治体制，使之处于高风险中；另一方面，当自己在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机制下难以获得更大腐败利益时，他们就公然指责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机制。这种政治人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弊病是中国政治体制和机制中最严重的问题。由于每一个政治体制中的政治人都被置于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政治理想主义之下，那么批评一个具体的政治人，因他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权力会被认为是批评政府，怀疑现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人的行为常常这样逃避了公众的舆论监督。把政治人的道德置于外部制度之上，就是在用政府和政治体制也就是国家权力来检验个人的道德，把国家权力建立在个人道德的风险之上，就相当于把鸡蛋放在一个不结实的篮子里且高高悬挂在天花板上，权力和维持权力运转的整个政治制度和体制真是岌岌可危。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政治实践因强调正义而常常使政治处于混乱之中；中国的政治却过于强调秩序，因此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较深。国家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福人类有益于正义的实现，也可能会危害人间而违背正义原则，这也就是制度学派所阐述的“诺斯悖论”。“诺斯悖论”的意思就是：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实际上政治发展中同样也遭遇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诺斯悖论”。① 如何避免陷入“诺斯悖论”之中，恰恰也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正如前文所述，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过于强调秩序而忽视了公平。因此，追求秩序与正义的统一，就必须克服上述三大有悖于公平正义的问题。而根本的手段就是继续深化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各方面都迈出了第一步，但

① ［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21页。

我们不能停止，更不能逆转。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停止，就意味着新制度建设的停止。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改革之初的新制度本来已经在发挥作用，改革停止后，新制度将会与旧制度融合在一起，共同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邓小平在 1986 年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①]另外，邓小平当年还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三大目标的核心环节则是发展生产力。[②]

客观地说，在过去 30 多年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对于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的落实是比较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同样，政治体制改革也确实一直在为经济体制改革开道护航。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有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然，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之一，仍然是要保护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成果。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毫无疑问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病，不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这些弊病就会危及到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危及到过去 30 多年改革的成果。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以后，经济改革的瓶颈已经不再是在经济领域了，而是在政治体制和机制上，特别是政治体制和机制的种种弊病已成为深化经济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当前深化改革的第一要务就是努力消除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弊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改革不会逆转。

但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紧迫之处在于，由于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过去的改革者在以往的改革中因获得了超乎一般人的收益而担心在新的改革中失去既得的利益，进而成为反对深化改革的僵滞利益群体。这部分人对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成就沾沾自喜，甚至对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负感，认为中国体制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问题，怎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认为中国模式是最好的模式，没有别的模式能够比中国模式更好。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文化自负现象。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朝贡体系和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体系，造就了中国的"天朝"意识和"中央之国"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8 页。

情结，其特点是为我独尊，从各个角度强调“华夏相对于夷狄的尊贵地位和不容侵犯的权威”，并最终形成“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文化等级观念。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盛况，一方面赋予了古代中国统治政权强有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经过历朝历代的嬗变后更确立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这种秩序观与其说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不如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长期以来，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最终也走向了文化夜郎主义：自我封闭和对外界的茫然无知。正是这种文化自负感使得中国人即便是在从 18 世纪的繁荣走向 19 世纪初期的衰落时还仍然沉浸在传统的天下观念的迷失中，并未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者说，由于文化自负，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①] 有学者将这种迟钝视为制度惰性使然，但笔者觉得这完全是文化的保守和文化的自负感所致。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表现为，由于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由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过度自信，并认为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②] 中国模式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概念，是一套“经济话语”，但有学者将这一“经济话语”转换成“文化话语”，认为只有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才能产生中国模式和经济的迅速崛起；更为甚者，有学者进一步将这一话语转化为“政治话语”，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将是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承认中国模式在过去 30 多年里取得了成功，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认为中国模式是完美无缺的。再从大历史观来看，30 多年在历史上不过是“一瞬间”，用这样短时间里的实践来证明一种发展模式的真理性显然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种文化自负感将会严重阻碍中国深化改革并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停滞。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紧迫之处还在于，经济改革的成就为一些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存在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弊端。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根本不需要进行深化改革，否则会危害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经济绩效视为一切，并用经济绩效来解释政治的合法性。

① 陈廷湘、周鼎著：《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8 页。

②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 页。

特别是中国经济规模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这种情形更使持这种观点的人振振有词。但是，经济规模并不能体现一国的综合实力。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一，但中国却是一个羸弱的帝国，每一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最后都是中国赔款、割地。经济绩效只是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而决不是全部；同样，经济实力也并非就等同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它只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借用邓小平提出的"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来反对改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导致中国的动荡，一旦动荡，中国就会丧失发展的重要机遇。诚然，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必须在稳定的前提下来进行改革并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然而，一旦发展带来某些不利于稳定的因素时，发展就会被认为出了问题，而发展的根源则是改革。结果，往往会为了稳定而放弃改革，从而使发展丧失机会。邓小平也强调改革需要稳定，没有稳定，什么都干不成。1989 年 2 月 26 日，他在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①] 1989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指出："中国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②] 但是，邓小平是在 1989 年那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讲这番话的，决不能把它运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其他背景中来理解。如果将邓小平的这句话推广到今天深化改革的背景中，很可能就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即便是在 1989 年的政治背景下，邓小平也是把稳定作为改革的条件而不是作为改革的目标而提出来的，即稳定为改革服务，而不是改革为稳定服务。今天，不少人常常理解为宁愿要稳定的停滞，也不要改革的社会波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同样，稳定是相对的，不稳定是社会的常态，只是不稳定有一个度，一定度范围内的不稳定恰恰是改革的动力。因害怕不稳定而放弃改革，无疑是因噎废食。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中国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不深化改革，中国社会生产力将会在新的瓶颈中困锁。摆脱这一困锁的路径是什么呢？摆脱这一困锁的路径还是邓小平所说的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③] 两条缺一不可。确切地说，就是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经济上发展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 页。

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人一谈到民主就害怕，以为民主是资产阶级所推行的“普世价值”。民主作为一种理性概念具有普世价值，但西方占据着“民主”的话语优势，以至于每当论及“民主”时，人们就很自然地把“民主”与西方的“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民主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同时还指出，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① 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民主政治的进步；反过来，只有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才能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第六章
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五位一体"建设体系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国家治理的具体执行者是政府，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就是指政府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指人的现代化，更是指制度的现代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这固然是对的，但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绝对不能替代制度的根本性。因为人具有自私性，因而人不能弥补制度缺陷，反而因自私性而往往钻制度的空子。但是，建立一个完善且有效的制度，则可以遏制人的缺陷。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道。有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西方现代化也有过腐败的一段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集权体制必然导致腐败。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的最直接表现，跟现代化进程没有任何关系，跟政治体制的类型也没有关系。"君主政体会腐败为专制政体，贵族政体会腐败为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会腐败为暴民统治"。[①] 认为腐败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荒谬的；而把腐败与某种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主观上对该政治体制存在着某种偏见。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中国是集权体制，而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双轨制改革使腐败的生存获得了更大的制度空间。双轨制持续的时间太长，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下降，进而催生了腐败。因此，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抓手就是惩治腐败。

---

* 本章主要内容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年第 2 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修改。

①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胡家勇、王兆斌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9 页。

一、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

改革不应该产生腐败,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是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在第三章中,我们列举了"透明国际"关于中国改革以来的腐败指数所表现的中国腐败程度。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腐败程度被夸大了,认为"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并不客观,它只是一个认知指数,是主观上认知的结果,这一指数并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一般而言,严重的腐败现象总是伴随着两种情况出现,一是较低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水平;二是外国投资者不敢前来投资。① 从这两种情况来看,中国都没有出现。从投资和经济增长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一直比较高,特别是民间投资率最高时增长率超过了30%,经济增长率30多年平均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从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来看,以"十一五"期间为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从2006年的694.7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748亿美元,增长了13.6%,继而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增幅高达23.6%。进入2009年以后,利用外资有所下降,但与中国内部环境没有直接关系,完全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②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FDI下降了54%,但中国利用外资下降幅度仅仅在20左右。由此可见,相对来看,中国总体吸收外资状况比较乐观。虽然这两个指标并非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腐败的标尺,但它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仍然良好的现实,甚至可以说,中国仍然是资本的最佳避风港。

但是,中国的腐败现象的确在蔓延。腐败呈现出向一些关键领域、社会领域扩散的趋势,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日益严重,一些腐败分子集政治蜕变、经济腐败、生活腐化于一身,案件类型多样化,作案手段日趋复杂,呈现隐蔽化、智能化的特点。中国权力腐败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历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统计,1979~1982年全国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 225件,1983~1987年间则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 318件,1993~1997年间更增至387 352件,1998~2001年则高达

① [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著:《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②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统计相关各年的统计报告。

155 026 件，这 21 年间查处的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 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① 根据 2004 年 2 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仅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11 月一年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72 649 件，被党纪政纪处分的 174 580 人，其中县处级干部 6 043 人，厅局级干部 411 人，省部级干部 21 人。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8 年以前的五年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累计立案数为 179 696 件，涉案人数达到 209 487 人，县处级以上干部 13 929 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930 人，省部级干部 35 人。2009～2012 年的四年中，立案数为 132 461 件，涉案人数是 171 301 人，县处级以上干部 10 604 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771 人，省部级干部 25 人。②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腐败问题呈骤然上升的趋势。所以说，当前最大的危险仍然是腐败。

腐败是社会和执政党的毒瘤。执政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因内部腐败而丧失政权的风险。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瓦解。任何程度的腐败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相悖，甚至会有使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危险。在这方面，苏共的亡党亡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重要的历史教训。苏共亡党亡国有诸多原因，但内因还是在苏共内部。由于国家权力被党内少数人所垄断并成为了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特别是经过较长的和平时期后，社会比较稳定，党内干部已经不再具有危机感，也忘记了人民大众在革命时期对党所给予的支持，开始用权力来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始则惭焉，久而安焉"。长此以往，苏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③ 这个特权阶层，"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峰的那个不太牢靠的阶梯"。④ 一旦爬上这一阶梯之后，他们关心的就只是权力、地位和利益。这个阶层通过权力与普通群众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也通过权力享受着特殊的物质生活。加之苏共的干部任命制使特权阶层达到权力"世袭"的目的。⑤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也同样指出："苏联党——国家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

① 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年第1 期。

② 参见相关各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http://www.spp.gov.cn/site2006/region/00018.html。

③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7 页。

④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 1981 版，第 43 页。

⑤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青者的见证》，徐葵、张达楠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9－310 页。

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和权”。[①] 所以，当叶利钦等当时党内的“激进民主派”高举着民粹主义的旗帜反对党内特权时，迅速就获得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正是从党内滋生出的民粹主义成为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的最重要力量。

改革中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改革本身的问题，更不能因此而不进行改革。相反，更应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各种腐败。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弄清楚改革在哪些方面使腐败得以滋生，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长期以来着力于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改革，而没有或很少以消除腐败为目的的改革。诚然，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始终注重廉政建设。早在 1982 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②] 后来，这一思想发展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③] 但是，邓小平注意到在“六四”政治风波中，学生中比较集中的口号是反对腐败，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权力腐败的现象在蔓延，“所以要整顿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④] 因此，邓小平在跟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⑤] 1992 年春，在新的改革即将启动之前，邓小平提出了警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⑥] 由此可见，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非常清楚改革不只是要发展经济，而且还要防止腐败。对中国而言，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经济增长，很少是为了预防腐

---

①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湘荣、孟鸣歧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0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6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3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4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9 页。

败，因为当今中国的政治伦理是把政治人视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腐败，即便出现一些腐败现象，也是个别官员的例外现象，是个别官员缺乏道德修养，很少考虑应加强外部制度的建设。正如前文所说，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的头等大事，所以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且在围绕这个中心的同时，制度在选拔人才时也首先考虑的是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人才。尽管中国共产党在选拔人才时也强调德才兼备，但强调的也是经济建设的才能，一个人如果在经济建设方面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且一旦被委以重任，则往往被单方面地视为道德高尚的人。因此，所谓德才兼备，很有可能是组织部门的认可，而非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把国家的权力置于一种被认可的道德上，并且这种道德事实上没有任何外在制度的约束，甚至还希望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拥有这种道德，在运用权力时能够坚持道德原则。这显然是把人善的一面人为地扩大了，而把恶的一面无限地缩小了。把人的内部品德置于外部制度上，必然使权力运行的风险人为地放大了。把权力建立在个人道德的基础上，当个人道德经不起考验时，损失最大的是国家，受伤害最大的是国家的公权力。事实上，离开外部制度来空谈道德素质，往往是空谈。离开了外部制度的约束，任何道德说教的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外部制度的情况下，当然不乏道德高尚之人，能够廉洁奉公，但难保其道德藩篱被物欲所击溃、摧毁；同时，也难保所有位高权重的人——甚至也难保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始终保持品德高尚。毕竟人的劣根性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时而不时地冒出来。特别是在手中掌握着国家巨大资源的情况下，没有外在的约束，又能永远自律的人，绝非凡人。像曾国藩进金库清点黄金白银时，是光着屁股进去、光着屁股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道德有多么高尚，而是因为他害怕政治对手对他陷害而毁掉了前程。也就是说，这种自律是为另外一种自私服务的。一旦另一种自私的目的达到后，这种自律就会被抛弃。因此，外在的制度建设才是关键。中国的改革恰恰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欠缺的。

其三，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双轨制，但双轨制延续的时间太长，从而给腐败提供了制度性的生存土壤。前文已经述及，中国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双轨制，即新旧体制同时并存。这种体制结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避免了大起大落的社会动荡。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中保持着相对稳定，并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下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也正因为如此，双轨制在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合法性。双轨制原本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但因为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效应而成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秩序性的制度安排。结果，双轨制被无限期地持续下

去了。然而，双轨制毕竟存在着权力腐败与寻租的制度缝隙，随着它被无限期的延续下去，使得权力腐败和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其直接结果，如美国学者在研究美国腐败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催生了一个“劣政府”。[①] 在中国，“劣政府”表现在地方政府的施政方式上，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位主义。“劣政府”还刺激一些市场行为主体采取“抄近路”的方式进行行贿，以提高该行为主体的市场效率，进而赢得竞争。于是，在中国一些地方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机制：双轨制—腐败与寻租—“劣政府”—以行贿、受贿为主的腐败。

正如前文所说，虽然改革中出现了腐败，但不能认为腐败是改革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我们只能说腐败是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副产品”，改革本身就是要避免这种“副产品”的出现。既然出现了这样的“副产品”，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消除，不能因此而放弃改革。当然，也不能将腐败视作改革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而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态度最终会导致改革失败，也会葬送改革已取得的成果。

二、腐败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的直接体现，同时腐败也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低下，两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美国学者苏珊・艾克曼从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提出了腐败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能力，并分析了产生腐败的四种情况：其一，政府本来被赋予依照合法标准而非行贿意愿来为个人和企业配置稀缺资源的责任。但是，当政府不能发挥这种功能的时候，贿赂就会像价格一样使政府提供的稀缺资源的供求趋于平衡。其二，在现有的工资水平和内部监督水平下，政府官员可能根本没有动力做好本职工作，他们可能会拖延事物或者设置其他障碍。在这种情形下，贿赂对这些官员能起到一种激励性的作用。其三，那些从事合法生意的企业或个人力图降低政府以税收（包括关税）和管制等方式向其施加的成本，而贿赂则能降低这些成本。其四，从事非法经营的企业经常从国家手中“购买”腐败性的收益。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非法企业和犯罪集团的头目甚至能够通过贿赂和恐吓手段把警察和其他国家部门置于其控制之下。在这

①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胡家勇、王兆斌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1页。

种情况下,贿赂助长了犯罪活动。上述四种情形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①] 那么,腐败在哪些方面导致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呢? 下面笔者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来阐述腐败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腐败对政治最大的影响是导致政治上出现"软政权"现象。所谓"软政权"现象就是瑞典学者缪尔达尔所说的,社会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的意识,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从规章和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②] 他指出,腐败是"软政权"的产物,同时它又会导致政权进一步软化。[③]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萧功秦根据缪尔达尔对软政权的描述,把"软政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反法制的互利性",即社会成员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金钱等,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的私利进行交换;二是对法规的遵守与解释的松弛性与随意性;三是对包括下层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渗透性和普遍性;四是贪污、腐败等各种属于软政权的行为模式彼此的互诱性和积累效应。[④] 在这里笔者用的是"软政权"现象,而不是"软政权化",意味着并非是指整个中国政治,而是指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政治中的某些领域、某些地方政权出现了"软政权"现象。中国政治生活的"软政权"现象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一把手"问题。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一把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一把手职位高,权力大,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多,一把手极易成为各种势力腐蚀的对象。而"一把手"自身因民主意识淡泊和家长作风盛行而在班子内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根本不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就是所谓的"一把手"问题。对于"一把手"问题,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注意到了,并且要求加强对"一把手"的教育和监督。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⑤] 邓小平还指出,"一

---

① [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著:《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②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颜朝阳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③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颜朝阳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④ 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把手”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①] 他们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邓小平要求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②] 但是，从历年查出的腐败案件来看，涉及党政一把手的案件所占的比例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是公权力私有化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的基本原则。简言之，就是人民赋予了“公仆”的行政管理权、资源配置权、经济管辖权、人事任用权、司法执行权、财物审批权等管理国家事务的公共权力。但是，在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人民不能监督的情况下，某些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把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公权力私有化现象。公权力私有化虽然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受贿之类的腐败行为。受贿等腐败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所以受贿的官员最初多少还有点慑于法律的威严而在受贿之后心存余悸。但是，公权力私有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判断行为者的行为是否违法，甚至在有的情况下这些行为还堂而皇之地被冠以“组织”或者“制度”的名义。在当今中国改革过程中，公权力私有化现象表现为：（一）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制度、政策，从而能够以“国家政策”即“制度”的名义获得普通群体难以获得的社会资源。（二）人为地改变地区、部门的某些规章制度，特别是改变地区、部门的分配制度，并以“改革”的名义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三）提拔干部任人唯亲，不遵守程序，或者打破正常的程序提拔自己的亲人、亲信，从而导致公务员家仆化。（四）以“组织”的名义合法地占有社会资源，或者以“组织”的名义提拔自己的亲信或者享有某些特殊资源。改革开放 30 多年，虽然主流上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公权力私有化也恰恰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益严重。这可能要算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了。即便是较少的“副产品”，其负面效应也不可小视。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9 - 33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2 页。

三是公权力市场化，导致买官卖官现象。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权力资本化的问题，主要是权力作为一种市场要素参与市场竞争。这里所讲的权力市场化是指权力作为市场交易的客体而成为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谋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它既表现为权钱交易，也表现为权物交易，归根结底是用公权力与其他利益进行交换以换取更大的收益。公权力市场化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比较普遍，但封建政治传统并没有被革命彻底根除，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基因"在当今中国政治发展中时而不时地发挥着某种影响。因此，即便在当今，中国政治体制内买官卖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四是公权力运行潜规则化、暗箱操作。公权力运行的潜规则化是廉政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所谓廉政，包含四个要素，即：(一)"廉正"，指政府及其官员在履行公务、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廉洁而公正、廉洁而正直，不贪污、不受贿、不枉法；(二)"廉朴"，指政府及其官员取之于民者少而用之于民者多；(三)"廉节"，指政府及其官员在国家管理活动和处理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活动中具有清廉无私的品德或节操，也称廉德；(四)"廉制"，即有关廉政的制度。从四个方面来看，前三者主要是内部(品德、操守)的建设，第四个方面才是外部的建设。笔者认为，廉政建设的关键是廉制建设。前三者，中国是做得比较好的，但廉政建设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过去30年来，中国在廉政建设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但这些仍然是内部建设的制度，而不是外部建设的制度，即不是关于制度建设的制度，而是关于检验人的道德的制度。例如，个人事项申报。虽然明确规定了个人事项申报的范围，但个人往往会隐瞒一些事项，觉得这事无关紧要。即便事关重大，只要个人不出问题，这种行为完全不会受到纪律处分。也就是说，这不是制度建设的制度，是内部道德的一个最低要求。述职述廉也是一样，在没有被明确为是有问题的干部时，即便自己有问题(只要尚未进入纪检程序)，在述职述廉时，照样会讲自己做得如何好。即便有一些关于制度建设的制度，但大多数都是关于权力与掌握权力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制度，如干部任期、回避、交流制度，干部问责制，在任、离任审计制度等。很少有关于权力运行的制度，以及关于权力与没有掌握权力的人的关系的制度。而恰恰是权力运行过程是腐败产生的最大空间。一旦真正建立起关于权力运行的制度，那么权力与握有权力的个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就自然可以理清，同时权力与没拥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制度也可以建立起来。由于缺乏外部制度的规制，结果权力运作暗箱操作，正式的制度被潜规则排挤，潜规则成为了正常社会的规制手段。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导致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群体泛滥。

从经济方面来看，腐败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影响资源配置；二是腐败抑制经济增长；三是腐败导致低效。

关于腐败影响资源配置，美国学者苏珊·罗斯·艾克曼针对贿赂对稀缺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她用一系列的案例来证明贿赂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倾向于行贿的市场主体。她认为行贿会增加腐败的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而政府公务员出售的是稀缺资源。政府对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目的是要落实政府的计划，但在贿赂的干扰下，政府的计划往往会落空。[①] 国内也有学者围绕腐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例如，任建明、杜治洲认为："腐败的官员在分配资源时是根据关系和影响，根据对方支付贿赂的数额来做出决定，而不是根据企业的实际能力做出决定，从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同时，在资源计划分配和市场配置同时并存或存在黑市交易的情况下，腐败的政府官员往往为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包括黑市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所吸引，从事资源的转手倒卖活动。"[②]类似的情况使腐败的官员获得最大收益，而资源配置则因扭曲而无法实现最佳化。腐败实际上还提高了公共品的成本，降低了公共品的质量。[③] 资源配置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当它遭遇到腐败时，资源配置制度运行的成本无疑会提升，而资源配置制度的质量也因腐败而降低了其服务社会的质量。

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腐败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笔者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即便有增长，那也是腐败性的增长，即由于个别市场主体通过贿赂的方式优先获得稀缺资源，从而获得短期性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由于是通过贿赂实现的，它必须通过进一步的贿赂来维持这种增长，并且它也不能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而从长期的情况来看，腐败必然会导致投资减少，使经济增长减缓。[④] 这是一般规律。有学者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把它的腐败指数（按 0—10 分打分，0 是腐败最严重的，10 是腐败最轻微的）从 6 提高到 8，那么就能把它的外国直接投资率提高 4 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增长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⑤] 反过来，如果腐败指数从 8 降

---

① 参见[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著：《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 8 页。

② 任建明、杜治洲著：《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4 页。

③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21 页。

④ Mauro P., "Corruption and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cx, Issue3, 1995.

⑤ Wei Shang-jin, "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ebruary, Vol. 82, No. 1, 2000, pp. 1 - 11.

到6,则其国外直接投资率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增长率降低0.5个百分点。

关于腐败与效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腐败必然导致低效。对此笔者非常赞同。艾克曼指出,“腐败市场”不会像合法市场那样有效率。这是因为,其一,贿赂的非法性迫使双方必须消耗一定的资源来隐藏其非法交易;其二,一些潜在的非法交易者可能由于良心上的不安或畏惧惩罚而拒绝进入“腐败市场”;其三,为了避免交易内容泄露,政府官员仅仅同内部人士和信得过的亲信进行交易。所以,腐败的资源分配系统不仅会降低全社会的效率,而且还会使经济发展中的竞争面临不确定性。①

从社会方面来看,腐败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腐败会破坏社会公平。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改革的某些不合适政策却使改革产生了不少“副产品”。例如,前面的章节已经述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本来是改革所体现的“梯度发展”思想,但实际上先富起来的是掌握着权力的一部分人,他们通过权力资本化而获得了先机性的富裕;同样一部分地区则是依靠中央政策的扶持而获得了发展的优势。这两种情形都造成了社会不公正。特别是前一种情形,权力资本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寻租。通过这种情况富起来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希望他们能够带动其他人走向富裕,相反他们会利用权力不断地集中社会资源,以至于那些没有权力支撑的市场主体在改革中无法获得发展机遇,从而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和被剥夺感。

其二,腐败破坏法治。法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法制能否得以维护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前文所说的“软政权”现象,也反映出腐败已经使法制成为苍白无力的一种摆设。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实际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权力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法律的权威被践踏之后,权力常常会被滥用,权力腐败也常常会泛滥成灾。更为甚者,一些握有重权的人明明是在利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包括个人政治图谋,但往往因为他位尊权大而逃脱了群众的监督,一时也会逃脱法律的惩处。

其三,腐败导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领导干部一向被视为道德楷模,因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因此,领导干部的道德对社会具有

① 参见[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著:《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导向的作用。而官员的腐败对社会风气产生了直接的冲击。社会的道德楷模出了问题，社会道德就跟着滑坡，社会风气就难以匡扶。邓小平当年就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①]"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②]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③]反过来，党风不好会直接影响社会风气，党内干部的腐败会直接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

其四，腐败危害社会心理健康。有关腐败与社会心理的研究很少，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实际上腐败对社会心理有直接的作用。这些作用表现为：(一)腐败引起社会的"仇官"心理。官与民的关系本是鱼水之情，但因官员的腐败且腐败又没得到法律惩罚的时候，社会就会对官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仇视心理。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党群关系在某些方面比较紧张，且"仇官"现象也比较突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员的腐败，以及由官员腐败引起的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二)官员腐败导致社会上对官员、政府以及相应的制度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特别是不少安全事故、食品卫生事故等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官员的腐败有关系，导致政府、政府官员所说的话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以至于人们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政府的话你也信?!"由此可见，官民之间的信任赤字已经到了不可附加的程度。(三)官员的腐败还导致年轻一代产生一种畸形的心理：即认为事业成功必须靠欺骗。在传统的成功教育中，我们一直提倡诚实守信、勤奋刻苦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但年轻人所目睹的事实与我们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特别是当看到不少人靠坑蒙拐骗、欺诈而成功时，他们内心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成功心理。

总之，腐败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执政党及其政府对国家的治理能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有学者把腐败视为社会转型的产物，也就是把腐败视为改革的结果。众所周知，转型只能向更好的社会秩序发展，而不该向更坏的社会秩序倒退，否则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社会转型呢？因此，把腐败视为改革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在否定改革。当然，腐败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7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不是改革的结果，但它是改革的"副产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克服和消除改革带来的"副产品"，使改革的正能量能够充分释放出来。

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国际比较

既然腐败是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就是加强对腐败的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各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治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同样治理绩效也大相径庭。美国、俄罗斯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大国，治理腐败的方式也不一样，那么这两个大国在治理腐败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对中国有何启示呢？

美国曾经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特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腐败达到了顶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助长了当时美国的腐败呢？中国学者周琪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19 世纪前半叶，联邦和州政府把大量公共资金用于促进州和国家经济的项目，从而增加了政府官员利用项目贪污的机会。（二）1830 年以后，那些在革命战争或 1846 年美墨战争中遭受财产损失的人或那些认为自己有资格因服役而得到养老金的人，都涌入国会要求得到补偿。1850 年以前，联邦法律要求国会拨款赔偿所有合法的赔偿要求。由于从美国全国各地到华盛顿来提出赔偿要求既耗费时间，又开销太大，那些有赔偿要求的人通常求助于一些在华盛顿有影响的朋友或代理人来进行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会议员乘机挂牌营业，帮助这些人向国会、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出赔偿要求。他们公开打广告说自己有各种关系可以帮助这些人尽快得到赔偿。（三）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得它几乎来不及思考和发现一个控制腐败的方法。工业革命使强大的私人组织有可能控制很大一部分国民经济，并能够收买各级政府中重要的官员。（四）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开支来打赢南北战争，这使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权限来控制资金。南北战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联邦范围内的贪污，合同商把战争部成百亿的美元花在了伪劣产品上，而战争部的官员可以通过帮助合同商取得军事合同来得到回扣。①

第一种可以称为"项目回扣"型的损公肥私。第二种叫作"权力资本化"；第

① 周琪：《美国的腐败和反腐败》，载《美国研究》2004 年第 3 期。

三种可以称为"权力被俘获";第四种则是指在战争中敛财。通过大量的工程项目进行损公肥私的现象,在1826年伊利运河竣工后的美国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伊利运河修建以后,其他州也仿效纽约市兴修运河,或者向运河公司贷款。各州资助了大量公共项目以确保它们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各级政府支出范围的扩大,增加了政府官员贪污的机会。在联邦层次上,国会在特殊利益集团和公众的敦促下,扩大了联邦部门的责任。在联邦岁入增加的同时国会增加了公共开支拨款,于是道德低下的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便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把公共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美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由于不知道其账本,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实际用于工程,有多少装进了私人腰包。但是,从项目预算成本与实际支出的对比来看,当时美国的工程项目腐败确实相当严重(见表1)。

表1 19世纪美国主要公共工程项目的预计成本与实际支出①

时 期	公 共 工 程	预计成本(美元现值,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美元现值,百万美元)	实际支出与预算成本之比
1817—1825	伊利运河(纽约州)	5.75	8.40	1.46
1824—1829	切萨皮克和特拉华运河(联邦政府)	1.35	2.20	1.63
1825—1835	俄亥俄和迈阿密运河(俄亥俄)	5.13	5.93	1.16
1835—1862	伊利运河的改扩建(纽约州)	12.42	30	2.24
1838—1843	克鲁顿引水工程(纽约市、县)	8.46	11.45	1.35
1883—1926	密西西比河大堤(联邦政府)	11.45	>229.00	>20.00

"权力资本化"的现象一般在社会转型时期最为突出,因而这种现象在原苏联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比较严重。后面会有论述,这里暂不赘述。"权力资本化"现象在当今的美国是很少见的,但美国从建国初期的"铁腕"时代向"看不见的手"的时代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即权力作为一种市场资本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正如前文所说的,国会议员挂牌营业并通过自己的关系来"帮助"人们向国会、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出赔偿要求,同时自己获得丰厚的报酬。市场中介机构属于市场主体,国会议员作为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公务员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同时又兼做市场主体,并通过自

① 参见[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的《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9页。

己的权力网络来经营市场业务。这实际上就是权力作为一种市场要素进入市场了。虽然这里只是涉及一个案例，但当时美国社会经济也处于转型过程中，“权力资本化”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政府官员被市场主体收买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权力被俘获”。收买的方法众多，但主要形式有：(一) 收买官员掌握的政府特许经营权；(二) 收买官员掌握的政府配额；(三) 收买国会议员，使国会立法有利于自己所在利益集团的法律。针对特许经营权的腐败租金问题以及政府配额的问题，霍华德·博登霍恩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 19 世纪初以前的美国，银行还在实行特许经营权制度，由于各州一般都限制银行特许权的发放，因此特许权的潜在租金规模特别大，那些试图获得特许权的未来银行家往往不惜血本；① 沃纳·特勒斯肯则对美国 19 世纪公用制度规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指出特许权和配额导致腐败盛行于公用事业。② 至于收买国会议员的设租型腐败，在 19 世纪的美国就更司空见惯了。

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健全，对腐败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和预防机制。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腐败与民主制度、专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联系，美国从建国始就建立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但 19 世纪的美国为什么会腐败非常严重呢？难道是美国进入 19 世纪后就转变为专制制度了吗？不然！任何政治制度只要监督机制、预防机制不健全，都会产生腐败。即便是专制制度，如果它的监督机制和预防机制健全，也可以避免腐败。笔者追述 19 世纪美国的腐败问题，并非是只说说美国的腐败，而是要进一步分析美国是怎样治理腐败的。

美国对腐败的治理并非一朝一夕就取得功效的，而是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完善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首先是建立相应的法律约束机制。例如，针对当时银行特许权的腐败问题，1828 年纽约州州长马丁·范布伦要寻找一个解决银行问题的方案，并于 1929 年颁布了《安全基金法》。根据该法案的规定，以后所有的特许银行，无论特许权是新颁发的还是续期的，都要缴纳相当于实收资本 6%的费用作为基金，用于赔偿那些破产的会员银行的票据持有人和储户。该法案规定了一般特许权条件，并建立了美国最早的银行监管机构。③ 当然，安全基金制度并没有彻底杜绝、甚至没有根本减少特许权腐

① 参见[美] 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的《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七章。

② 参见[美] 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的《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八章。

③ 参见[美] 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的《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368－369 页。

败，纽约州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反复博弈，最后在1838年通过了《自由银行法》，银行制度用"法治"取代了出于特殊利益的立法，用相对固定的行政程序和政策代替了特殊、易变、个人化的特许权条件。在这种情形下，执行规则的监管者就不那么容易腐败了。[①] 与此立法过程相类似的情形，在美国各个领域比比皆是。又如，针对国会议员经营补偿中介的情况，国会在1853年通过了一个针对财政部欺诈行为的法律，禁止任何美国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因代表私人主顾向联邦政府提出赔偿要求而得到报酬。[②] 1864年6月，国会通过了另一项法律禁止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包括国会议员，通过提供与对美国的起诉有关的服务而得到报酬。

其次是在政治权力运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政党约束机制。美国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两党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但是，在制宪过程中，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而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则坚持维护州权，保障个人权利。1791年，"反联邦党人"成立了民主党，1974年，改称为共和党。然而，这并非当今美国的两党制。当今美国的两党制是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形成的。独立战争以后，共和党因在维护联邦制度上的重大胜利而获得全社会的支持，民主党则因分裂和维护奴隶制的主张而一蹶不振。所以，共和党在战后长期执政。正是由于一党长期执政，政府腐败现象才愈演愈烈。特别是格兰特政府期间的腐败丑闻导致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对旧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把扩大选举权看作是为分赃制铺平道路。但另一方面，70年代初民主党的复兴使格兰特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十分恐慌，他们担心民主党利用共和党的丑闻来败坏共和党的名声。正是腐败导致共和党丧失了政权，1884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政权。然而，克利夫兰任期中，民主党并没有解决政治腐败问题，结果在1897年，政权又回到了共和党手中。或许是共和党吸取了政党轮替的教训，在治理腐败上加大力度，美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当然，这恰逢美国的文官制度改革带来了积极的效应，从根本上遏制了分赃制带来的弊端。

再次是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倡导新闻自由，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媒体监督机制。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杰斐逊曾经说，宁愿要没

① ［美］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91页。

② 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egulation*,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8, pp. 9-12.

有政府的媒体，不愿要没有媒体监督的政府。诚然，即便是在被视为新闻自由的美国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例如，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媒体的资格授权来直接干预媒体。即便政府不会因媒体的内容问题而取消媒体的资格，而且如果政府这样做，一旦被相关媒体知道，会被起诉政府违反宪法，但政府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导致相关媒体在报道时出现困难，甚至会“因技术故障”而不能报道。再说，违反宪法如果没有机构或个人的投诉，一般不会有谁来追求其责任。所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暗中干涉媒体往往会被“默许”。然而，随着政治腐败的日益严重，以及媒体本身要吸引读者，媒体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揭露社会的丑恶一面来争取更多的读者。这就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扒粪运动”，那些专门揭丑的记者被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这些立法涉及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遏制腐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19 世纪中期的土地改革运动，20 世纪初兴起的进步主义运动，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发起的政府道德革新运动等，都推动了美国行政部门的结构性变化，使美国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这些运动是美国政府治理腐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成功举措。不过应该看到，在治理腐败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乃至普通民众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大国俄罗斯的情况。俄罗斯是典型的转型国家，在苏联时期，经济体制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剧变过程中，国家解体的同时在经济上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由于原有制度的知识存量被摧毁，腐败和犯罪就像流行性病毒一样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蔓延开来。在苏联时期，腐败和犯罪问题本来已经比较严重，但由于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它们基本上都隐藏在社会的背后。可是在转型年代，由于国家衰弱、社会混乱以及人们从过去的禁锢中突然解放出来而产生的自由冲动的巨大能量欲全面释放出来，从而冲击着脆弱的国家系统。结果，俄罗斯像一个免疫力被彻底破坏的病人一样，感染上了这种流行性病毒。[①] 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激进转型中，俄罗斯 70%～80%的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向黑社会交保护费，而这一比例

① Thane Gustafson , Capitalism Russian-Styl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6 .

一般都要占到其收入的10～20%，有的甚至高达其利润的一半。[①] 据俄罗斯总检察院2004的初步估计，俄80%以上的官员有腐败行为；据俄社会舆论基金会2008年9月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有29%的俄罗斯人曾被迫行贿，经常被迫行贿的企业家高达56%；据俄内务部统计，2009年俄罗斯受贿金额高达3 000亿美元。2012年，俄罗斯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排行榜上仍然属于严重腐败的国家，国家已脆弱得根本无法向民众提供基本的法律秩序，更无法提供确保市场开放和市场诚信所需要的法律框架和规范，以致于在社会生活中合法与非法已完全变得模糊了。[②] 腐败的产生有很多原因，但是几乎所有的腐败都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即最初通过一些潜制度规则获得收益，最后就只能通过进一步使用潜制度规则来保护这种收益，通过腐败而获得的收益只能通过进一步的腐败才能获得保护。[③]

俄罗斯的腐败有多种形式：一是权力俘获，即商人用金钱收买政治家，其结果是商人干政。二是渎职型腐败，即政府官员故意失职和不作为，拖延时间、互相推诿、官僚主义，不给好处就不办事。这是一种权力设租，依靠职责范围的权限捞取好处，属于政府官员的一种故意不作为。三是补偿性腐败，这类腐败主要是政府官员以损害当事人利益相威胁，敲诈勒索。但是，俄罗斯最典型的是设租型腐败，即立法腐败。寡头对国家资产的掠夺主要依靠立法的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政府部门的俘获而使国家制定相关法律对过去已攫取的国家财产合法化，或使国家的立法有利于自己进一步攫取国家的财产。赫尔曼和考夫曼专门设计了一个《商业环节与企业业绩调查(BEEPS)》的数据，创立了一个政府俘获的跨国指数来研究转型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这一数据模型揭示了转型国家寡头对政治俘获的普遍性规律。[④] 与许多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政府俘获现象最大的特点是，寡头对政权进行"俘获"所付出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来自于原苏联时期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他们在转型过程中可以直接控制"立法委托人"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直接制定转型过程中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制定关于私有化的各种法律和规章。另一方面，由于俄罗

---

① Thane Gustafson , Capitalism Russian-Styl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7 .

② Thane Gustafson , Capitalism Russian-Styl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9 .

③ Thane Gustafson , Capitalism Russian-Styl 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 .

④ Joel Hellman , Geraint Jones , and Daniel Kaufmann , "Seize the State , Seize the Day : State Capture , Corruption ,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 "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44 , Washington , 2000. 详细的分析数据可参见 http: // www. worldbank. org/wbi/governance。

斯在“十月事件”后建立了“总统集权制”，总统是政治决策的关键，总统决定了的事几乎没有更改的可能。因此，寡头对政权机构实施“俘获”时，往往直接针对总统本人，要么说服叶利钦总统吸收本集团的某人进入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要么直接收买并影响或操纵叶利钦总统。既然俄罗斯的寡头集团是凭借政权而崛起的，那么它们对政权就有天然的依赖性，对现有政权的干预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后来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以一批寡头组成的、与叶利钦的政权融合在一起的“家族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腐败也就成为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并扩展到俄罗斯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国际反腐败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测算，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的腐败透视指数为 2.27，介于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之间，排在倒数几名。普京执政以后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整治腐败，包括成立直接隶属于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以及吸取某些国家高薪养廉的经验，提高政府官员的薪水等，从组织、制度和机制入手建立一套预防体系，从源头上来预防和打击腐败，但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腐败已经严重地腐蚀了俄罗斯的国家机器，也腐蚀了俄罗斯的年轻一代。据俄罗斯一家媒体在 21 世纪初的调查显示，俄罗斯 76%的年轻人认为“生活成功”归功于“不诚实”，只有 39%的人认为是“努力工作”。更有甚者，一些年轻人认为贿赂是通向成功的唯一之路。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已经像癌症一样深深地渗透到俄罗斯国家的机体中，以至于它在摧毁社会免疫系统的过程中对社会不再产生什么症状和痛感。① 即便是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其特点如下：腐败范围广，层次深，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程度深，总体呈现长期严重腐败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势头；腐败手段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腐败数额的多寡与城市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腐败呈现公开化的特点，往往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②

面对这种情形，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都极力推行反腐败措施。普京执政后就主张严厉惩治私有化过程中的严重腐败，采取措施打击金融寡头的违法掠夺，使俄罗斯在长期萧条后出现了经济复苏。普京甚至将反腐败视为一项国家计划，这表明反腐败的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是否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更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能顺利进行。③ 梅德韦杰夫政府也大力推

① V. Shlapentokh ，“Russia's Acquiescence to Corruption Makes the State Machine Inept,”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Vol. 36 ，2003 ，pp. 151 - 161 .

② 戴隆斌：《俄罗斯腐败的特点及其原因》，载《社会主义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③ 庞大鹏、金哲：《俄罗斯的“反腐败国家计划”》，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3 期。

行反腐败措施。近年来，俄罗斯的主要反腐败措施如下：

第一，严禁商人干政，彻底清除叶利钦时期商人干政的腐败陋习，把干政的金融寡头们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驱逐出境或关进监狱。

第二，制定"国家反腐败战略"，全面规划和组织全国的反腐败工作。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刚刚就任总统就宣布"国家反腐败计划"正式启动，后又经多次反复研究，制定了《反腐败国家战略》和《2010～2011年国家反腐败计划》。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了总统令，正式实施这两个法规。

第三，建立专门的反腐败工作机构，为全面贯彻国家反腐败战略提供组织保障。2004年普京成立的"反腐败委员会"，由政府总理领导；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上任伊始就宣布成立由他直接领导的反腐败委员会，以增加反腐败的力度。

第四，制定《反腐败法》等法律法规，为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其中包括：建立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行为；严格规范政府各部门权限，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强化国家和社会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政府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确保腐败官员难以逃脱惩罚。这些法律法规构建了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预防机制，也赢得了俄罗斯舆论界的广泛称赞，但并未解决深层次的矛盾，腐败仍然继续盛行。[①]

第五，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强化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按照规定，需要进行财产申报和公开的有三种人：在联邦国家政府担任领导职位的人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联邦政府中担任国家公务职位的人员，也就是联邦政府公务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国有公司负责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报信息包括：主要工作收入、学术活动收入、教学活动收入、其他创作活动收入、有价证券及商业组织参股收入、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存款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的个人收入信息；不动产和交通工具等财产信息；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账户的货币资金信息；股票、股份、债券、票据等有价证券信息；财产性债权债务信息。

第六，所有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的负责人不得拥有海外账号。

从美国、俄罗斯治理腐败的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第一，腐败的确难以清除，但可以通过治本的手段来尽可能减少权力腐败的现象。美国经过近百年的腐败治理，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不能说美国没有腐败问

① 胡仁霞：《俄罗斯新一届政府反腐败措施及其预期成效》，载《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5期。

题了，但至少可以说美国的腐败现象已经降到了最低水平。假若真的如有的媒体所说的那样，腐败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容忍的，那么美国的腐败的确能够让民众保持较高的容忍度。美国对腐败的治理时间比较长，而且整个官僚系统对反腐败措施的执行力比较强。相比之下，俄罗斯因时间短，而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重构，因而问题复杂。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官僚系统对反腐败措施的执行力不强，常常是政策出来并没有真正执行。所以，俄罗斯反腐败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除非像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的超级寡头直接威胁到政权的时候，反腐败措施才得以贯彻。第二，美国对腐败的治理是多管齐下、不断完善的。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中国可能往往是在文件中形式主义地宣布一下，但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它的确是从法律、规章、媒体、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几方面同时推进的。因而，美国反腐败措施才产生成效。俄罗斯反腐败的方式往往是以打击政治对手为目的，而且只有政策性的宣示，一旦遏制了政治对手，反腐败的举措就会暂告一段落。所以，它不可能具有持久性的成效。第三，公众的力量非常重要。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公民社会力量，通过发起各种社会运动，把矛头直指权力腐败。因此，公民社会的力量对反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俄罗斯主要是在政治精英当中自上而下地反腐败，缺乏公民社会的支持，更缺乏公民社会的参与。尤其是俄罗斯社会有相当部分民众已经对权力腐败产生了冷漠感，这种冷漠感所体现出来的是对政府的失望和绝望。因此，民众认为腐败是正常的，不腐败才是不正常的。这样的社会心理实际上是在纵容权力腐败。第四，美国通过制度建设来反腐败是最为成功的。这值得我国学习，当然不是拷贝，而是根据中国国情来加强制度建设。另外，美国的媒体监督也是十分有效的。中国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虽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媒体不是监督，而是也如美国的媒体“扒粪运动”一样，有一个前提，即觉得中国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因而出现了乱咬的情况，实际上是“仇官”的另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理性的监督。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对媒体进行引导，使之在发挥监督作用方面释放正能量。第五，俄罗斯虽然反腐力度较大，但主要还是依靠个人权力来反腐的，靠政治强人来推进，制度虽然有，但常常作为一种摆设。中国已经告别了政治强人时代，更加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通过制度来反腐败。第六，由于俄罗斯曾经存在着严重的商人干政的现象，因此普京严禁商人干政，而且打击商人干政绝不手软。中国实际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商人干政现象，如商人资助网络媒体来掌控舆论，例如“乌有之乡”、“共识网”等，背后都是商人。商人为什么不去赚钱，而来推行意识

形态呢？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商业目的，通过网络讲一些执政党想听的话，从而获得政治性的商业增殖。二是直接的政治，或者自由主义倾向的价值观，把矛头直接对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与党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价值观，目的是让成功商人渗透到政界，从而捞取相应的政治资本。无论是哪一种，实际上都是商人干政，都对执政党有腐蚀作用。因此，应该严禁商人通过投资政论性的网站来影响政治走向的现象。

四、深化改革是中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手段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提醒："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①] 这实际上就指出，对党和国家的政权来说，问题主要在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而且职位越高，权力腐败的风险也越高。权力腐败的原因虽然我们都说是个人道德问题，一些领导干部道德败坏、世界观改造不够等，但归根到底其原因还在于，这些人手中的权力缺乏法律的监督、制度的监督。因此，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手段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法律制度，使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所谓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廉制"建设，即有关廉政的制度建设。这些制度包括：掌握权力的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制度；权力运行的制度和没有掌握权力的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制度。

关于掌握权力的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制度，要对两方面问题进行规制。一方面是任何人获得权力的方式应是法律认可的，不能让权力进入市场，力避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人民将权力授予了执政党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并不意味着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将公权力视为私有，可以随意进行交易。也就是说，权力从哪里获得，必须经法律承认。买官卖官现象本来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家天下"时代把权力视为一己之私。但是，当今中国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制度的缺陷和漏洞，封建专制时代的陋习或多或少地会在今天冒出来。例如，2005 年爆出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中，涉案官员达 265 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 50 多人。韩桂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0 页。

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据悉，马德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支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随后逐年回收了600多万元的投资回报，利润率超过600%。原绥棱县县委书记李刚向马德行贿50万元，之后依靠受贿得到210万元，获得400%的丰厚收入和300%的净利润。2006年1月，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黑龙江、山西、云南、河北等地发生的6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件。时隔半年后，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于2006年7月再次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原陕西省商州区区委书记张改萍买官卖官等7起案件的查处情况。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举动。2009年6月，安徽省巢湖市曝出买官卖官窝案，原市委书记周光全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公开审理，其中有2名厅级干部、6名处级干部因向周光全行贿买官被免去职务。由此可见，没有法律的规制，封建陋习就会像被激活的遗传DNA一样迅速地在中国社会的机体中活跃起来。另一方面，要求所有握有权力的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任何权力有超越法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改革开放以来，个别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重庆一案更表明对握有重权的人进行法律的规制十分重要。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党领导任命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①]这实际上就是强调法律对权力的规制作用。

关于权力运行的制度，其功能在于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制：其一，权力决策前的预防；其二，权力决策方式的科学性；其三，决策失误的追责。决策前的预防主要是防止决策的盲目性，也就是要做到决策具有科学性。长期以来，群众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群众只是在领导干部决策后被迫接受某种决策。领导干部则常常是过度消耗权力而盲目决策：一是只为了自己的政绩来决策，一切以政绩为目标；二是不求创新只求稳定；三是缺乏相应的能力又不愿意搞调查研究，不愿意听取群众意见，导致错误决策。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带来的结果是，践踏国家法制，给国家造成极大浪费，导致社会不稳定。盲目决策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形式上表现为个人英雄主义，实质上是无视法律的威严。事实表明，对国家来说，最大的浪费不是在生产上，而是在决策上。生产上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的浪费可能只是某些项目的问题，但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则是全局性的。另外，决策失误或决策错误，也会导致一些社会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建立权力运行的科学制度就是防范权力被过度使用、错误使用。

关于没有掌握权力的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制度，一是要明确权力的法律责任，即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权力对人民的利益具有天然的保护责任；二是要明确人民对被授予者有要求透明的权力；三是要明确人民对权力具有"二次授予"的权力。人民将权力授予人，不是让被授予者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而是让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使权力向人民负责。也就是说，人民信任一个政党，才将权力授予这个政党，授予这个政党的先进分子，使人民的利益能够置于权力的安全保护之下。被授予权力的人，对人民来说就没有个人的特权，更没有秘密使用权力的特权。同时，为了更值得人民信任，被授予权力的政党及其领导干部更应通过国家的法律坦诚地面对人民，公开自己的财产，让人民来监督自己是否以权谋私，是否假公济私等。这是取得人民信任的最基本方式。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在人民授予权力之后，很快就制定了财产公开的相关规定：瑞典在1766年就规定瑞典公民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政府开放记录，供民众查询；英国于1883年议会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美国于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又将它修订为《道德改革法》，制定了财产申报制度。比照国外，中国在1995年才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才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只是下级向上级申报，而没有向全体人民公开；同时上级是不会向下级"申报"的，就是说上级知道下级的财产情况，但下级并不知道上级的财产情况。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必然产生下级对上级的不信任感，人民对被授权的人的不信任感。即便如此，这项制度规定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关于应申报的家庭财产范围、申报程序、适用对象以及公布的方式方法方面，都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另外，还应该建立一种制度让人民对权力拥有"二次授予"的权力。由于人都会犯错误，有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在权力运行过程中造成的重大错误是不可以原谅的，因此人民第一次授予其权力就需要"自我纠错"，重新选择授予的对象，也就是"二次授予"的权力。这样就能够确保权力在人民的监督下运行。

要建立上述"廉制"，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有一股思潮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为由，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再进行改革，只要沿着既有的路子走下去便可以实现现代化。这种

思潮曾一度成为主流。如果不纠正，中国社会还真的会重新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有不少学者认为，苏联是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亡党亡国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并认为苏联是因为改革被不断拖延而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指导思想的错误而加速了亡党亡国的进程。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还不遥远。我们为苏共的丧权而惋惜，但更重要的是要引以为戒。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深化改革。在十八之后，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已初见端倪，尤其是关于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的举措正在实践中产生作用。通过这些举措，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身治党治国的能力。

第七章
改革与国家政治能力建设*

政治能力有时候与政治实力通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政治能力的大小强弱是衡量国家政治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尺。当今中国正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有效地进行各种风险控制、有效地解决政治冲突、有效地进行国民动员、有效地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行公平的公共政策，以及是否有效地拓展与保护中华民族的海外利益，进行必要的国际动员。而上述各项能力都与政治合法性有关，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政治合法性。

一、政治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

究竟什么是国家的政治能力呢？美国政治学学者罗伯特・W・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认为，政治是利益和价值分配引起的冲突，所以政治能力就是政府解决冲突的能力，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制度与合法性。当政治能力体现为制度能力时，它表现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的实际年龄和实行宪法以来的代际更替年龄；当政治能力体现为政治合法性时，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权力的实

---

* 本章主要内容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9 年第 11 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的补充和修改。

① 严格来说，实力的强弱与能力的大小是两回事，实力是客观的存在，而能力是主观努力的结果。政治实力强大的国家，其政治能力未必大；而政治实力弱小的国家，其政治能力未必小。可见，客观存在的政治实力要转化为政治主体的主观能力，需要政治主体自身具有转化能力。但是，为了便于分析，本文的理论假设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具备将政治实力转化为政治能力的能力。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之下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能力，就可以把政治能力与政治实力等同起来。

施与贯彻。[①] 很显然，杰克曼把政治能力置于国内政治的分析框架之中，把政治能力视为国内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在当今开放的世界，国内政治发展与国际政治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绝大推动之下，非国家行为体国际互动关系的发展，催生了日益频繁的跨国政治，这标志着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多元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代表跨国网络特点的影响模式就会出现：国内非政府组织绕过它们的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②] 因此，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完全分隔开已不合时宜。

国内有学者的确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分析国家的政治能力或实力。例如，阎学通教授认为，政治实力包括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员能力。国内动员能力是让本国人民自愿支持政府政策的能力，国际动员能力是让他国自愿支持本国政策的能力。他认为，从内容上讲，政治实力包括了权力和信誉两方面。国际政治实力的权力包括了一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拥有的法定权力，如参与权、投票权、提案权、否决权等；战略信誉则是其他国家对一国执行其所宣示的政策的可靠性的判断。信任的国家越多，一国的战略信誉就越高，否则反之。战略信誉高的国家盟友多，战略信誉低的国家盟友少。[③] 但是，一方面阎先生把政治实力与权力等同起来是值得商榷的[④]；另一方面，阎先生虽然从国际、国内两种视角来分析政治实力，但他只提及到国家的动员能力。实际上除了动员能力之外，政治实力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国家政治能力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是对内的能力，属于执政能力的范畴；后者是对外的能力，属于外交的一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国家政治能力由资源配置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危机和冲突的解决能力、国内动员能力组成。资源配置能力是执政党及其领

---

① ［美］罗伯特·杰克曼著，欧阳景根译：《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著：《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③ 阎学通：《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环球时报》2007年5月22日。

④ 如前文所说，实力是客观的存在，而权力则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社会性能力。在传统政治学中，正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指出的，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可见，传统政治学认为，实力与权力是没有区别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是静态的所有物，而实际上权力更多指的是一种关系，是动态多形的、流动的、变化的，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参见［美］丹尼斯·郎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导下的政府执政能力的最直接体现。资源配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二是公共资源的社会配置。这两个配置过程的合理性、有序性和有效性可以体现国家政治能力中资源配置力的大小。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无非两种：行政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配置手段没有好与坏之分，这早已是定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融危机有摧毁美国金融体系的趋势。为了拯救金融体系，美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市场进行了干预，并且违背了一向信奉的自由市场主义原则，而掀起了一股"国有化"浪潮，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成为众多私人机构的控制性股东。可见，无论哪种配置手段，归根到底还是要看资源配置是否达到了合理性、有序性和有效性。如果达到了这些要求，那么意味着国家的资源配置力是强大的，反之就是弱小的。公共资源的配置涉及到具体利益的分配问题，在这方面，资源配置力体现在：以公正、公平的制度安排为基础，妥善协调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这也是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风险是指客观的实际与主观的预期之间的偏差，偏差越大，风险越高。同样的道理，政府的施政实践和施政目标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而政府风险控制力的大小表现为施政实践与施政目标之间偏差的大小。两者的偏差越大，国家的风险控制力越小；偏差越小，则国家的风险控制力越大。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测算标志是国家的短期、中长期发展战略落实到何种程度。

危机和冲突是风险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的爆发。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低效或无效，公共资源的配置出现严重不公平，以及施政的实践与施政的预期目标之间的偏差超过了某一临界点，这一切都会导致危机和冲突的出现①。国家风险与冲突的解决能力的大小，与国家采取控制危机与解决冲突的具体方式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方式包括：武力、控制（或操纵）和对话（或说服）。武力的方式显示的是最弱的解决能力，控制略强，对话的方式表明国家解决危机与冲突的能力最强。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和冲突，表明国家面对危机与冲突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只好采取"最后的手段"。所以说，这时候国家的解决能力是最弱的。控制的方式表明国家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于是只好把有关的信息、过程和政府的意图都隐藏起来，来最终达到诱使对象追随政府的意愿。由于真相只能隐瞒一时，一旦面纱被解开之后，政府的能力将受到新的挑战。所以说，与武力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所显示的危机与冲突的解决能力相对强一点，但并不可靠。对话

① 国家的危机与冲突解决能力，应该既包括突发性事件的解决能力，也包括社会冲突的解决能力。笔者在这里虽然没有分别阐述，但文章的本意是包括两方面的能力的，而且后面的内容对这两方面都有实证的分析。

是指在双方没有任何压力之下而进行的相互说服和自由接受。用对话的形式而成功地解决危机与冲突,表明国家解决危机与冲突的能力最强。

国内动员能力① 是指政府集合与组织人员、物质来实现政府目标的能力②。人员是否能组织起来,物质是否能集合起来,是建立在人员对政府的信任和对自身集体身份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因此,国民的动员能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二是对自身集体身份的认同程度。两个方面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但对自身集体身份认同度高,这样的人也会响应政府的动员。这种情况在战争条件下非常突出。例如,当一个国家被外族侵略时,一个腐败的政府是得不到民众信任的。但为了自身的政权,政府号召民众抵御外族的侵略,民众积极响应。这时候,民众不是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了,而是作为本民族的一员的认同而作出的必然反应。当然,政府国民动员能力的大小主要还是以集合和组织的速度、集合人员和组织物质的规模来衡量的,它体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

从国际角度来看,国家政治能力包括海外利益的拓展能力、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和国际动员能力。海外利益由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等组成,但从政治角度来谈海外利益的拓展能力,应该包括国家对外政治透明度的提高、国家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高和国家良好形象对外传播能力的提升等。国家对外政治透明度和国际议程的设置,体现的是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实际上是国家在某一国际政治地位上的外部包装。俗话说:人要穿衣,佛要穿金。同样的道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必须要配上相应的外衣。因此,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能力是海外利益拓展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是指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用军事的手段来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即便使用军事手段,但也主要是政治意义多一些,军事意义则是间接的。例如,近些年来,索马里海盗猖獗,各大国(甚至包括瑞典等)都采取军事护航以打击海盗。虽然是军事护航,但它更多的是政治威慑,军事色彩比较淡。海外利益同样也包括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甚至海外文化利益,以及为维

① 阎学通教授把国内动员能力分为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和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前者用议会中执政党议员所占的比例,后者用执政党党员占成年人的比例来衡量。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 期。

② “动员”最初主要是指军事动员,即集合人力、物力用于战争或准备战争。后来用法日益广泛,用来指“为追求集体目标而形成人群、集团、社团和组织的过程”。参见 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inceton-Hall, 1973, p. 102。

护这些利益而相伴的海外安全利益等。从政治能力的角度看，这主要是指海外工作人员和侨民的安全保护能力、海外机构的保护能力以及战略航道的保护能力等。

关于国际动员能力，阎学通教授认为，它是指一国为了使别国接受本国的建议和要求而对别国运用非强制力所产生的影响力，它主要来自于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和所拥有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一国拥有较多的战略友好关系，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就容易争取到较多国家的支持；掌握较大国际规则制定权，则有较大机会促使他国接受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立场。[①] 不过，本研究认为国际动员能力应该还包括国际话语能力。所谓话语能力是指控制舆论的能力，包括决定舆论内容的能力、决定舆论走向的能力以及通过舆论内容影响他人的能力，是政治影响力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拥有越多的话语权，国际动员能力也越强。

二、中国国家政治能力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软实力总体上表现为"量小质不高"的特点。[②] 作为软实力一部分的中国政治能力受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而表现出两重性特点：优势与不足并存。一方面，虽然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缓慢，但中国政治对内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推行左倾路线，民主政治生活非常不健康，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了解不多，或者因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攻击中国政治，使中国对外的政治感召力弱小。从国内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能力国内动员力强大，而国际动员力弱小。这样的特点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国政治能力的特点，下面分别从政治能力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

1. 资源配置能力

从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来看，中国的资源配置力体现在建立了有效、有序的可调控市场经济。衡量中国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力的最重要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如果从 1978 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近 10%；如

① 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 期。
② 黄仁伟、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软力量建设》，《社会科学》2007 年第 8 期。

果从 1992 年推行市场经济后算起，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则超过了 10%。而在可调控的市场经济之下，中国经济总量也迅速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 1978 年的 1.8%提高到 2007 年的 6.0%；GDP 由 1978 年的 3 千多亿元迅速跃升至 2007 年的 24 万亿元，2008 年中国 GDP 将上升到 30 万亿元左右，成为排在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大国。到 2011 年，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47.3 万亿元。[①]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指日可待。这些情况表明，从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来看，中国的资源配置力是强大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下，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不断遭到置疑，而中国式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却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

但是，从公共资源的社会配置来看，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甚。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中国公共资源的分配往往是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按照有的学者的研究，中国城镇家庭最高 20%收入户与最低 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 1990 年的 4.2 倍、1993 年的 6.9 倍增加到 1998 年的 9.6 倍，而且由于中国在过渡期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况可能比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②] 而基尼系数各年都超过了 0.4，最高时有的学者认为达到了 0.59[③]。此外，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在拉大。据有的学者的研究，中国 0.4%的人口掌握了 70%的财富。[④] 虽然考虑到中国在人口、幅员、区位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最敏感阶段这一事实，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应该说仍处在可接受或可容忍的范围内，[⑤] 但是三大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爆发点，并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忧虑，认为这是中国式的"综合征"，有可能危及到世界的安全。[⑥]

2. 风险控制能力

从宏观战略来看，风险控制能力主要是指国家宏观战略的事实能力。改革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

②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4 页。

③ 参见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6 页。

④ 周瑞金：《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火车头》，载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关键抉择：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0 页。

⑤ 朱光磊著：《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41 页。

⑥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 Syndrome," *New Republic*, November 16, 2006.

开放初期，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1980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6 619亿元；1990年则上升为17 400亿元；200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则迅速上升到89 404亿元。[①] 从已经走过的“两步”来看，都是提前完成任务的。也就是说，从宏观战略来看，中国实际的结果与预期的目标有偏差，这种偏差是向积极的一面的偏向。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发展没有风险，中国政府的风险控制能力极强。但是，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式方式来实现的，经济的发展把社会风险转移到了环境之上，使社会风险转变为环境风险，因而成为“中国环境威胁论”的重要依据。[②]

从社会微观问题来看，中国社会的风险在聚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风险也在迅速上升。[③]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对全球170多个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的排行榜显示，中国自参加排名以后，指数逐年提升，位次也逐年前移，特别是几年来上升的幅度较大。2004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为0.745，在世界的位次由上年的第104位上升到第94位；2005年为0.755，比2004年提高了1.34%，高于全球的平均人文发展指数(0.741)，位次也由上一年的第94位上升到第85位；2006年比2005年又有所上升，达到了0.768，位居世界第81位。最近两年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排名不升反降，2010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为0.663，在169个国家中居89位；2011年，中国的该指数为0.687，但排名降到百名以后，排在第101位。也就是说，在经济逐渐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有所上升。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仍然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的行列。早几年就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步入经济大国的行列，

① 数字来源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相关各年的统计公报，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_15373.htm。

② 参见 Stephan Johnson, "U.S. Criticized China Exporting Air-Polluted Goods," *Financial Times*, April 12, 2006.

③ 除了众所周知的发展不平衡之外，中国的社会风险上升还表现在：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幅调整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相当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社会加速转型期但缺乏完善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社会加速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焦虑，等等。参见吴忠民著《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231页。

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仍然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人文的发展。[①] 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3. 危机和冲突的解决能力

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在有些方面仍在不断激化，这表现在：一方面，社会冲突的总量在迅速上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社会冲突都呈现上升态势；另一方面，制度内的社会冲突在社会冲突总量中的比例在下降，相应的制度外的社会冲突的比例在上升。[②] 但是，这些小范围内的冲突并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冲突，在有效控制的范围内，是可容性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不会成为更大危机的导火线，反而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是官民对话的空间扩大了。30 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普遍提高，同时也激发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因而官与民能够在更多的领域、更多的问题上对话。二是在中国政治日益开放的前提下，中国各级政府与民众的对话能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社会利益矛盾面前，政府的强制性减弱了，更多的是以官民协商、干群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政府或者说一部分领导干部还缺乏自信，对突发事件的信息进行捂、封、堵，结果难以获得外界的理解，从而有损政府的形象，也显示出政府危机解决能力不足的一面。

4. 动员能力

从国内动员能力来看，中国的动员能力表现为，在突发事件或危机面前，国民动员能力强；而在平时国民动员能力相对较弱。从 1998 年的特大洪灾到 2003 年的抗击 SARS 疫情，特别是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均显示中国的国民动员能力超强。政府各部门、军队、武警、媒体等社会各界以及自愿者全都被动员起来。2008 年 5 月 18 日中国国防部公布，截至 5 月 18 日 12 时，据不完全统计，军队和武警部队共出动 113 080 人，出动各型飞机 1 069 架次，开出军列 92 列，调运各类物资 7.8 万多吨。这可以说是中国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动员。从捐款来看，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截至 2008 年 11 月 25 日，全国共收到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合计 751.97 亿元。与此同时，社会各种自愿者团体也全面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这些情况表明，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国民动员能

①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Vol. 48, No. 2, 2006, pp. 17 - 35.

② 胡鞍钢：《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和谐也是硬道理》，载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0 页。

力是不容怀疑的。

然而在平时，虽然社会各阶层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推进改革建设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明显提升，[①]但国民动员能力相对弱小。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党内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这一因素至关重要。虽然近几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来推进反腐败、对腐败犯罪严惩不贷的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清廉指数有所上升，但仍然不高，2006 年 3.3，2007 年 3.5，2008 年 3.6，2009 年 3.6，2010 年 3.5，2011 年 3.6，2012 年 39，排在第 80 位[②]。这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可见，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削弱了国家的国民动员能力。

从国际动员能力来看，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同样有弱有强。一是中国的话语能力非常弱，但正在改善。弱的表现为，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挨骂的情形在不断增多，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综合症"、"中国输出通胀论"、"操纵货币论"等各种论调，或者此起彼伏，或者同时盛行，所有话锋直指中国，甚至中国承办奥运会都成为一些国家指责的对象。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非常弱。但是，随着中国自信心的提高，特别是经历了 2008 年的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以后，以及金融危机之下中国负责任的承诺，中国在某些领域内的国际话语权逐渐取得了主动，包括面对危机如何建立国际金融新体系和国际贸易新体系都提出了被众多国家所接受的新主张。

关于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阎学通教授用军事盟友的数量来测定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又以举行成建制、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作为军事盟友的标志。他认为，2007 年美国有 38 个军事盟友，中国有 6 个军事盟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朝鲜），中国军事盟友的数量约为美国的 15.7%。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国际动员能力是美国的 15.7%。[③] 笔者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姑且不论中国与哪些国家举行了这类军事演习，但说俄罗斯与中亚四国是中国的军事盟友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这里，笔者用民众对华认知——即各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国际形象，来衡量对华友好关系，进而来估量

---

① 国家统计局于 2008 年 11 月以了解社会各阶层对中共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的评价为重点，进行了"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调查"。调查显示，对中国发展方向、发展前景"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分别为 56.3%和 35.2%，合计为 91.5%，"信心不足"和"没有信心"的分别仅占 3.8%和 1.3%，合计只有 5.1%；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信任度进一步提升，满意度分别为 91.5%和 98.3%；对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依然保持较高信心，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也仍然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看好的占 80.9%；对 30 年改革开放表示满意的达 93.8%。资料来源：新华社北京 2009 年 1 月 23 日电。

② 2012 年的统计和计算方法采用百分制。

③ 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 期。

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

这里以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以下简称 BBC 国际台)连续三次关于"中国形象"的调查统计为依据,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2005 年 3 月,在全球 22 个国家中进行的"中国形象"调查显示,在各国民众心目中,中国的国家形象良好。被调查人群中,认为中国对世界影响积极和正面的国家和人数,超过了对美国和俄罗斯进行的同类调查。这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看待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在 22 个国家中,有 18 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总的来说,48%的民众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正面的,30%的人持负面看法。第二,是否希望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强大。49%的人的答案是肯定的,33%的人持否定态度。第三,是否希望中国在军力上进一步强大。对此态度最积极的国家居然是印度,56%的印度民众认为中国军力增长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2007 年 3 月,BBC 对 27 个国家的 2.84 万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对世界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占 45%。这与几乎同时由美国《时代》周刊进行的调查结果大致相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敬重的前五个国家之一。这五个国家得到的民意支持率分别是:加拿大及日本均为 54%、法国 50%、英国 45%、中国 42%。除中国以外的 26 个受调查国家中,16 个国家民众对中国持正面评价,9 个国家主要持负面印象,1 个国家没有形成呈相对多数的一致意见。平均而言,中国在这 26 个国家民众获得的正面评价率为 42%,负面评价率为 32%。然而,BBC 在 2009 年 2 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者的比例比上一次调查下降了 6 个百分点,降至 39%;持负面评价者的比例为 40%,上升了 7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的确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国际影响力也在上升,甚至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中国的充分参与,21 世纪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良好运行,无论是气候变暖问题、非洲问题、世界贸易问题,还是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西方都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需要中国利用其影响力与西方国家配合"[①]。但是,中国在国际民众眼中的国家形象却呈下降趋势,这同时表明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也在下降。正如组织这次调查的全球舆论调查公司总裁道格·米勒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需要学习如何在全球赢得人心"[②]。

关于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中国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还非常有限。长期

① Tony Blair, "We Can Help China Embrace the Futu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6, 2008, p. 21.

② 法新社伦敦 2009 年 2 月 6 日电。

以来，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因而对国际规则和国际政治议程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模糊的，甚至是无知的。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正式与国际社会产生积极的互动关系以来，中国开始从有限参与国际规则到积极参与，并试图对国际制度的建设施加影响。应该说，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数量上，中国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参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①] 但是，在塑造国际规则方面，中国在自己所处的地区有一定的能力，而在全球性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构建方面，中国的塑造能力非常有限；同样，在相应的国际规则内，除了在上海合作组织里中国的规则塑造能力和政治议程设置能力都比较高之外，其他无论是在全球性国际组织内还是在地区性国际组织，中国的国际规则塑造能力和政治议程设置能力都非常低。

5. 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能力

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到国外留学的人数剧增。从 1978 年到 2008 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是 93 万多人，回国工作人数为 23 万多人，也就是说，大约有 70 万人留在了海外。这构成了中国海外利益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二是到海外的中国人在增多。据外交部资料统计显示，2004 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是 2 850 万人次，2005 年达到 3 102 万人次，2006 年达到 3 400 万人次，2007 年更是高达 4 093 万人次。到 2012 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的人数达到 8 318 万人次。专家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公民每年出境人数将超过 1 亿人次。这些人的安全也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孔子学院在政府的推动下遍布全球。2004 年中国在海外建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目前，中国在全球已开办数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分布于五大洲。此外，中国还有遍布各国的驻外使领馆，以及众多的驻国际组织代表等外交人员及其家属，这些也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构成部分。撇开中国对外的经济活动不说，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海外的中国人数目庞大，这表明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能力今非昔比。

不过，在中国海外利益拓展能力上升之时，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却没有迅速跟上。这方面的能力虽然有所提升，但还是比较弱小的。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在保护海外中国人的安全方面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例如，2006 年 4 月，在所罗门群岛骚乱期间，中国撤出了 300 多名侨民；5 月，在东帝汶骚乱期间撤出了 200 多名侨民；7 月，在黎以冲突期间，撤出了 170 名中国公民；11 月，因汤加骚乱撤出了 193 名中国侨民；2008 年 11 月，因泰国动乱，中国派出飞机接回了滞

① 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下)》，《国际观察》2007 年第 3 期。

留在泰国的中国游客;12 月,中国海军赴亚丁湾为中国商船护航。2011 年 2 月至 3 月,中国政府从利比亚撤离中方人员共 35 860 人。这是中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中国快速有力的行动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给予了积极评价。不少海外侨胞也因此次撤离行动的顺利高效深受鼓舞,认为此举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重视和保护,让人深深体会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也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的提升。此外,为了保护外海利益,2000 年,外交部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2004 年,外交部成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2006 年 5 月,外交部在领事司设立了领事保护处,专门处理和协调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2007 年 8 月,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成立。这些行动和机构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人出国人数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也日益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 年中国发生的领事保护事件约为 2.5 万起,2005 年约为 2.9 万起,2006 年超过了 3.1 万起,2007 年也超过了 3 万起。2008 年以来,涉及海外中国人安全的事件更是接踵而至:2008 年 1 月,韩国利川一冷冻仓库发生爆炸,12 名中国公民遇难,1 名重伤;3 月,一香港旅游团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发生车祸,游客 4 死 1 伤;5 月,南非开普敦数家中国人经营的商店遭打砸洗劫,财产损失严重;8 月,中兴公司的 2 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边境遭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10 月,中石油 9 名中国员工在苏丹遭绑架,最终 4 人获救,5 人遇难;2009 年 1 月 30 日,一辆载有 15 名中国游客的大客车在美国高速公路遭遇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伤亡;2 月 14 日,中国"新星号"被俄军击沉,造成多名船员伤亡;2 月 18 日早上 7 时发生神秘枪击事件,中国货船在泰国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猛烈开枪袭击,一名中国籍船员中弹身亡……这些海外安全事件几乎囊括了中国各类出国人员,包括政府官员、士兵、中国企业驻外员工、劳务人员、非法偷渡者、出境旅游人员等;遇难的性质、方式及年龄层次也日渐多元化。近两年来,又呈现出政治性强、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特点。由此可见,与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①]相比,中

① 当前,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包括:一是地区冲突与恐怖活动构成的威胁,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针对中国人员与机构的袭击和绑架事件;二是由于经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伤害案件,包括当地犯罪分子对华人华商实施暴力袭击,当地执法当局恶意伤害中方经贸商业利益,以及由政治原因而导致的中国经贸利益受损害的事件;三是带有种族歧视与排华性质的民事伤害案件;四是针对中国人的非法行政案件,即外国一些执法机构在针对中国人的执法中偏离公开、公正原则,出现恶性伤害与侮辱事件;五是非法移民伤害事件,这往往与人口走私犯罪组织有关;六是中国留学生被骗和伤害事件,除留学被骗外,海外留学生遇害事件也时有发生,成为中国公民海外最易受伤害的群体之一;七是意外伤害事件,如交通意外、自然灾害等。

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显得极为弱小。

总之，中国的政治能力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即使是中国政治能力的优势之处，由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存在认知偏见，也认为中国政治能力的上升是国际社会的威胁。至于中国政治能力的劣势之处，则要么认为是另一种"中国威胁"，要么就是"中国崩溃"的依据。因此，提升中国政治能力同样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合法性资源拓展与政治能力建设

政治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基础，执政党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提升自身的政治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拥有不少合法性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非常强，至少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拥有这多的成员，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有哪些呢？

一是历史合法性资源。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西方打开以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从那以后，中国历代先进分子面对着这两重任务却束手无策，要么是能力问题，要么是体制约束问题，都无法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伟大使命。林则徐、魏源虽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当时封闭的封建体制下，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作用仅仅是向国人打开了一扇窗户而已，根本没有能力从这个窗户走出去。因而，他们只能是"放眼向洋看世界"，而无法走向世界。后来在主张"自强"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理论上虽然没有超出"师夷长技"的思想，但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受制于封建体制，洋务派根本无法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使命。甲午战争之后，诚如康梁所言，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复兴更为紧迫，但维新变法仅百日便告终。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资产阶级的建国方略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复兴，反而因缺乏必要的武装力量而导致中国最终陷入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不仅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而且也把民族复兴、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地靠近这"三位一体"目标。从鸦片战争以来 170 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基础。

二是革命合法性资源。在西方政治学中，革命不能为政治提供合法性。这实际上是一个谬论。按照西方政治学原理，如果我们回顾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那么西方没有几个政权具有合法性。因为当今西方政治大多数也是革命的产物，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都是通过革命推翻了封建贵族而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即便是美国，也是在推翻大英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后在13个殖民州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革命不能为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那么几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权都不具有合法性。可见，西方政治学原理是多么的荒谬。当然，并非所有的革命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顺应时代潮流、顺应人类进步的革命，必然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有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的专制统治，外部有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而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①] 正是西方列强不加掩饰的野蛮与残酷，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种违背人类发展趋势的殖民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这种革命难道不能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提供合法性吗？革命的确是要流血的，但不流血，无论是封建专制制度还是西方殖民制度都不会主动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人民。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那样，只有用被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的正是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

三是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和观点所构成的，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③] 意识形态为执政党和一种政治体制提供合法性，表现为意识形态被民众所认可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③ 黄新华：《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

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和真理性。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首先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落后的俄国建立起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对这种社会运动的前景尽管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社会主义运动究竟在什么时候取得胜利,怎样取得胜利……这些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从 1848 年欧洲革命到巴黎公社的胜利和迅速失败,以及到十月革命前夕,关于对社会主义运动前景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展示了俄国革命领导人的胆略与智慧,而且它还产生了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意识",它"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注)数年世界历史的模式"。[1] 社会主义实践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恰恰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落后国家和被殖民国家的革命及独立运动等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的原因还在于,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民众生存状况的恶化,自然也就使得民众以极其朴素的情感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认同和接受了那描绘一幅强调实质性平等的美丽图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时,沙皇的专制统治使民众更易于接受到有激进色彩的、追求实质性平等的、表达终极价值与关怀的、能够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的思想观念,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价值。[2]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因此在当时来看,世界各国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最终都表现为对苏联这个国家的热爱与向往。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也是"以俄为师"。尽管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非常弱小,没有掌握任何社会资源,但星星之火确实可以成为燎原之势。不仅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起来,而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召唤之下,全国各族人民都先后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支持者,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后也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因此,社会化主要意识形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最为丰富的合法性资源。

四是现代化成就的合法性资源。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短缺经济型"国家,经济文化十分落后。30 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

---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93 页。

② 周尚文、郝宇青等著:《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3－74 页。

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2011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47.3 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步，文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都大大提升。经济绩效无疑是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资源。

但是，任何合法性资源的获得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样任何资源为政治提供合法性都不会是长期持久的。另外，形式发生了变化之后，合法性资源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作为革命党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并不一定成为作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特别是革命合法性资源只能是作为革命党的合法性基础，而不会为执政党提供长期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执政党一直强调自己在革命时期所付出的代价，要民众给予支持，这只能说是利用革命悲情来取得民众的信任，是不可能持久的。执政党必须要在执政条件下不断拓展新的合法性资源，才能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由此可见，执政地位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另外，经济绩效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政治提供合法性，但不可能为政治提供持久性的合法性。因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不只是经济绩效一项指标。更何况经济发展有周期性的变化，所不同的是周期的长短而已。一旦经济发展周期进入相对衰退期，完全依赖于经济绩效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彻底崩溃。

四、提升中国政治能力的思考

政治能力建设，对内而言，是提高政治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对外而言，则是内部政治系统与外部政治系统"政治能量"交换能够正常进行的保证。内部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于政治制度化水平，制度化水平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内部政治系统是否能够跟外部政治系统进行正常的"政治能量"交换，也是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提升国家政治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进一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根据中国政治力优势与劣势并存的特点，提升中国政治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公正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以彰显公共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危机与冲突的解决能力的提升。社会公正是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证。反过来，社会不公正则会大大降低社会安全的程度。[①] 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和配置机制

① 吴忠民著：《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 页。

的扭曲，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所有的内讧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而且"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苗生长出来的"。[①]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全运行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在当今中国，社会公正的要义在于让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二，以科学发展取代盲目追求GDP的发展，提升风险控制能力。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当今中国的风险主要来自社会领域，特别是过去的改革发展过多地强调经济本身的发展，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把发展经济视为社会最高目标的经济至上主义发展观，必然陷入这样的逻辑之中：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绝对依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依赖于科技进步，科技可以无限进步，所以经济可以无限增长。[②] 其结果是，发展的本意完全被曲解，要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表现出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执行者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最大的社会风险源；要么是GDP增长所掩盖的人与人的风险被转化为人与自然的风险。化解这两种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把人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纳入到新的发展观之中。

第三，以经济、效率、效能为目标实行政府再造，提升国内动员能力。就当前中国而言，提升国内动员能力的瓶颈在于政府的形象问题，归根到底则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长期以来，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不佳，原因在于：一是各级政府包揽了原本由企业、社会、中介机构甚至个人所做的事，从而导致政府的运作成本过高。据统计，中国政府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10%上升到2005年的19.2%，大大超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6%的标准。而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高成本运作，不得不挤占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二是行政体制中官僚主义仍然十分严重。挤占资源和官僚主义的结果是腐败的滋生。挤占资源使得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上拥有更大的垄断权，而官僚主义使得政府依法行政的情况大打折扣。政府本来被赋予了依照合法标准而非行贿意愿来为个人和企业配置资源的责任。但是，当政府不能发挥这种法定功能的时候，贿赂就会像价格一样使政府提供的稀缺资源供求趋于平衡。[③] 而官僚主义有进一步使得国家对贿赂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结果腐败必然严重损害

① [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4页。
② 卢风："经济主义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编，《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③ [美] 苏珊·罗斯·艾克曼著：《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国家为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所作的种种努力。[①] 这样,政府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政能力就受到质疑。三是由行政能力被质疑进而引发民众对政府满意度即支持率的危机。在当今,评价政府行政绩效的标尺越来越依赖于群众的满意度。换言之,群众的满意度是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基础。因此,提升国家的国内动员能力,必须塑造一个依法行政、清廉透明的服务型政府。

第四,全力打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工具,提升国际动员能力。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就是说,不好的东西比好的东西更容易传播出去。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稍微有点瑕疵,很快就被无限放大而在国际社会大肆宣扬;相反,中国好的一面由于缺乏先进的传播工具和手段而被国际社会所忽略。有学者将中美两国的国际传播力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只相当于美国的14%[②]。由于中国的国际传播工具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大国,既没有像CNN、VOA、BBC和被英语高度垄断的网络等媒体,也缺乏支撑媒体巨无霸的技术工具,因此,中国面对国际舆论横加指责却无力回击。在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下,中国良好的形象被严重歪曲。这样,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动员能力就被严重削弱。由此可见,打造先进、强大的国家形象传播工具,是提升中国国际动员能力乃至增强中国整体软实力最迫切的手段。

最后,要充分利用安全与治理方面的全球公共品,提升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利用全球公共品来提升自身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即使是西方大国也不例外。因为只有这样,保护海外利益的任何举动都具有"正当性"的理由。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冷战后的地区性冲突甚至包括美国发动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争,都借用了安全方面的全球公共品——防止人道主义灾难、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不过,美国发动上述战争也有意绕开了治理方面的全球公共品——国际法、联合国等,也因为如此,美国发动上述战争的理由苍白无力。当然,中国充分利用安全和治理方面的全球公共品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过去,中国一直坚持不出兵海外的原则,即使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毁灭性的伤害,也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例如,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华人在红色高棉时期非正常死亡率高达80%以上,但当时中国仍然奉行"不干涉"的政策,以至于华人求助无门;在1997年的风暴之中,印度尼西亚华人华侨也同样遭到了

① [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著:《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② 张晓群:《中国传媒实力的战略取向》,载门洪华主编的《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摧残，但中国也是奉行“不干涉”原则而无法保护这些海外华人华侨的安全。而这些人的安全同样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之所在，保护这些人的安全是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最主要的一部分。通过最近几年多次在他国暴乱中的撤侨行动，中国也正在努力学习如何使用全球公共品。亚丁湾的护航行动可以说是中国利用安全与治理方面的全球公共品保护海外利益的最成功案例。从此之后，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利用全球公共品而进行的非战争性海外军事行动将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的对外行为方式。

第八章
发展陷阱与中国式跨越的尝试

所谓"陷阱",在经济学上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① 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就,是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然而,当告别贫困以后,中国又遭遇到了另一种忧虑,即所谓的"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这成为中国的"成长烦恼"。实际上,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遭遇的陷阱是多种多样的,仅从经济上而言,就有所谓的"贫困陷阱"、"转型陷阱",以及今天众多经济学家所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客观地说,中国通过改革告别了"贫困陷阱",通过渐进主义的理性转型告别了"转型陷阱",那么中国今天是否真正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存在,那么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是什么问题?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发展陷阱的阶段性类型

实际上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只是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遭遇到"贫困型陷阱"。因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初始条件非常落后,所以现代化的第一要务是要消除贫困。如果长期陷在贫困陷阱中,现代化就将成为空话。摆脱贫困以后,或者说跳出"贫困陷阱"以后,这些国家基本上会有一个高速增长期。从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的发展情况来看,基本上是在

---

① 蔡昉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6 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迎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但是，当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除新加坡外，韩国、泰国、菲律宾等都进入了一个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期，经济也开始衰退。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数次遭遇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拉美国家也是一样，也是从跳出贫困陷阱以后又陷入"转型陷阱"，随后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表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国家不只是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相应的发展陷阱，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1. 贫困型陷阱

所谓"贫困陷阱"，通常地讲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20 世纪 50 年代有三位经济学家揭示了"贫困陷阱"的产生根源：一是纳克斯(Nurkse)于 1953 年提出"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理论；二是纳尔逊(Nelson)于 1956 年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理论；三是缪尔达尔于 1957 年提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贫困陷阱"为什么能够相对地把人锁定在贫困中呢？按照上述理论的解释是：因为你穷，你就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从而引起人力资本的退化；因为你穷，你就缺少物质资本的投入，许多赚钱的机会因而与你无缘；因为你穷，就限制了你的活动范围和自由，因而使你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日益边缘化；因为你穷，就可能影响你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从而一蹶不振而荒度人生。这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性恶性循环之中，用纳克斯的话来说就是"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

回顾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各国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首先是要摆脱贫困。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前，沙皇俄国是资本主义"薄弱的环节"。虽然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使 2 000 多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从 1861 年到 1891 年的 30 年间，俄国的工业有了较明显的发展，生铁年产量从 32 万吨增加到 100 万吨，煤由 37 万吨上升到 623 万吨，石油由 0.2 万吨增至 431 万吨，棉花消费量从 4.2 万吨增至 15 万吨。但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工业并没有掩盖贫困落后的农村和农业。即便是城市工业，与西欧国家相比，沙皇俄国仍是落后的。这就是俄国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正是这种社会结构严重地阻碍着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十月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所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共(布)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化体

系,发展国内经济。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建立起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体系,但轻工业和农业仍显落后,苏联相当部分的轻工业产品和粮食都依赖于进口。没有农业作为基础,现代化是畸形的。即便是重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被德国法西斯全部摧毁。因此,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是第一要务。大约经过了 30 年的现代化建设,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民经济达到了典盛时期,甚至成为可以与美国展开全球霸权争夺的超级大国。也就是说,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基本上跳出了"贫困型陷阱"。

中国社会主义也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时就开始考虑如何摆脱当时的贫困状态。首先就是要努力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其次是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个体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再次是通过"大跃进"运动来建立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客观地说,虽然这些措施有过激的表现,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偏差,但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甚至包括后来阶级斗争推向极端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主观上仍然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只不过由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现存的模式,出现一些问题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又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纠正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并努力尽快跳出"贫困型陷阱"。如果社会主义长期陷入贫困,那么就很难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以,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是要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①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 通过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正式跳出了"贫困型陷阱"。

2. 转型陷阱

所谓"转型陷阱",按照孙立平教授的研究是指这样一种情形,"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们从一个起点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我们假定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再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现在情况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定型下来，形成混合型体制"。[①] 因而，所谓"转型陷阱"就是指改革或转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或转型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简而言之就是"过渡性的现象"日益固化，或"过渡性因素"日益定型化。

不过笔者认为，还有一种"转型陷阱"是指因没有找到合适的转型道路，最终导致转型陷入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社会无序。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俄罗斯和其他中东欧、中亚国家，以俄罗斯最为典型。俄罗斯原本是想通过彻底废除计划经济，迅速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走向西方式的现代化，也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方案。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经济的确是"休克"了，但并没有看到什么"疗法"。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疗法"最终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全面衰退，更严重的是衰退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为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云诡谲，政府首脑如走马灯一样地变换。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俄罗斯的现代化丧失了整整十年的机遇，这十年就是俄罗斯的"转型陷阱"。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虽然没有出现俄罗斯这样的衰退式"转型陷阱"，但中国的过渡进程显然出现了"利益格局锁定"的状态。这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日益畸型化：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局部体制变革的潜力，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等；另一方面，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始终没有真正转化为科学的发展方式。更为严重的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脆弱社会基础使得中国只有通过畸形的经济扩张，才能缓解社会矛盾的张力，满足维护现有格局的需求。二是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改

① 孙立平等《"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载《开放时代》2012 年第 3 期。

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被倒置，即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目的。但事实上，由于要保持稳定从而担心改革会影响稳定，结果因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也就是要维护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时也是担心触动既得利益格局会造成连锁反应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于是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种种“二代”的说法，如“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农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了再生产。四是由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年来，社会矛盾明显增加且日益尖锐。在这些社会矛盾中，有一些本来是属于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在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幻象”。这种“幻象”深深地影响了政府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称之为“大维稳”的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维稳工作，将维稳渗透到政府工作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其结果是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并进而导致社会经济的僵滞。[①]

不过，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这对缓解转型陷阱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当然，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大转型时期，“转型陷阱”并没有完全走出来，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效应使得“转型陷阱”并不十分突出。然而，在中国尚未彻底走出“转型陷阱”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效应使中国提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3. 中等收入陷阱

2006 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很容易出

① 参见孙立平等《“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载《开放时代》2012 年第 3 期。

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用具体的经济指标来说，普遍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3 000 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那么，新兴国家能否成功避免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尤其是日本和韩国最为成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按汇率折算的当年美元计算，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72 年接近 3 000 美元，到 1984 年突破 1 万美元；韩国 1987 年超过 3 000 美元，1995 年达到了 11 469 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大约 12 年和 8 年。若按国际上比较公认的麦迪逊数据库采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以 1990 年国际元为基准，日本 195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3 136 国际元，1971 年达到 10 040 国际元；韩国 1974 年 3 015 国际元，1993 年达到 10 391 国际元，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 14 年和 19 年。

相比之下，拉美各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就没有日本、韩国那样幸运了。例如，阿根廷 1964 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超过 1 000 美元，20 世纪 90 年代末上升到了 8 000 多美元，但 2002 年又下降到 2 000 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 2008 年的 8 236 美元。也就是说，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表现为经济的大幅波动，但始终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也一直没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而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称为"拉美陷阱"。又如，马来西亚 198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 812 美元，到 2008 年仅达到 8 209 美元。像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这表明经济发展陷入了僵滞。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4 000 美元，201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 4 3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 2008 年的划分，人均国民收入 975 美元或以下为低收入国家，976 至 11 905 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11 906 美元或以上为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以 3 855 美元为界，在此以下为中低收入国家，在此以上为中高收入国家。按此划分，中国已经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即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该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很难维系；"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劳动力成本将趋于上升；外需拉动作用将明

显减弱；收入差距将因利益集团的固化而进一步拉大；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中等收入陷阱"面前，是通过深化改革寻找合适的发展方式进行跨越，还是在既有的改革成果面前沾沾自喜而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呢？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①] 这样的任务就要求必须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的发展道路，力避或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是什么问题？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人们一般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并认为是一个纯经济问题。然而，"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但就其产生的原因而言，它并非是一个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政治发展的问题。因此，单纯从经济上来解释这一问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既展示学术界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观点，更从非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非经济原因。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导致的新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以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例，这些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发展模式没有及时调整。例如，阿根廷在工业化初期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进口替代战略完全靠举债来维持增长。相反，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采取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因而国内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当国际市场受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冲击时，国际经济下滑便在其国内经济中产生传导效应。二是技术创新遭遇难以克服的瓶颈。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②] 但是，在拉美进入中等收入以后，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而短时间内又无法应对高成本的研发投入，来适应技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 页。

② 马岩著：《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5 页。

术创新的新要求，从而陷入技术创新的瓶颈，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创新程度和创新能力都比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即便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 2009 年，墨西哥的信息和通信支出占 GDP 的比例是 5.2%，在拉美国家中比例最高，最低的是委内瑞拉，只有 3.2%。这个数字普遍比东亚国家低，同时间的东亚国家，马来西亚是 11.5%，印度尼西亚是 3.2%。而已经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是 6.9%，韩国是 7.9%，新加坡是 6.7%。这个数据表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创新程度不高。从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例来看，2006 年的数据显示，巴西是 1%，阿根廷是 0.5%，乌拉圭是 0.4%。东南亚国家的马来西亚是 0.6%，泰国是 0.2%。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是 3.4%，韩国是 3.2%，新加坡是 2.3%。这表明拉美和东南亚中等收入国家的研发能力和研发转化为生产的能力非常有限。[①] 三是发展中公平问题长期被忽视。在发展初期也就是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初，社会着力于经济发展，因而往往不太关注公平，但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 0.44 至 0.64 之间，但因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人们更关注如何通过自己的禀赋来提高收入水平，所以这种收入差距被不自觉地忽视了。然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仍然高居于 0.6 以上，财富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并且严重影响到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严重分化并引发长期的社会僵滞。与此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则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则通过大力推行"新社区运动"来缩小城乡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这些措施为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经济停滞无疑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表现，但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中等收入陷阱"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些国家更多地是表现在政治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的政治参与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刺激而增强，但政治参与的通道受阻，从而使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产生政治冷漠，并由于这种政治冷漠而产生经济上的懈怠情绪，从而也使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状态。政治信息流动是政治参与的前提，信息流动需要借助于信息流通渠道，信息流通渠道是信息流动的"河床"，也是公众政治表达的渠道。政治表

---

① 以上数据转引自马岩著《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7、68 页。

达的普遍性客观上有利于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政治权力的公平分配。但对"统治型"政治来说，现有权力结构的维系完全依赖于对权力的垄断，并通过权力垄断来实行信息垄断。"统治型"政治常常是通过权力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从而来达到永久垄断权力的目的和维持社会的超稳定状态。政治表达渠道的畅通将会激发各种激进的思想，催生各种异质的政治文化，新的政治力量也会对过去的"共同利益"产生认同性危机，并试图冲破原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来构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所以，对于"统治型"政治来说，政治控制和信息控制是同等重要的。然而，政治过度控制必然使信息流通不畅，信息流量减少，社会处于信息饥渴状态。这样，社会成员就会因闭塞而变得愚昧和保守，社会日益陷入停滞。① 信息越短缺，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超稳定的社会状态也并不是稳若泰山、静如真空；即使一点点信息，也会被社会吸纳，进而在社会上产生猜测和忧虑；而微小的社会变动也会引起社会原有结构的失衡，从而引致社会秩序的分解。② 在东南亚国家的威权体制下，"中等收入陷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在跳出"贫困陷阱"——即物质上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由于政治发展水平没有跟上，政治权益的分配仍然被锁定在物质匮乏时代，从而导致政治权益的贫困群体。换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靠个人能力来获得竞争优势的状态，但政治权益的分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排挤"现象。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大多有一段军人执政的历史，政治权益被军人垄断，同时它也成为当时社会分层的主要杠杆。民主化浪潮首先冲击的是这些国家的控制型经济发展模式，但政治权益仍然掌控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于是，在这些国家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在政治权力垄断下出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这些国家很快便跳出了"贫困陷阱"。然而，在这种政治结构中，要再进一步发展已经非常困难，或者说，"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相对自由"的发展模式处于超均衡状态。结果，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的民众虽然解决了温饱，但在政治权益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并没有因经济状态的改善而带来政治权益的增长。这样的超均衡状态也是一种"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尽管它表现为经济收入无法突破一个临界点，因而也就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从

① 胡键：《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② 刘建明著：《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1 页。

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看，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固然有经济本身的原因，但经济因素并非是唯一的原因，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更多的是体现在体制、机制上，特别是政治体制上。所以，仅仅从经济收入上来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是远远不够的。

三、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9 748 元，按年均汇率计算已经超过 4 3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 2008 年的划分，人均国民收入 975 美元或以下为低收入国家，976 至 11 905 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11 906 美元或以上为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以 3 855 美元为界，在此以下为中低收入国家，在此以上为中高收入国家。按此划分，中国已经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呢？是否陷入这个陷阱，至少有以下的判断标准：

其一，经济是否持续增长，而且尽管难以避免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波动，但总体趋势仍然是稳定性增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都表现为较大幅度的波动，例如 1950－1980 年的 30 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 GDP 年均增速分别为 6.8%、3.4%和 6.5%；而在 1981－2000 年的 20 年间，则分别降至 2.2%、1.7%和 2.7%。同样，1970－1980 年间的印尼、菲律宾，GDP 年均增速分别为 8%和 6.6%；但 1981－1990 年间，GDP 年均增速分别降至 5.5%和 1.6%。经济增长不稳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直接表现。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增长乏力。一般都认为经济发展方式无法顺利转变会导致增长乏力，但收入差距过大也会导致增长乏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收入差距过大会使低收入的民众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收入都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这样民众对发展产生了懈怠情绪，当这种情绪主导社会的时候，社会就会陷入僵滞。据相关研究，在拉丁美洲，最富有的 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 20%人口平均收入的 20 倍。从基尼系数来看，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 0.45 以上，其中阿根廷 0.53，智利 0.54，巴西和玻利维亚更是高达 0.61，这些数据都远远高于 OECD 国家 0.35 的平均水平。而在东南亚，以马来西亚为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其基尼系数在 0.45 左右，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 0.5 的水平。从这些国家的情况来看，收

入差距过大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其三，创新能力不足。一个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处于僵滞状态，原因有多方面，但创新不足则是最直接的原因。在跨越"贫困陷阱"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政策，是政策产生的增长效应，技术创新的因素非常少。甚至可以说，在跨越"转型陷阱"和"贫困陷阱"的过程中，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政策的产出，而很少是基于技术创新。然而，跨越"贫困陷阱"和"转型陷阱"之后，政策的产出效应不复存在，而技术创新却没有跟上。于是，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

其四，政治发展水平低下，主要表现为政治权益掌控在特殊利益群体的手中。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国家来看，政治发展水平都不高，而且政治权益分配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政治表达渠道不畅通，政治诉求难以通过正当渠道实现。这归根到底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固化所致。最初的创新型利益集团由于通过跨越"贫困陷阱"和"转型陷阱"之后而成为社会的主导利益集团，但随着自己掌控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而不愿再进行制度创新，从而蜕化为僵滞型利益集团。创新型利益集团的蜕化，其结果必然是改革停滞。

从上面四个主要标准可以来判断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增长来看，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也是中国跨越"贫困陷阱"和社会转型的重要物质性基础。但是，中国能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看未来 10 年能不能保持 7%－8%的年均增长速度。按照经济学家的研究，假若未来 10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8%，人民币汇率年升值 3%，美国 GDP 年均增长 3%，到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可望达到美国的 97.9%。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保持 10 年 7%－8%的增长，到 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将超过 11 900 美元，这样中国将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而我国已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如果把"中等收入陷阱"视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任何国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而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没有经历这个阶段呢？假若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动态性的阶段来看待，而且是一个收入相对的概念，那么可以认为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处在这个阶段。这就是蔡昉所说的，"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

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但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较少”。[①] 然而，蔡昉所说的“中等收入阶段”并非特指“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一种对国家收入状况的分类。从经济增长来看，中国尚不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

从收入差距来看，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世界银行甚至测算出中国在 2011 年度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55。因此，一些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收入差距在扩大。据《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披露，1985 年到 2009 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其中，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 1985 年的 2.9 倍扩大到 2009 年的 8.9 倍，并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国家发改委 2009 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也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 1988 年至 2007 年，收入最高 10%人群和收入最低 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 7.3 倍上升到 23 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当然，也有学者如张五常、刘吉等认为，基尼系数是在一元工业结构社会里面，一个小国衡量贫富的系数。中国不适合这个，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实际上可以说是多元结构，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的基尼系数扰乱社会思想，激化社会矛盾。他们还认为，“炒作”基尼系数的目的实际上是反对改革。不过笔者认为，说基尼系数是“炒作”，是反对改革，显然是不对的。科学的衡量标尺是不具有地区性、国别性、民族性的。中国基尼系数大，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不少问题，更加需要深化改革，使收入分配体制能够正常地调节已经出现的收入差距。由此可见，从收入差距来看，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较大风险。

从创新能力来看，关于中国的国家创新力有几个报告值得重视：一是 2009 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题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 30 个国家》的调查报告，全球创新力国家排名中国列第 27 位；二是 2011 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 2010”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为 57.9，在全球 40 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 21 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首部《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 - 2010)》黄皮书，黄皮书对 G20 集团的国家创新竞争力作了排名。

① 蔡昉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0 页。

排名指出，中国的国家创新竞争力在G20集团中排第10位。与10多年前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相比，中国的排名上升了2位。但自从2007年排名第10位以来，中国一直排在第10位。上述几份研究报告虽来自不同领域，也有国内国外机构，但对中国国家创新力的评价结果大致一样，都表明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弱，尤其是高新产业，很多核心关键技术并未掌握。国家创新力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创新力来看，中国同样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从政治发展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诚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政治改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3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实际上一直就与经济改革在同步推进，只是由于政治改革牵涉到不少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而相对谨慎，因而给人的感觉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也正因为比经济改革更为谨慎，所以政治改革就留下了诸多问题，迄今为止仍然没能解决。最为明显的问题在于：一是制度化民意表达通道不够畅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相当一批人大代表的非专业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选民缺乏对代表的有效监督、制约等，这些均造成民意通过人大代表来表达的路径并不是很畅通。而党的组织作为最主要的民意表达渠道，由于承载了社会大多数的民意表达，无疑会产生民意表达的拥挤和阻塞，有时只能满足一部分人有限的利益要求，人民群众的许多民意无法有效地得到疏通。[①] 二是政治权益的分配极不平衡。虽然中国解决了经济上的贫困群体，这是中国改革获得的最大成效，也是经济改革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但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治分层机制仍然保留着，原有的政治权益的贫困群体也仍然继续保留着，甚至在新的条件下又产生了新的政治权益贫困群体。这表明中国政治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三是由于政治权益分配不均衡，使得一些社会成员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当正常的渠道受阻以后，非正常的方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近年来，一些人借用网络手段进行网络政治参与之后，对现实的政治权益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解构作用。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同样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风险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避开这个陷阱。如果中国能够在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创新，

① 郭海军：《当前我国民意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是可以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

四、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十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十年。如果不能成功跨越，那么中国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果能够成功跨越，那么中国将真正迈入高收入国家。然而，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人口问题、外贸问题、消费问题、产业问题、就业问题、分配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市场问题和国际投资问题，这被称为未来十年中国的十大挑战。[①]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深化改革，特别是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从战略层面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世界性的经济结构转型。当今，世界各国正在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欧盟、日等发达国家正在推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新兴产业，发起了一场以新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而引领世界经济结构转型的潮流。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长期以来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通过积极吸引外资，大力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民收入一直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则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型。而政府往往从眼前的政绩工程来考虑，在投资中常常具有短视性。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政府和企业在社会储蓄增长中的贡献率最大，这种情形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从而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②] 这两方面都不利于民众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对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整。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严重困境是，三次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见表1)。而从国际比较来看，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低收入国家中占28%，这表明工业化程度极低；中低收入国家占43%中高收入国家占31%，而第三产业的比重这两类国家分别是45%和63%；高收入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占26%，第三产业占72%(见表2)。这表明中国尽管已

① 参见马岩著《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15页。

② 林岗、王一鸣等著：《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从产业结构来看仍然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因此，中国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严重偏低。

表 1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 单位：%

年 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	27.1	41.3	31.6
1995	19.9	47.2	32.9
2000	15.1	45.9	39.0
2005	12.2	47.7	40.1
2009	10.6	46.8	42.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9 年中国统计摘要》。

表 2 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2006 年) 单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低收入国家	20	28	51
中低收入国家	12	43	45
中高收入国家	6	31	63
高收入国家	2	26	72
中国(2009 年)	10.3	46.3	43.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国数据来自于《2010 年中国统计摘要》。

因此，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一是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尽快改变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二是要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三是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拓展内部市场空间，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市场需求支撑。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都超过 70%，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 50%，城市化严重滞后。加快城镇化步伐就是为工业化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创造新的需求。

第二，重视人才培养。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人才素质的提升，因为一切技术创新依赖的是人才。当今世界各国都把人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而且国家之间的竞争从国际战略来看，仍然还在加紧地缘政治的争夺。随着人类掌握航

天技术以后，国家之间的竞争又进入"天缘政治"的竞争。然而，在经济发展、国家整体战略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缘政治"的竞争，即人才的竞争。人才的投入实际上就是对研发的投入。在这方面，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差距还很大。据全球研究与发展基金的研究，2009 年，美国用于研发的支出是 3 836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7%；中国用于研发的支出只有 1 237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到 2011 年，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已经上升到 4 053 亿美元，而中国只有 1 537 亿美元。虽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变，但总量的差距却越来越大。[①]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竞争力研究中心的数据，2009 年中国科技投入占 GDP 的比重是 1.52%，2010 年这一数据是 1.56%。相比之下，美国在同时期的比重分别是 2.89%和 2.78%。

重视人才培养，就必须重视教育。一是要把高校和科研机构建设成承担科技创新的主阵地，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教化的平台。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由于行政化色彩很浓，高校的领导往往是按照行政系统的一套思维来办高校，因而在课程设置、学生培养方面都是以行政化标准甚至完全是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的，科学的标准往往放在并不重要的地位。因此，包括发表的科研论文都折合成分数，也就是折合成领导的办学 GDP；管理也是"一刀切"，完全不尊重办学规律和科研规律，等等。这样的高校很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对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改革，就是要赋予高校、科研机构以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使之尽可能地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来进行教学和科研。二是改革研究生教育，使研究生真正成为未来之事的创造者和发明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研究生扩招以来，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以至于研究生毕业竟然连起码的学术研究都难以胜任，连起码的学术规范都不知道。因而，研究生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未来之事的创造者和发明者。三是把高校的重点聚焦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不能盲目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数量，而是要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质量。近十多年来，大学的扩招导致了诸多弊病，尤其是一些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原因就是大学生素质差，没有真正达到大学生的素质。高校、研究机构是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只有把好高校和科研机构这两道关，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第三，坚持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公平公正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价值保证。恩格斯在《共产主义

---

① 数据来源："2011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Sponsored by Battelle, December, 2010, p. 3. http: //www.battelle.org/docs/r-d-funding-forecast/2011_r_d_funding_forecast.pdf? sfvrsn=0.

原理》一文中就指出，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① 邓小平也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受益。”②在第三章中已经述及，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确实是普遍受益的改革，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很快跨过了“贫困陷阱”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在市场中已经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种社会结构是无法确保社会政策公平公正的。即便是在改革之初，由于在改革前，中国的社会分层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上；改革启动之后，政治权力迅速转化为市场的资本要素，从而使这批人在改革之初获得了最大的竞争优势。当然，由于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是社会普遍性收益的“增量改革”，这种不公平性并没有引起民众的注意。不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收入分配等各种制度上的缺陷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就会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这是因为，其一，公平公正是保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没有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就不能确保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其二，只有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才能激发社会成员的经济创造力和创新力。市场竞争所依赖的是人的资源禀赋和能力禀赋，个人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但能够顺利获得社会资源，将可以弥补个人能力的短板问题。然而，个人能力强的人往往会因为社会的不公正制度设置而制约其能力的发挥，从而导致经济与社会的不健康发展。其三，公平公正可以提高社会的流动性，从而避免社会阶层的固化。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引入新鲜的要素，而社会流动性则是经济系统新鲜要素的保证。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前提是社会的公正。社会缺乏公正，就会丧失社会流动性，进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同时强调：“必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③这段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 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 - 15 页。

充分表明了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意义。

第四，加快政治改革步伐，防止体制格局的固化。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政治改革，这是邓小平早就做出的战略安排。1980年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等。但是，为什么社会普遍都感到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政治改革根本就没有开始。前者显然是一个事实，后者则是没有看到中国政治发展的情况，因而不符合客观事实。中国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政治改革毕竟是牵一毫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必须更为谨慎，因而显得要滞后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体制是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要突破政治体制、机制上的障碍，首先必须要解放思想，特别是从理论上厘清现实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关系，也要厘清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机制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机制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更需要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中的渐进"方式。

正是由于政治改革推进是"渐进中的渐进"方式，或者说经济改革相对于政治改革略显快速、激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节奏不一样，因而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至少可以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存量不动，增量先行"。"存量不动"实际上就是承认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人一般是政治上握有一定权力的人，他们从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成为一定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当经济改革启动以后，正如前文所说，由于他们能够顺利地将政治权力转化为市场的资本要素，从而在市场经济中占优势。在谨慎的政治改革中，这些人又获得了新的既得利益。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一特殊利益群体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抵制改革，使政治改革的成本大幅度提高、政治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给人的感觉是严重滞后甚至没有正式启动。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体制格局就会固化，其结果就会使中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因此，深化政治改革，防止体制格局固化，是避免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举措。过去30多年的改革在防止体制格局固化上做出了重要努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在新的改革中开始了新的探索，这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明确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徇私枉法。”二是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把制度关在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前提是将权力授予合适的人。因此，要坚持公道正派的标准，使有能力、作风好、讲真话、做实事、讲原则的人成为人民授予权力的对象，而尽可能让那些阿谀奉承、弄虚作假的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四是保证政治权益的公平公正分配，这种政治权益分配机制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从而避免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产生政治权益的贫困群体。

第九章
文化强国：中国在 21 世纪的一项战略任务

建设一个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大国，是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任务之一。21 世纪，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竞争日渐成为国际间的核心。因此，增强中国文化整体实力就成为中国在 21 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包括文化的发展。中国成功地找到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体现了中国是一个善于反思、善于总结的大国。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则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有尊严、负责任的大国。但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曾经是东方朝贡体系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并非完全是中国经济实力成就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儒家文化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然而，中国文化在近代西方船坚炮利的威震下而迅速成为弱势文化。从此，中国文化大国地位不复存在。当今，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理应要实现文化的复兴，因为中国还要在国际社会做一个有品位的大国。

一、中国文化实力的要素和资源构成及增强文化竞争力的必要性

根据约瑟夫·奈的看法，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的文化，并认为无论是阳春白雪的雅文化还是下里巴人的俗

文化，都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1] 但是，美国在全球推行其文化——无论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总是采用强制的手段，从而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因而它反衬出美国软实力的效力问题。[2] 假若像美国那样来推行中国的文化以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显然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优势。因为相比之下，无论是中国的雅文化还是俗文化都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3] 从这一角度看，一般意义上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来源。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源构成要素呢？笔者认为，凡是能够能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柔性一面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源要素。而作为资源要素的东西同时应该对文化软实力具有源源不断的供给能力。从这两个条件看，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人文精神，才能既可以彰显中国软实力的柔性一面，同时又在资源上具有源源不断的供给能力。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品格”的外在表现，“中国品格”则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核心要素就是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笔者承认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源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但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应该是那些能够对他国民众产生吸引力的“中国元素”。

一是“重天道”、“法自然”的人本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核心地位的同时，又尊重人生存环境的人本主义精神。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典籍里就有“人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尚书》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4] 先秦的思想家荀子则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5] 不过，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强调“人最贵”且“人有其治”，但并不是“随心而治”的，而是使万物有一个秩序，同时又“莫从己出”[6]、“私志不得人公道”[7]，也就是不从自己的主观出发去改变事物，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不能转变成天地万物的本然。简而言之，就是“循理而举事”并“推自然之势”，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当今中国所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坚持

---

① 参见[美] 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46－56 页。

② [加拿大] 马修·弗雷泽著：《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

③ 文化进出口贸易是衡量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各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报告，中国每年的文化产品对外贸易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这就表明，中国的文化国际竞争力非常弱小。

④ 《尚书·泰誓上》。

⑤ 《荀子·王制》。

⑥ 《淮南子·主术训》。

⑦ 《淮南子·修务训》。

人本主义原则。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社会所坚持的人本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基本内核"及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之后，通过对人与动物的比较，通过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确定，不仅揭示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事实[①]，而且提出了解决人和自然的对立的正确途径，从而形成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是，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究竟如何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在这一方面结合的具体表现，就是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正是这一结合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文精神，不仅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并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人本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人们都知道，西方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人本主义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吸取了营养，但这并不是它的唯一来源。当传教士把中国文化带到欧洲之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就自然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养料，最终发展成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甚而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经济至上主义导致的拜物主义膨胀，社会发展陷入了新的困境，西方的思想家们倡导新人文主义以防止拜物教的无限扩张，也极力主张到东方中国的古老文明中去寻找，并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获得其精神来源。[②]

二是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三教组成。儒家的重要理念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强调自身品德的提升是根本。用《尚书》中的话来说，就是"疾敬德"。按照儒家的看法，提升自身的道德就是要修身，通过"克己"来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而这种情形与道教所倡导的通过内心的修养来实现道德的提升，有异曲同工之处。佛教虽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③]，但佛教所提倡的内省恰恰跟儒家思想中"疾敬德"的思想相

---

① ［德］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② 楼宇烈著：《中国的品格》，南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页。对于这种看法，实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朱谦之先生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朱谦之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不久，梁漱溟先生在1949年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参见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③ 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佛学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的佛学"，另一种是"在中国的佛学"。"在中国的佛学"是自印度输入的，而"中国的佛学"是这个本土理知的产物，为"在中国的佛学"的后期发展。参见［美］成中英著《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契合，所以它很快且很好地融入到中国本土的文化中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来源之一。

三是“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中”的意思是指执行刑罚要准确合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刑书）所制定的标准。这可以上溯到西周。《尚书》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等。[①] 这里的“刑之中”、“在中”、“中正”都表示大致相同的意思。后来，孔子把“中”的思想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并提出了“中庸”之说，并把“中庸”视为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伦理准则。“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②] 而这种美德就是中庸之道中的三条准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和至诚尽性。所谓“忠恕宽容”，就是《礼记》中所说的“以人治人”。[③]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由此可见，“中”所体现的就是包容性。

和者，谐也。和就是事物或系统中不同因素、不同要素、不同倾向之间的对立统一，它包含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和”更强调“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关于“和”与“同”的关系，据《国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④] 意思就是说，不同的因素处于和谐的状态，事物就能繁荣发展；如果同质的因素简单相加，则事物就陷于停顿或死亡。由此可见，和是多样性的统一。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和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多元并存、相互包容。这种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之精粹，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且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在当今西方各国大多已经深深感到，西方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和孤独，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个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孤立无援，在复杂面前束手无策。[⑤] 所以，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借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反思自己的文

---

① 《尚书·吕刑》。
② 《论语·雍也》。
③ 《礼记·中庸》。
④ 《国语·郑语》。
⑤ [法] 埃德加·莫兰：《跨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载乐黛云、钱林森编《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3 页。

化，以寻找新的未来。[①] 同时，更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于互相尊重。”[②] 而实际上，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也日益频繁，而文化的融合正是以文化的多元性为前提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从文化的层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和谐理念。

四是“克己复礼”的礼仪主义。礼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居于首要和核心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在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之间进行的争霸战争导致周代的礼乐崩颓，所以，孔子一心要恢复礼乐制度。“克己复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就是说要克制人的欲望来遵守礼乐制度，或者说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③] 不过，礼在老聃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末位，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④] 礼，仅仅处于“乱”的前面，是乱的开始。同时，道家用自然的本性批判了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教的规范，以得之于天道。[⑤] 但是，道家却从与儒家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秩序的重要性，即“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⑥] 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物由道而生，由德而育，由已有形之物而受形，由环境之情势而铸成。道与德乃一物之发生与发展之基本根据。”[⑦] 由此可见，道家所强调的是天然本性，也就是事务发展的内在规律。

无论是儒家所强调的礼，还是道家所强调的天然本性，目的都在于强调秩序。所不同的是，儒家的礼是社会规则所规范的秩序，而道家的本性则是事物的内在规律。二者的统一形成了中国人文精神中的礼，即在尊重人的本性的基础上遵循社会认同的规则。这也是中国“礼仪之邦”的实质所在，是“中国品格”的最高体现。“礼仪之邦”还有一个体现就是，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责任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领域的“中国元素”在不断增多，

① 乐黛云：《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第12页。
② 转引自乐黛云：《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第12页。
③《论语·颜渊》。
④《道德经·三十八章》。
⑤ 楼宇烈著：《中国的品格》，南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⑥《道德经·五十一章》。
⑦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并不断被越来越多的各国民众所接纳和认同。虽然“中国元素”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经济实力在发挥作用，但在经济实力的背后却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文化因素。正是传统的人文精神，使“中国元素”在当代产生了世界性的吸引力。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增强文化竞争力是关键。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明确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① 这就充分显示了增强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感。同时我们还看到，这绝非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文化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考量。而这一战略构想不仅是基于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30 多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改革和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的现实；而且也基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区域，国际竞争的内容和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实际。这样的现实对增强文化竞争力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第一，增强文化竞争力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需要。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即通过改革，社会各种要素、各种资源在市场与政府两种配置手段下得以充分动员起来，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幅，从而使中国经济规模大幅增长，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过去 30 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和自主创新的能力问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遭遇到新的瓶颈，走出这一瓶颈就需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而突破口并不在经济本身之上，而是在文化之上。只有增强文化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才能根本解决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文化——特别是文化竞争力将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文化价值竞争力表现文化价值观的竞争，也就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问题。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国民素质提升的需要。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以来，社会结构状况及国民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的主体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人，促使国民心理素质中的主体意识与自主意识空前增强，国民素质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化，也使社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 页。

会出现了一些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诚信缺失、责任感缺乏，人与人心理距离拉大、人际关系淡漠等。虽说这并非中国国民素质整体性出了问题，也不能说是中国社会的道德严重滑坡，但至少表明国民素质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恰恰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主要是抓物质文明建设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不能用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来掩盖国民道德素质有待提高的事实。众所周知，社会的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的现代化，甚至可以说，中国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并非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本身，而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只有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才是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含义。事实上，国民素质水平不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

第三，文化竞争力体现的一个国家的复兴程度和大国的成长力。只有文化的复兴才使得国家的崛起具有可持续性。这是从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西方历史大国兴衰更替原因众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一样的，它们都集中全力发展硬实力，然后全面进行武力扩张，最后都没有避免崩溃的结局。虽然它们也注意文化的重要性，但西方历史大国要么信奉血腥的殖民主义文化，要么倡导反人类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文化，这就注定这些国家缺乏持续性的成长力。

二、文化发展在于破解当下中国从“失衡”走向“再平衡”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 30 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失衡”，这种失衡不仅是经济结构本身的失衡，而且是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失衡。这些失衡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的不平衡。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告别了物质短缺时代，社会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需要已经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时，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仍

然无法得到满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 30 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文化生产和文化发展。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家园，是社会化发展的血脉，更是国家成长的智力之源。由于忽视文化生产和文化发展，因此出现了中国国民生产值的质量问题和自主创新的能力问题。国民生产值的质量不高，表现在三次产业贡献率上，第二产业对国民生产值的贡献率偏高，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偏低。这里我们选择 2000 年和 2008 年两个年度的数据来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见表 1）。数据显示，在国民生产值的质量上，中国不如同样属于新兴国家（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四个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值中的贡献率都高于中国。

表 1　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国　家 和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0	2008	2000	2008	2000	2008
中　国	3.9	6.3	51.9	49.7	44.2	44.0
俄罗斯	8.0	2.3 *	46.0	28.5 *	46.0	69.2 *
印　度	−2.6	6.7	37.7	17.8	64.9	55.2
巴　西	1.9	6.9	16.9	21.4	81.5	71.8
南　非	3.5	0.8	36.9	48.1	59.6	51.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
带 * 的是指 2007 年的数据。

表 2　GDP 单位能源消耗(2005 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 美元/千克石油当量)①

年份 国家和地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　国	3.3	3.4	3.3	3.1	3.2	3.3	3.5	3.6
南　非	3.2	3.4	3.1	3.0	3.2	3.2	3.4	3.5
巴　西	7.3	7.3	7.3	7.3	7.3	7.4	7.4	7.4
印　度	4.1	4.1	4.3	4.4	4.7	4.9	5.1	5.1
俄罗斯	2.1	2.2	2.3	2.9	3.0	2.7	3.0	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统计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① GDP 单位能源消耗是指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按 PPP 计算的 GDP 是指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国内生产总值换算为 2005 年不变价国际元。国际元对 GDP 的购买力相当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

自主创新不足表现在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方式，因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源消耗量偏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耗强度有所降低，从 1978 年的 15.68 万吨标准煤/亿元下降到 2008 年的 0.95 万吨标准煤/亿元，2010 年进一步下降到 0.82 万吨标准煤/亿元。[①] 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这些数据仍然是偏高的(见表 2)。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生产值单位能耗远远高于巴西，略高于印度，与南非相近，只比俄罗斯略低。也就是说，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比发达国家低近 10 个百分点，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②]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增大，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

只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才能根本解决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和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文化软实力将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赖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未来的中国不应是"经济巨人，文化侏儒"。

第二，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综合国力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这种缺陷突出表现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上，当然也包括硬实力内部诸要素和软实力内部诸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人均经济占有量仍然比较小，还没有达到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仍然不高，高端贸易产品仍然非常少，中国还不是贸易强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对外贸易品中，"Made in China"的多，"Made by China"的少，而"Created by China"(中国创造)的就更少。这同时也表明，中国经济竞争力非常弱小。"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显示了中国经济竞争力不强的一面。自 2001 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的位次时有波动。2001 年排在第 39 位，2002 年上升到第 33 位，2003 年到 2006 年则大幅度下降，分别排在第 46、46、48 和 54 位，2007 年又回升到第 34 位，以后隔年都有较大的上升幅度。2008 年排在第 30 位，2009 年第 29 位，2010 年第 27 位，2011 年进一步上升到第 26 位。[③] 虽然中国的排名已经数年领跑金砖国家，但这

① 以上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各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7 年 12 月 26 日。
③ 以上数据来自于相关各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http://www.weforum.org/issues/global-competitiveness。

种排名位次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仍然十分不相符。过去 3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仍然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其结果是高消耗、高污染。因此，近些年来的环境问题、严重的污染问题和长时间雾霾的笼罩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我国长期以来推行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科技实力、教育实力等不足以支撑新的发展方式。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在于其经济总量等硬实力的迅速提升，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硬实力基础上其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等构成的软实力的提升。中国软实力表现出"量小质低"的特点。长期以来，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逆差。以最近四年的数据来看，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产业发展报告，图书的对外贸易情况是：2008 年进口 8 155.24 万美元，出口 3 130.59 万美元，进出口比是 2.6 ∶ 1；2009 年进口 8 316.65 万美元，出口 2 692.03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3.1 ∶ 1；2010 年进口 9 402.01 万美元，出口 707.23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13.3 ∶ 1；2011 年进口 11 666.91 万美元，出口 3 276.61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3.56 ∶ 1。数据表明，中国图书对外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期刊的对外贸易情况是：2008 年进口 13 290.74 万美元，出口 218.13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60.9 ∶ 1；2009 年进口 13 661.47 万美元，出口 351.13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38.9 ∶ 1；2010 年进口 12 828.96 万美元，出口 423.97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32.6 ∶ 1；2011 年，进口 13 906.17 万美元，出口 573.44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24.3 ∶ 1，。近四年期刊对外贸易逆差虽然呈下降趋势，但逆差仍然是巨大的。报纸的对外贸易情况：2008 年进口 2 615.42 万美元，出口 138.53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为 18 ∶ 1；2009 年进口 2 527.15 万美元，出口 124.56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为 20.3 ∶ 1；2010 年进口 2 777.61 万美元，出口 54.91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50.1 ∶ 1；2011 年进口 2 800.18 万美元，出口 55.46 万美元，进出口比例是 50.5 ∶ 1。近四年来报纸的贸易逆差呈跳跃式上升趋势。①

第三，物质生活质量与精神素质之间的不平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质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能直接带来精神素质的提升。相反，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

① 以上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相关各年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整理而得。

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却与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国民的精神素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容易，精神境界的提升需要通过优秀文化长期的潜移默化。

第四，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来，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兴起了一个新高潮，各级政府更是从财政、税收等方面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对文化内容创意生产经营更是实行最大可能的税收优惠。因此，各类文化产品琳琅满目，文化市场也骤然活跃起来。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文化生产全面扩张的情形下，一方面时代需要的文化产品供不应求，而在文化大发展口号下文化生产追求数字GDP的情况也日益严重，没有市场的文化产品乃至于各种文化垃圾也堆积如山，装点出一个"虚假繁荣"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社会的文化消费严重不足。据相关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恩格尔系数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总量应该是10 900亿元。然而，直到2010年，中国文化消费总量才在1万亿元左右。根据国际的经验，按中国当前人均GDP为4 000美元测算，文化消费总量应当在5万亿元左右。但据预测，到"十二五"末，中国的文化消费总额最多才达到1.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的文化消费总量严重偏低，居民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不足1/4。文化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可能跟文化消费心理不成熟、文化消费观不正确以及观念、素质差异等有关，这些因素又导致人们对文化消费与自身素质的关系认识不够，对财富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他们更倾向于物质性的生活必需品消费，而没有精神性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从文化生产者来看，可能是无法提供适合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甚至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生产出一些低俗的文化垃圾，让人们对文化产品产生恐惧感。另外，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特殊文化产品（学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但他们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很少有别的文化消费。因此，中国文化市场的空间无穷大，可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欲望却非常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客观上要求精神文化方面有更多的产品供应，但在物质生活产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产品供应却不足。文化生活产品无法满足社会消费的需求，从而导致精神素质与物质水平之间的脱节。精神境界提升的前提是精神文化消费的不断增多。

第五，文化投入与文化产出之间的不平衡。文化强国战略激活了中国的文

化产业，文化也确实大踏步向前发展。但是，一个不用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这些错误倾向表现为：

一是在文化生产上盲目增加投入。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级财政收入颇丰，对文化发展的确重视，但一些政府官员缺乏相应的知识，以为文化发展就是给予经费支持，开口闭口就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项目"。可以说是一副"暴发户"的形象，但缺乏文化项目评判的基本知识，认为支持文化项目就是支持文化发展。结果，各种重复性的、低水平的、毫无新意的文化项目都在政府的支持下上马。

二是文化经营者用简单的数量来骗取政府的财政支持，以为文化发展就是多出版几本书、多拍几部电影、多拍几部电视剧、多组织几场文艺演出等，并没有从文化消费市场的角度来考虑文化生产环节。结果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严重脱节。

三是学术研究也在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出现了数量上的大跃进。学术研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学术成果则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产品。早些年，人们一直诟病中国的研究经费不足，制约了科研发展。近些年来，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在逐年加大。据报道，2000 年到 2010 年，国家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从 46.7 亿元增长至 324.0 亿元，增幅为 594%。中国科研经费增长的力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但中国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却并不如科研经费数量那样引起世界注意。反倒是全世界学术界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缺乏创新力？中国为什么缺乏学术大师？当前，一名学者一年中承担数个项目的情况是普遍现象，课题越多意味着隐性收入越大，但研究的成果要么是自己重复自己的东西，要么就是一项成果用于多个项目的结项，即所谓的"一鸡多吃"现象。这显然不利于学术创新。

第六，古为今用与食古不化、洋为中用与食洋不化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问题上出现了"古、今、洋"之间的不平衡。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文化现象，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文化夜郎主义），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就是恢复儒家文化传统，走儒家社会主义道路。另一种则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文化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全面接受"普世价值"，在"普世价值"的引领下走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前者是食古不化，后者则是食洋不化。这两者都缺乏对"今日中国"的理解，其结果不是把中国引向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使中国陷入改旗易帜的邪路。

三、中国文化整体实力严重不足

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走出去"战略在不断推进，文化传播平台日益多样化，文化建设的制度和政策日益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文化建设整体上迈上了新台阶，文化整体实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文化建设还刚刚起步，文化整体实力相对落后：不仅落后于国内经济建设，更落后于美国、法国、英国，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落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中国文化整体实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技、教育、研发等文化硬实力非常弱小。在科技、教育、研发、文化产业等方面，中国依然非常弱小，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投入。尤其是与美国相比，中国还相差甚远。据全球研究与发展基金的研究，2009年，美国用于研发的支出是3 83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中国用于研发的支出只有1 23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到2011年，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已经上升到4 053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 537亿美元。虽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变，但总量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竞争力课题组的数据，2009年中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52%，2010年这一数据是1.56%。相比之下，美国在同时间的比重分别是2.89%和2.78%。同样，美国的教育竞争力依然雄厚，美国不仅拥有全世界领先的大学，而且在过去的十年里，全世界62%的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美国获得研究生学历的人。美国凭借先进的教育体系吸引着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前来留学，而大量的科技人才流向美国也有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同样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竞争力课题组的数据，2010年，中国每百万人从事研发的人数是1 599.637 81人，美国是6 074.281 49人；高等教育指数中国是881.230 31，美国是2 208.252 73；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总数人数的比重，中国是32.278 24%，美国是69.252 16%。所有这些数据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文化竞争力中的文化硬实力非常弱小（详细数据见表3）。

表 3 2010 年 11 个主要国家文化投入—产出数据、排名

国家	投入		产出		国际影响		基础设施		人才数量	人才素质	人才培养	
	科技投入占 GDP 的比重	著名研机构指数	发表的科技论文	居民专利申请	国际科技影响力跨国公司	最新科技可利用指数	超级计算机指数	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占总人数比重	每百万人从事研发的人员数	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	高等教育指数
中国	1.565	124.53	198 905	293 066	7	4.40	23.65	3.98	32.27	1 599.63	3.67	881.23
法国	2.157	382.73	86 280	14 748	9	6.35	13.29	5.85	31.7	5 561.50	6.11	355.52
德国	2.732	359.59	126 004	47 047	6	6.29	10.87	5.74	26.5	5 109.36	5.20	271.21
印度	0.79	126.15	51 764	6 814	5	5.58	4.34	3.58	22.70	228.81	3.33	472.43
意大利	1.23	112.34	74 485	8 445	1	4.95	3.70	3.66	17.0	2 511.84	4.72	130.90
日本	3.55	149.30	104 228	290 081	8	6.28	18.72	5.22	3.09	5 786.06	3.78	601.48
韩国	3.25	27.79	52 056	131 805	0	6.11	2.95	4.12	36.67	5 771.77	5.09	219.39
俄罗斯	1.17	99.91	32 012	28 722	0	4.17	4.69	2.57	25.92	3 566.34	5.47	593.46
新加坡	2.67	11.86	12 219	895	0	6.25	0	6.12	80.87	6 431.11	3.49	11.98
英国	1.82	132.09	145 680	15 490	4	6.35	15.35	5.50	35.4	4 631.20	5.89	214.57
美国	2.78	672.97	533 615	241 977	43	6.44	121.41	5.11	69.25	6 074.28	5.72	2 208.25

第二，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还刚刚起步。从文化产业来看，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刚刚起步，而美国早已是一个文化产业大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中国。在欧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普遍高于10%，美国这一比例却高达25%，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自1996年以来，美国文化产品出口已超过航空航天工业而成为第一大出口产业。日本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20%。中国直到2011年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才第一次超过3%，当年的文化产业总值还不到4万亿元人民币。此外，美国的文化市场是国内与国外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文化机构所做的市场都是世界性的，其业务遍布世界。根据美国电影协会(MPAA)2010年全球市场分析报告，2010年全球票房总额为318亿美金，其中传统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为106亿美金，亚太地区为87亿美金。从增长速度而言，全球票房较2009年增加8%，北美地区之外的所谓海外国际票房增速为13%，其中亚太地区增速为21%。全球性的市场定位决定了美国拥有全球性的文化产业竞争力。

第三，以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等构成的功能性文化软实力功能不强。研究表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只相当于美国国际传播力的15%。美国是一个传媒大国、传媒帝国，美国的传媒实力远远高于中国。根据尼尔森2011年的统计数据，美国拥有家用电脑或笔记本人数约1.9亿，拥有手机人数(13岁以上)约2.3亿(平均50%的人拥有智能手机)、上网人数约2.1亿、用手机上网人数约1.2亿，接入宽带网络的家庭有8.6百万户。虽然从绝对数来看，同样的数据中国要比美国大，但从国内总人数来看，中国的数据要小得多。中国有13亿人，而美国只有3亿人。中国的上网人数是5亿多，占国内总人口的1/3，而美国这一数据却超过了国内总人口的2/3。美国拥有多个世界著名的传媒集团，中国除新华社之外，其他传媒集团的影响力基本上限于国内。换言之，中国的国内传播力不弱，但国际传播力非常弱小。

第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非常短缺。近年来，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内的各种文化设施建立不少，但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而且建立的文化设施实际上很难转化为民众可以便利消费的公共文化设施，很大程度上是做给领导看的，是政绩工程。特别是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也并非所有市民都能够有机会参与消费。相比之下，美国的文化设施随处可见。图书馆、博物馆、社区体育场等文化设施成为美国城市的最重要的建筑物，而且都是免费的。以华盛顿特区为例，这里的公立图书馆系统辖有25个独立的图书馆，总馆是位于市中心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功能齐全，服务上乘：只要是居住或工

作在华盛顿特区或周边郡的人，都可以凭有效证件和居住证明注册成为读者；每位读者一次可借 50 本书、10 张 DVD、10 张 CD，借期 21 天；在 DC 的 25 家图书馆凭卡可通借通还，通常在其他社区图书馆预约来的书等只要在架，一般 1 至 2 天就可以通借到；华盛顿特区有专门的图书物流车每天奔波在华盛顿特区的 25 家图书馆之间。除图书馆外，博物馆也是华盛顿特区最重要的文化风景。这毫无疑问是以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为代表，此外还有各种专业性的博物馆，虽然专业博物馆实行门票制，但门票都不贵，20 美元左右。众所周知，图书馆、博物馆都是知识储存库，居民到这些文化设施中来，不仅感受到文化的氛围，也从这里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

第五，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外影响力和在外的被接受程度都非常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中共中央编译局跟世界各国左派的交流和对中国相关文献的对外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对当前中国成就的宣传；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中国学术的外译；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国所设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全国各高校所设的中国中心与海外机构的交流；国家在世界各友好国家所设的中国文化中心，以及中国各种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等对外的宣传报道。应该说，它们对传播中国主流价值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西方只关注中国经济，并不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关注中国问题，并不关注中国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只关注中国研究的成果，并不关注其中的文化。可见，传播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孔子学院，表面上看，世界各国都有众多的人来学习汉语，但根本没有多少人了解、认同和接受汉语承载的价值观。这不仅与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的解释力有关，而且也与我们的传播方式有关。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竞争力的总体发展状况表现为：

其一，中国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文化竞争力非常弱小。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产品。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且其历史发展脉络从未被打断。这种文化发展史造就了一个文化大国的中国，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其他国家文化所没有的厚重。西方学者也认为，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文化资源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① 仅从历史阶段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发育之早、结束之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相比。封建社会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那是在

①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Vol. 48, No. 2, Summer 2006, p. 17.

西方各国进入近代史以后的事，当时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标识着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应该说，这些文化资源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只是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只有把优秀的文化遗产激活成为文化创新的原动力，并使之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或主流文化，那么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才能获得巨大的软实力。[①] 单纯的传统文化资源的积累、堆积，很有可能是一个民族自负的历史优越感之源，其结果是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该民族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今天的中国，实际上还沾沾自喜于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缺乏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紧迫感。我们往往满足于正在流行的"汉语热"，以为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竞争力。然而，全球究竟有多少人认同汉语深层次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呢？我们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在全球设置孔子学院却面临着包括经费等诸多问题，而美国的好莱坞的大片、流行乐、电视和快餐却早已实现了全球的另类统治。[②]

其二，中国文化品种丰富，但文化品牌严重缺乏，文化品牌的国际化程度非常低。中国文化品种繁多，不仅传统文化产品积淀多，而且当今高科技条件下的文化产品在中国也比比皆是。这同样跟中国悠久的文化有关，也跟中华民族善于吐故纳新、敢于创新的精神有关。但是，在繁多的中国文化产品中，我们很难找到国际知名的文化品牌。虽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创意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创意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制造，如工艺品加工、设计产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权内容产品输出仍然不多，尤其是视听内容产品及版权贸易还相当匮乏。真正的文化品牌是民族的，也是国际化的，而国际化品牌的多少和品牌国际化程度的高低恰恰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纵观我国的文化品牌发展，还存在着内外失衡的现象，即文化产业总体结构仍偏重内向型，核心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开发力度不足、程度不高。[③]

其三，文化平台多，但很少进行文化营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认识到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加大了文化平台建设，尤其在世界各国都在构筑新的中国文化平台，以传播中国文化，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艺

---

①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②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请参见[加拿大]马修·弗雷泽著，刘满贵等译：《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欧阳友权、杜鹃：《我国文化品牌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术节”、“中国文化周”、“汉语年”等。特别是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对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提升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仅仅靠文化平台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营销。通俗地说，仅仅进入市场是不够的，要别人购买你的商品还得要吆喝。所谓“吆喝”就是营销方式。中国的各种文化平台基本上是政府或类政府在构建，很少借助于市场的作用。这样，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色彩过浓而被外界视为“中国文化侵略”，另一方面政府运作往往具有不可持久性，文化平台很可能就成为“烂尾工程”。

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并不天然就是文化竞争力大国。事实上，中国文化竞争力非常弱小且非常不平衡。本研究将文化分为以下五个向度：价值观念（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历史文化（非物质遗产数量、世界文化遗产数量）、现代文化（每千人拥有的日报数量、福布斯 2000 公司排行榜中上榜公司数量）、国际影响力（国家品牌指数、文化吸引力指数）和多样性（语言普及指数、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这五个向度将中国文化发展总体状况与世界上其他 10 个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2010 年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在“价值观念”的向度上并不太软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包容性”两个指数都高于日本、意大利、德国，与韩国大致相当；在“历史文化”的向度上，中国文化处于绝对优势；在“现代文化”向度上有强有弱，中国每千人拥有日报数绝对是劣势，只比印度的数量略高，在本研究纳入考虑的 11 个国家中处于倒数第二的位次。不过，福布斯 2000 公司排行榜中上榜公司的数量居于中等偏上的位次。在“国际影响力”的向度上，中国的“国家品牌指数”和“文化吸引力指数”与印度、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大致相当，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多样性”向度上，中国又是一个弱项（具体情况见表 4）。

四、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增强中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已经非常紧迫。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也是文化软实力小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和国家的转化能力。但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弱小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严重欠缺。只有文化实力随着物质性实力的提升而实现整体性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在和平发展之路上不断前进。究竟如何建设文化实力，国内学者已经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例如，童世骏从文

表4　2010年11个主要国家文化指标、数据、排名

国家	价值观念		历史文化		现代文化		国际影响力		多样性	
	企业家精神	创新精神：包容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每千人拥有日报数量	福布斯2000公司排行榜上榜公司数量	国家品牌数量	文化吸引力指数	语言普及型指数	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中国	5.35	6.67	34	34	74.103 63	136	54.83	64.05	0.009 317	0.051 197
法国	5.57	5.4	7	32	163.524 1	63	66.96	69.69	0.111 801	10.272 37
德国	4.29	6.32	0	31	267.465 1	53	67.62	68.51	0.018 634	13.155 42
印度	6.51	7.38	7	23	70.943 77	61	53.41	57.52	0.254 658	0.445 574
韩国	6.09	6.08	10	9	296.252 8	68	53.14	53.71	0.006 211	1.082 372
美国	7.47	6.92	0	9	193.189 1	524	68.15	69.82	0.208 075	13.855 44
新加坡	5.9	8.29	0	0	360.776 3	18	54.04	48.72	0.239 13	38.743 67
英国	5.3	7.07	0	24	289.752 6	90	66.62	67.49	0.208.75	10.367 29
俄罗斯	6.67	5.77	2	13	97.778 91	28	56.39	64	0.012 422	8.641 127
意大利	5.01	6.7	2	41	137.101 9	34	65.55	69.61	0.018 634	7.379 547
日本	4.15	5.49	18	12	551.228 9	258	66.45	65.11	0.003 106	1.713 543

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探讨了提升文化竞争力的措施在于推进文化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①] 韩振峰则提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十项措施，其中包括：发展文化生产力、增进文化传承力、激发文化创造力、提高文化竞争力、提升文化传播力、扩大文化影响力，以及加大文化保障力等。[②] 陈正良认为，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重视文化创新，整合利用中国深厚而悠久的文化资源，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让中国产品成为中国特色文化的结晶和载体；增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辐射、对外亲和力与感召力。[③] 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社会化主要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来自何处？

第一，要确立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全民族精神素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以领导地位，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现实中呈现出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的局面，但我们的国家仍然需要社会的整体利益。维系这个整体利益的关键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国民素质的问题，实际上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任何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与其根本体制相适应的、发挥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精神之魂。文化的发展总是为建设国家当代的核心价值体系服务的。社会主义要拥有以前任何社会所没有的全新核心价值体系。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就不具有先进性，也就不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创造出更多、更新颖的文化消费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也就是说，文化创新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

第二，丰富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文化生活。要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严禁低俗文化产品，减少快餐式文化产品，大力生产高雅文化产品。因此，文化消费需要加强引导。首先是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观念的培育。文化产品的消费必须有利于人们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心理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倡导文化消费并非越多越好。同物质品的消费一样，过

---

① 童世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背景和任务》，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② 韩振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十大举措》，载《理论导报》2008 年第 4 期。

③ 陈正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论要》，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度的消费就是浪费。但是，在文化产品消费严重不足的当今，我们更要倡导在健康文化消费观念的前提下积极消费，从而使文化真正成为我们民族创新力源源不断的源泉。再次文化消费要嵌入消费者的心灵，并使文化所蕴涵的德操、智慧和力量化入消费者的灵魂深处，这样文化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效能。总之，文化消费反映的不是文化本身的情况，而是一个民族的素质问题。文化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而不在于通过文化发展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国民素质的整体性提升，无论多少经济效益都是无法衡量的。国民素质提高的收益是战略性的，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性收益。

第三，转变文化生产方式，使文化生产真正适合人们的消费，满足人们的消费。盲目地增加经费投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文化垃圾充斥文化市场。今天，无论是文化的生产还是文化的传播，简单的复制已经无法获得文化消费者的认同，缺乏对文化品的认同，消费者就缺乏消费的欲望。学术文化的生产（指学术研究）同样需要转变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生产者的"圈地"现象（指到处拉项目）。因此，文化生产转变方式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转化为创意的文化生产方式。有创意的文化产品才能拥有消费者，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时，要努力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国文化的创新。中国文化历经悠久的历史而不衰，不是因为中国社会将其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而是因为在保持其精髓的情况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创新，从而使之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就是要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

第四，要克服文化自负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卑感以及历史虚无主义。克服文化自负感，就是要敢于吸收世界各国创造的文化成就，使当今中国更具有包容性。因为对自己过度自信就会盲目排外，从而会导致中国社会在自我封闭中陷于停滞。文化的自卑感表现为，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认为文化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是中国现代化无法真正取得突破的根源；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自信，认为没有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现代化最终要陷入困境；三是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来自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采用西方市场经济而取得的，没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等等。克服文化自卑，就是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再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之后，使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必然会导致当今中国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五，文化发展要坚持走国际化发展之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文化发展必须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文化产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文化产业不仅要立足本国，而且必须面向世界。只有在参与全球竞争的情况下，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要在全球化的市场框架中构思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用外需来拉动内需，用外需来推动内需的增长和质量，用外需来影响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这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要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培育、开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努力开拓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出口渠道；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加快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产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变得强大起来。

第六，要增强文化竞争力必须要打造文化品牌，特别是要采取国际化的文化产品制作和传播方式来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品牌产品。文化品牌既是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在激烈的文化产品竞争中，中国文化产业要努力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多创作、多生产出既有艺术品位又有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要扶持有发展潜力的大中企业，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把反映中华民族特色与当代中国风貌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尽可能多地推介到国际市场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中。只有展现中国文化特色、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才能够抢占世界市场高地。

第七，要充分利用经济领域“走出去”积累起来的市场和经验，大力支持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要利用经济“走出去”的经验来开发国际市场，特别是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来促进中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尽快熟悉和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在竞争中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竞争力。此外，具体的文化企业还要认真研究世界市场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心理，使中国的文化产品能够积极应对世界市场的需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的态势。

第八，要在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的同时，全方位整合文化资源，加快推进文化资源集约化的经营战略。中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面对西方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化产品之上的现实，中国文化产品还停留于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因此，一方面，提高中国文化竞争力就要借用新技术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新，打造新技术条件下的文化品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刚刚起步，无论是文化产业的经营理念、策划经营能力，还是资源整合能力，都不够成熟和强大。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要不断学习西方的文化经营战略，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源整合能力，努力打造中国的文化产业“航空母舰”，提升中国文化的整体竞争力。

第十章 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追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

“和平发展”[①] 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高度概括，但这决不是突兀之词，而是新中国60多年甚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现代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有对历史经验的传承，又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新；既是内部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又是在国际大环境下的理论思考和现实选择。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式提出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持信任态度的甚少，更多的是怀疑，甚至持完全否定的看法。[②] 因此，梳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脉络，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律，更有利于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以及有利于中国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充满信心。

---

* 本章主要内容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修改。

① 2003年，中国首先使用的是“和平崛起”，后来在正式的文件中都使用“和平发展”。

② 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提出来以后，持怀疑论的典型代表是米尔斯海默。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pp. 160 - 16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Winter 2010, pp. 381 - 396。其他学者的观点还可参见 Albert Keidel, “China's Growing Pains Should Hurt U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4, 2005 等。最近，西方又有学者提出类似怀疑论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成长中的各种痛苦越来越明显，这将威胁到中国的周边邻国甚至更大范围国家的安全。参见 Yukon Huang, “China, the Abnormal Great Power”,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3/05/china-abnormal-great-power/fo53（上网时间：2013年3月20日）。此外，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新著《中国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提出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大国”，认为中国没有盟友、软实力非常弱小、金融系统不发达、跨国企业寥寥无几，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大国，但不会成为第一大政治大国。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持怀疑论的表现。参见 Gideon Rachman, “Whether China will become a global power”, http://www.ft.com/intl/cms/s/2/79277554-8a63-11e2-9da4-00144feabdc0.html#axzz2NtPyQEAp（上网时间：2013年3月15日）。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

什么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毫无疑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换言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开启的历史过程。当前学术界有几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是中国30多年的改革才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才最终形成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时间维度上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指中国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而仅仅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不宜将其推演到改革开放以前。这种观点显然是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视为只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跟改革开放以前的一切实践没有直接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是新中国建立之时，因为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所以前后30年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理解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历史必须要以正确理解前30年的历史为前提，没有前30年的探索就没有后30余年的成就。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复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之后而提出的历史任务。因此，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放大到中国近代史中去，我们会发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跟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三重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只是“成千上万胼手胝足、转转沟壑的小农背负着一代一代歌讴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或性心理义的士人”①。然而，鸦片战争的炮火第一次将沉睡的中国社会震醒，也第一次使中国人民感觉到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因此，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放眼向洋看世界”，开始“师夷长技”。随后，中国社会又历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等，战争一次次的失败使中国社会深深地感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日益沉重。但是，究竟如何救中国于水火、挽民族于危亡，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中国几乎尝试了所有西方的经验和主义，“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只是使中国在现代化之路上迈出的一小步。以日本为蓝本的维新变法，虽然维新派洒下了热血，但并没有开创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即便是

① 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资产阶级民族派试图通过学习欧美来"再造中华"，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人民真正认识了一条真理：只有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才能找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之路。在屡屡遭受打击的经历中，中国人民才清醒地认识到基本的原理：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的资产阶级到处都在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推行所谓的文明"，"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因此，在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根本就没有中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只能充当西方的附庸。孙中山在其遗嘱中就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② 近代中国的经历使"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③。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探索的。

获得独立后的中国，继续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寻找发展道路的重要约束条件，那就是中国曾经被西方列强蹂躏，而且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因此，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要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化体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率先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坚持在该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平等的关系，目的就是要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当然，在当时情况下，宽松的国际环境知识主观的设想，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有必然地扮演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和西方主宰的旧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的角色。④ 因此，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这并没有让中国放弃五项基本原则。

当然，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尚未真正找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只是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和某些政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开始思考发展战略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发展对国际体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崛起，也是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大国崛起，无论国际社会是否关注到这一点，中国自己都不得不慎重对待。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②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④ 黄仁伟著：《中国和平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国的崛起，中国必然要冲击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撼。在这种情形下，所有国家尤其是既有大国必将进行相应战略调整并制定应对之策。如果中国不想在既有大国的战略调整中成为它们的“假想敌”并遭到它们的遏制，那么中国就必须全面、和平地融入国际体系并努力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一个改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国际社会突发性崛起的力量，而是经历了170多年艰苦探索的痛苦过程。中国深知被奴役、被蹂躏的民族耻辱，更知道亡国灭种的灾难。因此，中国的崛起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更不能以摧毁另一个国家或民族来实现自身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实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本质上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长过程，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国真正找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毫无疑问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之中。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有和平发展道路。这二者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中国和平崛起还只是一个进行时，还远没有到完成时，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并非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30多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经验，有利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就是在全中国人民心中坚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总结过去30多年的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的以下基本经验：

第一，追求软实力与硬实力平衡发展。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单纯的硬实力的崛起，而中国的崛起既强调硬实力是国家成长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强调软实力对国家成长的重要性，是追求软实力与硬实力平衡发展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崛起是追求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统一的一种崛起方式。[①] 纵观西方大国成长的历

① 所谓“物质性成长”，是指国家对于领土、资源、海洋、市场、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等物质文明的追求，还包括国家对国际事变的机械反映；所谓“社会性成长”则是指“大国的发展必须以主流的国际规范、国际法等国际政治文化为依据，从维持和建立反映时代要求的世界秩序为出发点，将履行国际规范与国际责任界定为国家重要利益，运用合法的国际交往手段谋取综合国力，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进而成长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过程”。参见郭树勇著《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史，大国成长的类型基本上是武力扩张型，即通过军事手段打破原有的国际（或地区）体系；或者用军事手段摧毁原有的主导国并取而代之成为既有体系的主导国。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都无不例外地是在追求硬实力的畸形发展即过度强调军事实力的作用而崛起的，但这些国家都无一例外地从军事立国又到国家败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①。即便是当今的美国，也因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对弱小国家使用武力，从而伤及其软实力而出现了衰落的迹象。②

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则完全不一样。中国过去30多年的崛起主要表现为内部经济发展，是典型的内联式崛起。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经济发展遭遇到质量的瓶颈，因此中国开始着力增强国家软实力，通过软实力的提升来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瓶颈，并为经济的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由此可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不仅在于其经济总量等硬实力的迅速提升，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同时提升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等构成的软实力。也正因为中国追求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平衡发展，中国才能跳出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不会陷入大国成长的“陷阱”。

第二，坚持把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来源于文化。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文化积淀的国家，而且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化发展和历史变迁中具有相当大的惯性，对社会发展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崛起决不能抛弃传统文化，走文化虚无主义之路。

中国的崛起既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增强，也表现为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复兴绝非只是像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说的那样，通过“整理国故”，“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达到“解放人心”的目的，而是要通过整理国故来重建中国的文化自觉：既不能陷入文化保守主义，也不能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顶礼膜拜；既要防止文化自负，拒绝任何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也要防止文化自卑，言必称西方。中国的文化复兴，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中

---

① 所谓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是指国际政治发展进程中，不仅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会出现周期性的替代现象，而且国家间关系也有时紧张，有时趋于缓和，有时停滞，有时进步（或倒退），而这种紧张/缓和、停滞/进步（或倒退）的背后其实是有规律、有特点的，即有升与降的曲线周期。参见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国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历经艰难曲折而始终绵延不衰，不仅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心灵，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和智慧。这些精神财富和传统智慧直接就是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建立中国文化发展及构建支撑中国话语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表现为"重视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就，包括吸收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从而显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世界文明先进成果的一致性"[①]。中华文化发展当今表现出来的品格就在于，中华文化不仅具有"内在超越"的特质[②]，而且具有吸纳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包容精神。这两种特质和精神的结合正是中国走向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坚持大胆探索不照搬他国模式与善于总结自身实践经验相统一。简而言之，这就是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照搬他国成功的模式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崛起的一条基本经验或者说是规律，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事实。由于西方率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长期以来，现代化被西方所定义，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③] 因此，在现代化问题上，各种各样的"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远的不说，20 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 1904 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大肆鼓吹"西方文化中心论"。他认为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一个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主要归结为新教伦理的宗教文化，正是因为新教伦理对理性主义的不懈追求，才使得西方文化无论是在天文学、历史学、艺术领域、建筑科学还是社会组织方面，都达到了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无法企及的高度。[④]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文化中心论"再次流行开来。最典型的代表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⑤]"西方文化中心论"反映到社会发展问题上就是现代化道路的"唯西方论"。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虽然是由外力推动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独特的运动形式。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制之下

① 童世骏著：《文化软实力》，重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8 页。
② 牟宗三著：《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 页。
③ 参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31 页。
④ [德] 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⑤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域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9 页。

而开启的话——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被卷入文明进程"[①]，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主要表现在这种现代化是内部发展需求拉动的进程；同时，这一进程完全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因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现代化之路根本没有任何先例，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则是需要大胆试验、大胆"试错"，最后通过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实践中的教训而形成一种现代化道路。当今西方一直想要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强加于中国，实际上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化的基础是殖民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通过掠夺、殖民和战争而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是一个充满了血腥的过程。如果中国要走这样一条现代化道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不是和平发展之路。

第四，坚持和平进入国际体系与和平建设国际体系相结合。中国进入国际体系是以和平方式进入的，也就是通过接受并遵守既有的国际程序而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认可。这种方式最大的特征是中国自身国际市场能力的不断增强并通过国际市场能力而融入国际体系。当然，在此之前，中国是先进入国际政治体系，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首先是加入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但由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缺乏共同利益，西方大国并没有真正视中国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成员，至少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一个成员。不仅如此，它们在政治上还处处刁难中国，特别是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不认可中国。然而，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后，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利益也越来越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大国不得不接纳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并主动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这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②]

不过，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以后并非仅仅是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顺民"。由于既有的国际体系脱胎于20世纪中期崩溃的殖民体系，形成于冷战期间，国际体系仍然存在着种种弊端。如果不改革这种国际体系，人类就很难走向一个公正的国际社会。因此，中国和平进入国际体系以后坚持和平建设国际体系。中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沃勒斯坦也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地球，甚至那些从来没有成为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进来"。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② 朱立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19－33页。

国和平建设国际体系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塑造国际体系全新的价值理念，其中包括“和谐世界”、“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等理念，从而为国际体系的和平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参与国际体系改革的具体实践，如联合国改革（包括安理会机构的改革、联合国维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防扩散与联合国机体安全制度的改革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世界银行的代表权的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中通过对国际体系规则的内化以后，又通过自己的塑造实践过程而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说，中国和平参与国际体系与和平塑造国际体系是一个“双向社会化的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和相互改变的过程”[②]，因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三是为国际体系的和平转换提供了一个价值目标，即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曾受害于国际体系的强权政治，因此一直力推国际体系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即“坚持国家部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③]。中国以和平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民主化转换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五，坚持和平崛起与维护国家利益而开展正义战争相统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2005 年 12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和决心。2011 年 9 月，中国政府又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总体目标和世界意义。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是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的。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战争彻底“绝缘”，相反，在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主权的时候，中国不会因和平发展道路而放弃战争方式来维护主权的完整。只有毫不妥协地维护主权完整，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不发起战争，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④] 如果别国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还担心战争导致中国不能成功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敢轻言战争，那么这种和平发展道路是不可取的，是妥协甚至是屈服。今天的中国是万万不能在主权上妥协的。2013 年 1 月 28 日，习近平在就

---

① 这些理念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47 页。

② 朱立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时间逻辑》，《外交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13 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7 页。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① 习近平这段话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和平崛起与正义战争的内在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是互为条件的。

第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与同国际社会共赢发展。任何主权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中国也不例外。自中国革命胜利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这也是从中国近代史的遭遇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上融入到全球化之中，但国家利益决不能淹没在全球化浪潮中。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② "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③ 针对当时西方国家用人权、制度合法性来攻击中国的情况，邓小平又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就是要损害我们的主权。"④ 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容不得有任何触动的。对此，习近平也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⑤

然而，与自私的国家利益至上不同，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同时又坚持同国际社会共赢发展。邓小平强调与世界各国共赢发展的基础，即尊重他国的国家利益。1989 年，邓小平对当时的泰国总理差猜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⑥ 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明确提出中国与国际社会共

①⑤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9/c_114538253.htm(上网时间：2013 年 3 月 30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0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8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8-329 页。

赢发展的主张："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①] 习近平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②]由此可见，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是利益主义的发展，而是把中国自身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负责人的成员的发展。

第七，超越历史大国成长与超越自身发展相结合。西方大国成长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由于所走的都是"强国必霸"的成长之路，因此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丛林法则"的陷阱，最终都无法跳出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相反，中国的成长方式不是一种追求军事实力的工具性崛起，而是将国内决策与国际反应相结合（即国内与国际的良性互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结合（即追求共同安全）、国内发展与各国发展相结合（即追求共赢发展）的崛起，也就是制度性的崛起方式。因而，中国崛起方式超越了西方历史大国的崛起方式。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虽然是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国家属性、国家定位的判断"，"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立足于、产生于、成熟于中国本土，而不是照搬某个外国模式"。[③] 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历史上又是没有先例的。中国历史上的兴起曾建立了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中原汉族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番邦相互承认并接受的"朝贡体系"。这种"朝贡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朝代甚至延伸到周边的其他亚洲国家。但是，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绝非要恢复这种"朝贡体系"，而是要通过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建立一种政治上相互信赖、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尊重、安全上相互支持的全面的新型伙伴关系。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是对自身历史发展道路的重大超越。

第八，坚持"友而不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主张建立新型的国家间关系，

---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8/c70731-20941162.html（上网时间：2013年4月1日）。

③ 黄仁伟：《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超越》，《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5、10页。

这种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友而不盟"，即做真正的朋友但不结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亲眼目睹了两大超级大国争霸全球的事实，更亲眼目睹了苏联在苏美争霸中败亡的历史，所以，邓小平说，"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①] 以此为鉴，中国坚持奉行不结盟的外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不结盟"战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对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②]中国坚持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交朋友。相反，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跟所有国家建立平等的新型国家间关系。这种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定亲疏"；这种关系是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原则上跟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正是在"友而不盟"的原则基础上，中国既维护主权独立，又通过开放的新地区主义而实现与其他新型国家的整体性崛起，但整体性崛起由于不结盟而并不是一个集群式力量，从而不会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挑战性力量而崛起。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由两部分组成，即"和平"与"发展"。"和平"主要着眼于外部环境建设目标；"发展"主要是内部的现代化目标。不过，二者之间并非是截然分开的。没有内部的发展，中国就没有建设世界和平的物质性力量；没有世界和平，中国的现代化任务就难以实现。也正因为如此，自邓小平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发展自己，中国的发展是为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反过来，世界的持久和平将为中国发展提供长久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中，"和平"与"发展"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理论表达。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已经是一个事实，关键是它的未来前景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如何，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下面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和平发展能否成功实现；二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三是崛起的中国会不会谋求霸权地位。

关于中国和平发展能否成功实现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关于衡量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的三大标志：一是中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二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保持良性发展；三是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①] 不过，笔者认为这三条很难用来衡量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其一，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统一当然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并不排除用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假若因政党轮替台湾出现事实上的"台独"，那么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维护主权完整的战争并不会影响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其二，中国保持与美国关系的良性发展确实至关重要，但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决不能靠中国单方面克制来实现，中国单方面的克制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而也就不是良性发展的双边关系。其三，要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应该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有充分的自信。只要符合中国的发展，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认同。但需要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也就是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标志应该是：其一，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来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能沉浸在理想主义的幻想之中，虽然我们不相信实力政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实力始终是最根本的话语权。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周边国家就不敢轻易挑战中国的底线。这是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其二，中国能否在物质性实力增强的同时实现文化的复兴。应当承认，当前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崛起，而软实力的各要素——尤其是文化要素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崛起而复兴。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并没有立即带来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要增强国家软实力，正是看到了文化对于大国成长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当文化与物质性实力能够实现平衡发展时，中国就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重的高品位国家。其三，中国与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之间能否共同构筑确保双边关系良性发展的国际制度和相应的机制。与美国的实力相比，中国仍然是相对弱小的国家，两国关系既不能靠中国作为弱者一方的"克制"，也不可能靠美国作为强者一方的"克制"来确保持久的良性发展，只有在双方互信的基础上构筑的制度和机制的规制之下，两国关系才能实现良性发展。

① 黄仁伟、刘宏松：《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否成功的三大标志》，《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

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关键要看中国能否实现“和平”与“发展”长期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但也会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因而内部的发展与外部的和平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衡量中国能否实现“和平”与“发展”长期的有机统一也有三个标准。一是中国内部能否持续发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内部具有持久性的发展，这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根本手段，也是提升中国和平外交行为的物质依托。所以，内部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①。甚至连政治体制是否正确，邓小平认为衡量的标准之一是要“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②。十八大报告也继续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科学发展。”③ 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二是中国究竟以什么方式来谋求内部的发展。发展的方式决定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客观地说，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发展是粗放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受到国际社会颇多的质疑。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尤其是通过加强文化实力建设来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瓶颈，从根本上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三是中国发展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也就是合作主义的发展，还是利己主义的发展，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目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合作主义的发展，而且中国始终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过去 30 多年中国发展的情况更验证了这一客观真理。而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的发展更加依赖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崛起的中国会不会谋求霸权地位的问题，邓小平早在 1985 年就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④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发展国家希望中国扮演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角色，邓小平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3 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8 页。

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①] 邓小平不仅指出了中国发展的性质是和平的发展，而且也指出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即“永不称霸”、“永不当头”。但是，“不称霸”、“不当头”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社会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国际责任联系在一起来考虑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中国的责任是什么呢？这就是邓小平指出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②] 为此，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要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就是“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 由此可见，崛起的中国虽然不追求霸权地位，但并不接受霸权国家的强权政治，并力图通过中国的发展来改变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④] 换句话来说，中国通过内部的发展来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总之，中国经济将继续发展并很快将在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越来越强调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也指日可待。在国际事务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多，两个大国之间建立在国际制度上的互信也越来越牢固。因此，中国完全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绝非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在内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外部，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合作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中国不会谋求霸权地位，但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谋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而中国的发展是国际社会“可接受的发展”。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8页。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代后记）

中国现代化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现代化形成了一条中国式道路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话语。但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毕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是绕开问题来谋发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改革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存在着种种疑虑。这些疑虑包括：

一、中国的改革是否会导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并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但是，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而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两大因素促成的。因此，西方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2008年就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这本书不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还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从长达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来看，30年只是短短一瞬，最多只是走完了长周期的一半；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说明什么，若不梳理清楚其中的机理，接着出现30年的经济衰退也并非不可能。更何况，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国富民不富”，只有长期保障绝

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并提高其生活水平，才是经济发展永恒的追求目标。①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经济调控的手段。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而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是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落后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这种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无疑首先要发展经济文化，构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强大的物质文化基础。马克思晚期也曾经指出，一些国家由于特殊的条件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不过，他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可以跨越，但绝不可以跨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阶段。换言之，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落后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必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更加发达的基础上。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成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那么，究竟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呢？封闭起来能否发展生产力？关于这两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早就给出了答案。马克思认为中国就是"活的化石"，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动，即便是革命包括中国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革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② 恩格斯则将中国视为"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③ 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民族侵入中国等东方古老民族之前，这些民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社会变革也不可能提出现代化的任务。但是，在外力(资本主义的入侵)的作用下，晚清中国社会被迫融入"资本主义文明进程"。正如马克思在其《国际述评(一)》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所说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 8 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④。也就是说，在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入侵以后，

---

① 参见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p. 200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7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65 页。

落后的东方各民族都深深地感到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耕文明而言，不只是文明与落后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东方落后民族致命的是工业文明借用先进的技术包括战争手段彻底摧毁落后民族的文明。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时就指出："内战、外辱、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关系。"[①] 在这种情形下，落后民族才开始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从而抵制资产阶级的殖民化统治。

马克思民族问题理论揭示了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任何民族的发展必须在开放状态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借助于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以及资本的力量，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进程，从而促使落后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和政治制度的崩溃；而对于落后民族而言，封闭只能是更加落后，资产阶级民族开创的世界历史也意味着全球化的来临，落后民族如果不积极回应，那么全球化的浪潮就会冲垮落后民族的栅栏。当今中国的发展正是在积极开放的状态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程。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民族问题理论的当代价值。

开放就意味着跟外部市场连成一体，尤其是当今世界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被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取代以后，客观上要求参与其中的世界各国必须遵守国际市场规范，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在全球市场经济之中都没有例外。因此，一方面，中国搞市场经济并非是要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融入全球市场的进程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搞市场经济更是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需要，而这又是建立在中国自身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一是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论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长期以来也是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此，在人们的脑海中产生了一种刻板的认知：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但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巨大洪流和中国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现实困难，早就在中国民众脑海中留存着的市场观念，慢慢地进入中国执政党的决策之中。表面看来，邓小平在1979年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似乎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但实际上是中国经过了30年的学习之后的艰难总结，也是未来继续加强对市场经济学习的“动员令”。二是重新认识内部建设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建国初期，中国被迫关闭国门，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左”的思想的牢笼之中，中国自我孤立于世界。7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席卷而至，中国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③]三是重新认识时代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长期以来信守着“战争与革命”的原则。但是，随着战后旧的殖民体系的纷纷瓦解，尽管战争的因素还存在，甚至还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④]而越往后，制约战争的力量就越“有了可喜的发展”。[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世界主题的认知开始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新认识，使中国最终把对外开放首要的是市场开放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试办四个经济特区开始，以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市场开放的“试验场”和“突破口”，然后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再将沿海开放扩展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漳厦三角地带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环渤海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浦东的开发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掀起一轮新高潮，最终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内市场。正是内部市场的开放，才使中国有机会接触到并努力学习和逐渐学会了国际市场的种种规则。这是破解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密码。

二、改革是否会导致中国走上儒家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如何定性？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不少争议。在新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中国建国60年前后，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公开的文章是甘阳于2007年6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作者指出，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的三种传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不长，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成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二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三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作者认为，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以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①

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许多理念来自于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正如甘阳所说，"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说的"和谐社会"与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和谐"是有本质区别的。儒家传统的"和谐"思想的应用是比较广泛的。一是应用于社会和政治，以求社会"和谐"的境界及功用。例如，"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也就是通过调解民众之间的大小纠纷，以化解矛盾，达到社会和谐。《周礼》中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这里说的是周代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中第三典"礼典"的内容，目的佐王治邦国，以达社会和谐。二是将"和谐"思想应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曾把"和"视为做人处事

①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载《读书》2007年第6期。

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意即礼制最为可贵的作用是营造和谐有序的秩序。他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要想做成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是互动的艺术，是彼此之间的适应与合作。另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将“和谐”泛化为家庭中的人伦关系，亦会使家庭和睦，幸福安康。三是将“和谐”思想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指“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平衡、稳定、和谐的状态。“中”、“和”是关于“致大、广大、宏大、博大”的学问，是关于宇宙观的学问，是关于对“天”、“自然”、“宇宙”等整个世界的认识的学问。可见，在中国古代，“和谐”无论是指音乐中韵律的和谐，还是指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以不同的多元要素的存在为基本前提的，是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协调状态，表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和谐”理念其意义比儒家传统中的“和谐”意义要深刻得多。特别是把儒家的“和谐”思想单从社会政治关系来理解，这种和谐是非常低水平的和谐。而今天所讲的和谐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上的和谐，是高水平的和谐。假若说中国未来的道路是儒家社会主义，那么就意味着“和谐”理念的意义是从高水平的和谐向低水平的和谐下滑。这就意味着社会发展在开历史的倒车。

假若中国未来的道路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么马克思主义又置于何种地位呢？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就会丧失精神支柱。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的亡党亡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 1 800 万党员的大党、百年老党，之所以最后彻底土崩瓦解，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则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共产党。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试想，如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进行改革，苏联共产党是否就意味着能够继续存在呢？我看未必。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如果戈尔巴乔夫不进行改革，继续维持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走下去，也不会走得太远。这是因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改革就会陷入误区；同样，不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一直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最终仍然会失败。因此，认为中国的未来道路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实际上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会走上绝路。

儒家的一些理念并非不可用，而是要将儒家的传统文化理念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使之具有现代意义，使之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完全复古。我们一直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今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条符合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希望。

三、改革是否会导致中国走上新殖民主义道路？

“新殖民主义”是相对于20世纪以前的殖民主义而言的。20世纪以前的殖民主义表现为通过炮舰政策来实行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殖民统治，并通过这种殖民统治来维系西方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关系。与此相反，新殖民主义则是强国、大国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的政策及其活动。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对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控制、干涉、掠夺与剥削，保持新生国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性，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旧的世界秩序。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意识形态诸方面。其表现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①

“新殖民主义”这一词语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从那时起，殖民体系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下纷纷解体，特别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摧毁了欧洲殖民者强加于非洲的殖民统治制度。但是，由于殖民经济结构的延续，即靠初级产品出口(包括矿产资源和单一的经济作物)的单一经济结构，跨国公司取代西方民族国家、通过市场价格和货币供应仍然控制着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使非洲许多国家不能获得经济独立。这种以非政权统治形式控制和剥削前殖民地经济的现象就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西方官方人士直接提及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人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据英国路透社2011年6月11日消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赞比亚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不断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同时，非洲必须当心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她还强调，非洲应该关注那些能帮这片

① 张顺洪、孟庆龙、毕健康：《新殖民主义论：对当代世界的一种解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

大陆建立生产力的伙伴国。她指出，中国在投资非洲和向非洲提供援助时，并不总是顾及非洲人民的利益，“新的殖民主义”正在非洲大陆蔓延。

把中国的对非洲政策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是毫无根据的臆断甚至诬蔑。中国历史上既无非洲殖民地，又没有任何与殖民相联系的活动，“新殖民主义”从何而来？因为相似的历史遭遇，中国始终站在非洲国家的立场上，尽可能地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尤其是中非合作历史悠久，早期中国对非洲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据统计，中国目前在非洲援建了铁路 2 000 多公里、公路 3 000 多公里，援建了 100 多所学校和 60 多所医院，共计减免债务 200 多亿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中国所有的对非援助项目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试想，有哪个西方的殖民主义会是这样的呢？绝对没有。中国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中国跟非洲有着相同的被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历史。

中国是不是“新殖民主义”并不能由美国人、欧洲人说了算，中国是不是“新殖民主义”应该由非洲人民说了算。马里前总理苏马纳·萨科在驳斥西方媒体所谓“中国要把非洲变成殖民地”的说法时指出：“中国援助非洲国家，是为了帮助它通过经济上的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这样的例子很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坦赞铁路。”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曾撰文写道：“这种（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是荒谬的。中国不会为了攫取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的互惠合作，中非伙伴关系持久互利。中国坚信，中非共同发展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只有非洲的持久繁荣，才能有中国的持久繁荣。中国对非洲援助是真心实意的。中国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即非洲国家强调自主发展与国际协调并重的发展战略。”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也认为，中国是非洲最坚定可靠的贸易参赛者。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正在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这股力量，非洲必须务实地与之结盟。

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对非政策上一方面继承了中非传统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更深化了这种友好关系。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访问非洲的行程中就提出了对非关系的四个基本准则，即：第一，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我们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中国将继续同非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真诚祝愿并坚定支持非洲联合自强，推动非洲和平与发展。第二，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只要是中方作出的承诺，就一定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中国将继续为非洲发展提供应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第三，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

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我们要更加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积极推动青年交流,使中非友好事业后继有人。第四,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真"、"实"、"亲"、"诚"体现了中国与非洲关系是全天候的好朋友。

四、改革是否会导致中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谢韬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宏论指出:"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① 谢韬之后,2011年,西北大学华炳啸所著的《超越自由主义》一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推进党内民主的主张,包括全国党代表大会应该取代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共权力的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应当平行,同对党代会负责,而不是中纪委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应由党代会选出两人,由2 800名全国人大代表投票选出,获胜者兼任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也应由党代会选出两人,两人到全国人大代表前辩论,然后投票选出。而且,华炳啸还提出,2 8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不应该由官员兼任,而应通过人民选出人民代表,每名代表应有专职办公室,以便接见选民。这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具体化。2012年7月,黄沙尘在"共识网"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建设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

①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度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的具体实践，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为武器，真正实现以人民主权为导向，存在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作者认为，“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民主发展观”，“是社会主义进入更高级阶段”的标志，是“新社会主义”。①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真如谢韬等所说的那样是民主社会主义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否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社会主义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在中国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二，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主张在维持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其三，是否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各种名称的社会党抹杀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宣称他们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不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多种社会阶层出现和并存的新格局下，共产党仍然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其四，是否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民主社会主义抛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从资产阶级的理性和伦理原则如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出发，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一个社会公正、自由民主、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社会主义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并最终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

① 黄沙尘：《建设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70963404_3.html。

历史演变过程和制度创新历程。[1]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个体高于集体,是个体本位主义;而社会主义则崇尚集体高于个体,整体至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私有制、民主宪政,而社会主义强调的则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民主制度上,社会主义强调民主集中制;民治社会主义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而社会主义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则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

当然,当今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国际环境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当今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甚至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现实的社会主义所采纳,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也不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只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五、中国的改革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无疑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化之路。这就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就是"中国特色"。正是这些"特色"会使中国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特色"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且从未间断,因而有很深的积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遗传基因",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影响是长期的、持久的、隐性的。它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成为社会发展无法摆脱的因素而发挥作用。

二是中国的实践特色。中国的改革是一种"试错法",至少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改革开放都是一种试验,或者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方式本身又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甚至在新的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实践仍然是"试错"为主。

三是中国的理论特色。理论来自于实践,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当今中国的主导理论既不完全是中国文化,也不完全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融合了传统

[1] 参见程恩富、张飞岸《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理论参考》2007 年第 8 期。

文化、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元素，因而当今中国的理论既有实践性，也有很大的包容性。

四是由于前面三个特色，从而产生了中国的体制特色。这种体制特色被沈大伟称为“统一的混合体制”。他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域也在向国外取经，把国外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变成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它吸取了东亚新威权主义、苏联列宁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拉美社团主义等的优秀因素，并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中国像一棵树，根是中国文化，主干是中国特色，各个枝干是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这种体制非常有适应力和弹性，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①] 正是有这样的特色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这条道路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复兴的重要契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过去 30 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奇迹”。中国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实践。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只是实现了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从一个贫困型社会迅速发展成为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于：第一，中国在认识上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思想，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第二，中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通过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市场体系融为一体，并处于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区域；第三，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并借助于国内与国外的互动性而成为全球化体系中的利益攸关方，从而把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压力降到最低。这三个方面是造就“中国奇迹”的制度性原因。而中国在制度建设上恰恰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结合。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了“中国现代化模式”。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比中国和东方各国都早。因此长期以来，不仅现代化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手中，而且现代化的模式也被西方模式所垄断。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趋同化，现代化也不是西方化。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应该有各自不同的路径和模式。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结果，而是基于

① 参见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pr. 2008。

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伟大创举。因此,中国现代化模式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权和模式的垄断权。中国现代化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它的成功向全世界表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非西方模式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西方一些学者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即便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使西方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化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巨大产出效应使之在发展中国家里拥有前所未有的魅力,这些国家从羡慕而转为直接的效仿。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开创了大国成长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但中国崛起的方式与西方历史大国崛起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西方历史大国的崛起都是工具性崛起,即通过硬实力主要是军事实力进行对外扩张而实现崛起的,而且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是摧毁原有国际体系,目的是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中国则是制度性崛起,这表现为:其一,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型崛起,在经济实力有所提升时,软实力建设也提上日程,用软实力的提升来引导硬实力素质的进一步提升;其二,中国和平进入国际体系,并作为既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而不是既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其三,中国内部的发展与外部的和平环境始终保持高度的互动性,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起来的中国为世界的和平作贡献。或者说是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来实现崛起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方式不仅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的路径,而且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跳出了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

主要参考文献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Vol. 48, No. 2, 2006

Daniel Kaufmann, and Aleksander Kaliberda, "Integration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to the Dynamics of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in B. Kaminski, ed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Aromonk: M. E. Sharpe, 199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pr. 2008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Random House, 2001.

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Portfolio Hardcover, May. 2010.

Jack A. Goldstein,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1995

John Martinussen, *Society, State and Market: a guide to competing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1997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May 2004.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ium Books Ltd, 2009.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Penguin Books Ltd, 2009

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egulation*,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8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Susan Rose-Acherman,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4, 1975.

Thane Gustafson , Capitalism Russian-Styl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imothy G. Ash, "China,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The Los Angles Times*, September 11, 2008.

Will Hutt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Verso 2007

[波] 格泽尔兹·W· 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年版

[德] 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俄] A·布兹加林、B·拉达耶夫著:《俄罗斯过渡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俄] 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青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古希腊] 柏拉图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加] 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美] 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美] 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美] 丹尼斯·郎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美] 道格拉斯·C·诺斯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美] 沈大伟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美] 苏珊·罗斯·艾克曼著：《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 约翰·奈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9 年版
[美] 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著：《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颜朝阳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
[苏]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新华出版社 1981 版
《邓小平文选》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资本论》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蔡昉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王延中等著：《中国工业化进程报：1995—2005 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廷湘、周鼎著：《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
樊纲著：《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关海庭著：《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韩保江著：《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
胡键著：《转型经济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著：《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江金权著:《“中国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开发主编:《较量: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年版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林岗、王一鸣等著:《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楼宇烈著:《中国的品格》,南海出版公司 2009 年版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马国川著:《大碰撞——2004~2006 中国改革纪实》,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
马国川著:《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年版
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
马岩著:《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
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
任建明、杜治洲著:《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吴敬琏著:《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吴忠民著:《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谢春涛著:《庐山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
徐贵相著:《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张东辉:《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郑永年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周尚文、郝宇青等著:《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朱光磊著:《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邹东涛主编:《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